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陈云论党的建设



出版说明

为了配合全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进一步抓好党的建设，帮助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加强关于党的建设理论的学习，我们编辑了这本文集。文集收入了陈云同志自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九四年论述党的建设的重要著作五十六篇，其中四十九篇选自《陈云文选》第二版，两篇选自报刊，五篇为首次发表。

陈云同志是党的第一代、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曾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四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七年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党执政以后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陈云同志对党的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有重大建树，提出许多具有深远意义的思想。他的这些思想，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经验总结，是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关于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收入的论著，集中反映了他这方面思想的主要内容。

全书文章按时间顺序编排。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正文，编者作了少量注释，附在每篇文章的后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一九九五年三月

陈云论党的建设

这个巡视员的领导方式好不好？

（一九三三年七月五日）

农业工人工会[1]有一个很努力工作的巡视员，他的工作优点是能够深入到支部中去。这是一个很好的同志，但是，他的领导方式十分呆板，不会具体活泼地领导。现在经过全总执行局会议的讨论，我想，这个同志在下次巡视工作中，一定会得到很好的成绩。

这个同志不久以前到某县去巡视，在某区召集区的农业工人工会支部长联席会，这个区有八个支部，但那天只到了五个支部长。会议开始了，“上级参加人”（那个巡视员）作报告。他在报告中说了七件工作，要各支部去做，同时要各支部长发表意见。他说的七件工作是：（一）加紧查田运动[2]；（二）扩大工人师[3]；（三）经济动员，退还公债，退还谷票[4]；（四）发展农具生产合作社；（五）组织犁牛站[5]；（六）发展农业工人工会组织，健全支部；（七）统一工会经费收支。他的报告作完了，进行讨论，但是发言的很少，后来工人发言了，说：“我们粮食很困难，现在没有饭吃。”“照中央政府[6]规定，工人可以免缴土地税，但是我们这里区政府还是要我们缴土地税，这件事情请上级想想办法。”我们的巡视员对于工人提出的两个问题，没有要他们去讨论。结果大家空空洞洞地讨论了巡视员的报告，最后，巡视员提出要求各支部承认扩大红军多少名，各支部长承认了一两名，会议就此结束。

第二次，在城市的杂货工会支部和杀猪工会支部全体会员的联席会议上，他又作了报告：（一）过去经济斗争中的错误，或“左”或右；（二）停止向雇主强迫介绍失业工人；（三）取消参加工会工作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的长期工资。在他这个报告之后，城市工人可不同了，不客气地向他“开炮”。工人说：“停止强迫介绍，老板不会主动请工人，工人大家要失业，长期工资取消了，工人家里没有饭吃。”他们很爽快地反对了这个报告。这个大会毫无结果而散。

这种领导方式，我想不仅这个同志如此，许多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常常也是如此的，但是，这是很不好的领导方式。这样的方式妨碍工人的积极性，不能推动支部工作，而且会使工人对工会领导产生不满意，影响到这个支部的健全和巩固。这种领导方式的错误在哪里呢？

一、出席会议以前毫无准备。

这个巡视员在区的支部长联席会议上作了关于七件工作的报告，但工人感觉到都没有他们目前没饭吃、割禾以后缴土地税那样的事重要。因此，对他的报告就毫无兴趣。这就告诉了我们，这个巡视员在参加会议以前，应该先找区工会的常驻人员或者个别支部长来谈一谈，问问工人有些什么要求。了解了这些要求以后，自己想一想，再与他们商量一下，如何才能找到满足这些要求的办法。准备好了，到会上首先提出工人的要求，或者把工人的要求放在自己报告的中间讲一讲。如果这样做了，工人一定很高兴，很愿意讨论自己的要求，讨论巡视员的整个报告。经过这样的会议，可以推动支部在农民群众中间的工作。

在城市的杂货工会支部和杀猪工会支部的大会上，这个巡视员同样是事前没有了解群众的情绪和要求，没有准备好用什么方法去解决工人的困难。

最奇怪的是，连他自己对于斗争错误的实质和克服“左”倾的方法都没有了解，所以到了工人反对他的报告时，只有目瞪口呆，或者就蛮不讲理地下“命令”。事实证明，这种领导方式是不能推动工作的。

二、在支部会议上提出一大批工作。

这是工作中的大忌。如果在支部会议上，也像对上级领导机关的干部一样，提出七八件工作，不分轻重，不分先后，这会使支部同志感觉头痛，不知做哪件工作好，从哪件做起好。他们会说“能力不够做不到”，实际上是拒绝工作。或者说“你们是外来人，不了解我们的实际情况和困难，只会打官话”。他们在上级参加人的严厉督促之下，觉得回答“不愿做”不好，只好说“去做做看”。工人说“去做做看”，究竟在会议以后做不做，我想不会做的。不说拒绝的话，而说“去做做看”，只是为了敷衍上级的“面子”，这是不是工人不愿做工作，应该骂他们“右倾机会主义”呢？这丝毫不是工人不好，而是我们的领导方法不好。如果你要工人做七件工作，工人在会议以后一件也不做，这非没有什么用处，而且会对我们的领导不大信任，你下次要他来开会，他就有些不高兴，要推三阻四了。

三、没有从工人最高兴的工作做起。

召开会议，应该事前了解工人当时的要求，提出工人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假使已经作了报告，而工人感觉没有兴趣，他们提出了自己的两个问题——没饭吃，要求免土地税，这时，领导同志应该“见风转舵”，先发动大家讨论这两个问题。因为粮食眼前已经缺乏了，秋收快到了，土地税是迫在眼前的事，他们一定能在讨论中发表许多意见，到那时，就可以提出发动有多余谷子的农民来互助，暂时借出，秋收归还：或者发动群众，同苏维埃政府[7]一起，要富农捐谷子，来救济缺乏粮食的工人、农民。只要能做到这个程度，那我们就可以再向工人提出，应该联系完成上级提出的那几个任务。同时向群众说明，只有苏维埃政权巩固和发展了，才能根本解放工农。如果巡视员这样领导那个支部长联席会，我想有许多工作是可以完成的。

提出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关键。这好比锁着的两扇大门，我们要进屋子去，一定要个钥匙来开那把铁锁。这个钥匙就是拿住工人愿意做的那个工作做起，而不是呆板地照我们自己所想的去做。因为只有工人愿意做，从他们需要做的工作做起，才能把他们推动起来。只要他们积极起来工作了，加上我们及时地活泼地领导，许多任务都可以逐渐完成。所以，我们要善于找到提高群众积极性的环子，抓住这个环子来推动支部工作，推动全盘工作。领导的艺术在于了解群众的心理，甚至一个会议的议事日程的排列，哪个先，哪个后，都有很大关系。

四、缺少具体的方法，把握不住群众的情绪。

在会议上讨论扩大红军，只要支部承认多少人，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感觉有困难，是看上级“面子”而承认扩大的。如果遇到这种情形，领导会议的同志应该告诉他们工作的方法，要他们首先去找工人、农民中平常积极工作或者愿意当红军的人谈话，以及谈话的内容应该怎样，并且告诉他们去动员愿意当红军的人在群众大会上自动报名，作广大的鼓动。这种方法不是一般的粗糙的领导，而是具体的细心的领导。这样，一定可以推动支部的工作而获得成效。

同时，还要告诉他们，这些方法在某种情形之下可能遇到困难，也不要失望。如果某种工作进行得很顺利，那时我们就要告诉他们，某种困难需得

预防，不要忽略，要准备克服这种困难。只有把握住支部同志每一时期工作上发生的各种“失望”和“忽略”的情绪，给以预先的具体的领导，才能使支部同志团结在我们的领导之下，相信我们的领导，而使工作得到推动。这样，就会锻炼出大批细心的有毅力的新的工作干部。

最后，我郑重声明，那个巡视员是一个很好的工人干部。我这些批评只要正确，他一定能够接受并用到下一次巡视的实际工作上去。

我写了这些文章，希望大家来参加关于“领导方式”的讨论，把个人的好的坏的经验统统写出来，增加我们自己的工作能力。支部的领导方式是做好工作的关键，有了正确的决议案还不够，要把正确的决议运用到群众中去，成为对实际工作的指导，还必须经过一种灵巧的工作方法和艺术的领导方式。

注 释

[1]农业工人工会即中国农业工人工会，是当时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领导下的一个工会组织。一九三三年四月在江西瑞金成立。

[2]查田运动是一九三三年六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分配土地后开展的一次群众运动。

[3]工人师是一九三三年三月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在扩大红军的动员中，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组织的工人武装队伍。这年八月一日，工人师正式组成，整师加入中国工农红军，被编为中央警卫师。

[4]谷票是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起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展的借谷供给红军的运动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部印发的借谷票。退还谷票就是把借谷票退还给政府，不再要政府归还谷子。[5]犁牛站也称犁牛合作社，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农民为解决耕牛、农具缺乏的困难，按照自愿和互利原则成立的一种农业劳动互助组织。

[6]这里所说的中央政府，指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江西瑞金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也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

[7]苏维埃是俄文 CoBeT 的音译，意即会议或代表会议。它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国家权力机关的名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建立的革命政权也称苏维埃政权或苏维埃政府，它所管辖的地区称苏维埃区域，简称苏区。这个历史时期也称苏维埃时期。

论干部政策

(一九三八年九月)

干部政策，拿俗后来讲，就是用人之道。为何要讲这个问题呢？因为同学们要到敌人占领的后方去工作，不单是当一个游击队员，而且要当干部，当领导者，而用人之道对于领导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有一句这样的话：“干部决定一切。”[1]这是通用于全世界的，不但外国通用，中国也通用；不但共产党通用，其他政党也通用。

可惜得很，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十年斗争中，干部损失了十几万，没有陕北根据地的话，连现在这一点干部也保存不了。全中国一千八百多个县，假如每个县能够保存三个党员，我们党开展工作的力量就大得多了。

我现在来讲干部政策，只想用十二个字，分成四个问题来解释：第一，了解人；第二，气量大；第三，用得好；第四，爱护人。

先讲第一点：了解人。

了解人，要了解得彻底，不是容易的事情，严格他讲是很难的。就拿我们共产党来讲，是不是每个党员都了解人呢？我看还是做得不够的。最近就发现有两种毛病：第一种毛病是用一只眼睛看人，只看人家一面，不看全面，不能面面都看到；第二种毛病是只看到这个人今天干了什么，没有看到他以前干过什么，只看到他本领的高低，没有看到他本质的好坏。

只看到坏，不看到好，或者只看到好，不看到坏，这两种看法，哪一种多？一般他说，我们有些同志总是看坏的多，看好的少。有什么证据呢？如分配干部时，往往听到许多不好的话，说这个家伙自高自大，那个家伙懦弱无能，要不然，就说这个人背景复杂等等。

自高自大当然不好，是坏的，但是这种看法往往包含片面性。我们要进一步地看，每一个坏处同时也常有它的好处。这个人自高自大，但是做起事来有自信心，这种人多少有点才能，因为他起码总有点本领才敢自高自大。对这种人，我们就要用他的好处，避免他的坏处。假如你指定一个范围，告诉他正确的方向，让他尽量地去发展，他是可以做出成绩来的。对这种人，给他不十分重要的工作，使他放胆做去，发挥他的长处，在工作的过程中间，随着经验的增加，他的弱点就可以慢慢克服。经验的积累和弱点的克服是分不开的。

懦弱无能当然也不好，可是其中也有它的好处，好处是小心谨慎。因为他能力不大，所以特别唯谨唯慎，这种人不能做大刀阔斧的事，但是可以担任小心谨慎的工作，例如做机要、做调查统计等工作。我不赞成懦弱无能，但是这种人有他的好处，我们可以用他好的一方面，小心谨慎的一方面。

再来讲背景复杂的问题。当我们发展党员的时候，凡是会说话的，有胡子的，懂得各党各派情形的，就以为他背景复杂，不敢吸收。然而这种人在社会上常常是比较有经验的，他们了解许多问题，只要他们真正信仰共产主义，而且现在愿意参加到无产阶级队伍里来，一同革命，一同前进，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拿我自己来说，我的背景就非常复杂。我先是相信吴佩孚[2]的，后来相信国家主义[3]，后来又相信三民主义，最后才相信共产主义，因为经过比较，认识到共产主义是最好的主义。我们说这种人复杂是复杂的，但他从自己的经验中真正了解共产主义，本质也是纯洁的。青年是纯洁的，

但纯洁的不仅仅是青年，老头子也可以是很纯洁的。

从上面所说的看来，一个人的长处里同时也包括某些缺点，短处里同时也含着某些优点。用人就是用他的长处，使他的长处得到发展，短处得到克服。天下没有一个人是毫无长处、毫无优点的，也没有一个人是毫无短处、毫无缺点的，所以我们说，在革命队伍里，无一人不可用。

第二种毛病是，了解人的时候，只看他的今天，不看他的昨天，或者只看过去，不看现在；只看见功不看见过，或者只看见过不看见功；只看见今天的好，不看见昨天的坏，或者只看见今天的坏，不看见昨天的好。这样就往往对于干部不能有根本的估计。这种毛病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随便提上来，随便放下去。我们共产党中也有过这种情形：今天这个干部表现得好一点，就把他一抬抬上了天，同一干部明天表现得坏一点，就把他一打打到地下去。你们看见过老百姓盖房子打桩，一上一下。使用干部不能也像打桩子一样，今天看他好，便把他提得高高的，明天看他做得不够，便把他打下去，后天又把他提起来，再后又打下去。这种一上一下打桩式的用人是不对的，造房子打桩愈多愈好，如果对干部也这样来几次，我说顶多只要三次，这个干部就算断送完了，因为他的自信力早已失掉，再也不敢做工作了。过去我们在江西苏区工作的时候，有一个毛泽覃同志，是毛主席的弟弟，人家说他犯了一个错误，要不得，便认为这个人不能用。后来扩大红军需要人工作，于是派他到一个区域去，结果不但完成了任务，并且还大大地超过，成绩非常好。他回来的时候，许多人又把他抬高起来，调他到闽赣边界的游击区去工作。隔了几个月，因为他说了几句似乎有些近于右倾机会主义的话，正在这个时候，恰巧又派他去扩大红军，没有取得很好的成绩，于是又都说他不能用了。大家都不要这个人，送到这里拒绝，送到那里拒绝。一个这样的同志，竟会到处无人要，连饭都几乎吃不成了。后来红军退出江西的时候，他在战斗中勇敢地牺牲了，为着革命流了最后的一滴血。所以，我们看人不要只看一时，只看一面。对于一个人没有根本的估计，用人就会造成很大的错误。

这就是今天我要讲的了解人的问题。

再讲第二点：气量大。

用人要气量大。何以要讲这个问题？现在时代变更了。一九三八年与一九二八年有何不同？卢沟桥事变以前与卢沟桥事变以后有何不同？我说今天许多人归向了共产党，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我记得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开办一个学校，训练工人干部，只讲六天，学生也只有六个。今天我们抗大[4]就有几千个学生，再加上陕公[5]、鲁艺[6]、党校[7]，在延安就有一万多个学生。一万个跟六个比一比，相差多少，所以我说十年以来，人心大变，不管男女老少，都不怕艰苦，不远千里而来延安。抗大在武汉登报申明不招生了，一点没有用，仍旧是络绎不绝地来，没有汽车用两条腿走，男男女女从几千里外都来了。主要是革命青年，也有大学教授，有工程师，有一个七十五岁的老头子也来了，西北旅社住的什么人都有，各党各派。新闻记者，还有青年组织的参观团，等等。这些人不见得是在外面没有饭吃，要到延安来吃小米。从这种情况看来，复杂是复杂的。但是到底是复杂好还是简单好呢？从前办学校只有六个学生，倒很简单。今天各种各色的人都有，复杂得很。我看要干大事情，就免不了要遇到复杂情况。将来领导全国的时候，情况会更加复杂。只有几个人，不要发展，才简单，但是革命一定不会成功。共产

党是先锋队，要领导广大的后备军，要与广大群众打成一片，它周围必然是复杂的。今天只有抗大、陕公的同志去和敌人搏斗还不会成功，要团结更多的同志和广大的群众。干革命如果怕复杂，便会愈弄愈复杂，不怕复杂，革命就好办。孙中山先生是一个伟大的人物，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几天之内全国就有十几个省起来响应。何以孙中山先生能够得到成功呢？原因之一就是气量大，什么红枪会、哥老会、三教九流的人他都要，不论党派成分，各种人都要，所以能作大事。我们也必须善于用人，只要这个人有一技之长，就要用，只有这样，才能成大事业。我们能不能说只有共产党员才是了不得的人才呢？不见得。社会上的人才不知有多少，许多人都不是共产党员。所以我们要有的气量，善用各种人才，单枪匹马，革命到底是干不成功的。

同志们毕业后到敌人占领区域，到敌人的后方去工作，在那些地方用人，更要有大的气量。那里有许多从大城市避难出来的人才，躲在田野山里。你代表民族和劳动人民的利益，组织游击队，只要于得好，包管躲着的人会出来归向你。那些学者、艺术家、科学家、政治家、经济家、假装成农民的，这时候都露出真面目，投奔到你的地方，这些都是很有用的人才，山东有一处地方，只去了几个共产党员和一个八路军干部，号召老百姓抗日，一下就来了几千人，现在已经有一万人了。

现在讲第三点：用得好。

要有什么方法用人才能用得着呢？我想没有旁的道理，只要是在你领导下的人都很高兴工作，都很积极工作，能够这样，工作就一定会做得好。任何工作都是一样，你们以后做地方工作，军队工作，或者党的工作，要使每一个人都很负责，都很积极努力，都很高兴，就一定会把工作做得很好，就怕在你领导下面，常常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如不安心，请求调动工作，等等。一个同志如果工作合适，能发挥所长，是绝对不会请求调动工作的。他要求调动，说明他已经不能安心工作。如果常常出现这种情况，根本的原因就是领导得不好。那末，要怎样领导才能使干部高兴地安心地工作呢？只有一条，就是上级要信任下级，下级也信任上级，上下互相信任。对领导人来说，一定要做到让下级敢于说话，敢于做事。有许多下级干部把意见放在心里不讲出来，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服从，开会的时候你问他：“同意不同意呀？”他说：“同意呵！”“同意的举手呀！”他举手。然而，实际上问题并没有解决。所以一定要使下级敢说话，同时还要使下级敢做事，就是做错了也不要紧。如果这个下级既敢说话，又敢做事，他就一定会积极起来。

不敢说话为什么不好呢？举例来说，如果有人有某些不同的意见，又不敢说，而议案已经表决通过，这些决议案在执行的时候，就不能发生很好的效力。所以宁可争论，不要形式上的一致通过。

用什么方法使别人敢说话呢？有几点需要注意的。

第一，领导者的态度要好。如果在一个领导机关里，一个领导者别人见了他就不敢说话，事情怎么能办得好？如果大家都喜欢亲近他，都爱和他说话，这个领导者一定很能团结人。如果一个领导者架子搭得很大，面孔死板板的像阎王那么可怕，一定没有人去接近他，即使和他讲话，十句话也要忘记八句。其实，领导者又何必装出很凶很庄严的样子呢？同志们也许要问我，领导者的好坏是从政治上来看的，为什么要看面孔呢？但是很多都要看面孔，不要说别的，就是共产党员中间也有这种习惯，所以领导者必须注意这个问题。

还有，开会的方式不要刻板。开会时尽可让到会者随便、热烈的争论。规规矩矩请他们一个一个发表意见，很可能有的人就不会说出自己的意见，因为有人常常不敢在严肃的场面中间说话。

总而言之，如果下级敢说话，有话就讲，这就是好的现象，就证明了你们领导得好，因为他们觉得说错了也不要紧。

第二，少戴大帽子。比如，有一个人说错了几句话，你就对他来一顿批评，不是说他是“左”倾空谈主义，便是讲他有右倾机会主义的嫌疑。如果随便给人家戴上这类大而无当的帽子，一个人头上戴上三四顶，恐怕就“差不多”了，不能工作了。

有一些人，专门把任何问题都提到原则的高度。比如，某个同志犯了一些小错误，他就说人家犯错误的根源是由于政治上的动摇。小的错误能说是因为政治上的动摇吗？把每个问题都提到原则高度是不对的，这种机械的了解十分危险。因为这是一件比较严重的事，我可以说几个故事给大家听。从前有一个女同志，她把自己的一把剪刀放在枕头下面，后来大家把它检查出来了，就推论说：“大概是她不愿拿出来给人家用吧？”于是下了个结论，批评她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与我们共产主义是多么的不相容！又有一个同志在吃饭的时候吃菜吃得很多，向来是吃菜“打冲锋”，另一个同志就批评他是自私自利。假如这个同志是共产党员的话，凭着自私自利这四个字，就得考虑他的党籍问题了。还有一个例子，陕北公学有一个学生，丢了一把洋刀，据说这是一件纪念品，所以他心里很不好过。一个同志见了他那种样子，问他什么缘故，他就说因为一把刀子丢了，于是这个同志就批评他“没有牺牲精神”，说是一个革命者连性命都要敢于牺牲，难道一把小刀还不能牺牲？这个道理好像很对，实际上，这种批评用在这件小事上未免太冤枉了人家。爱护一件纪念品，并不是不应该的事，怎么能因此断定这个人对革命没有牺牲精神呢？所以这这也是一个大帽子。戴大帽子的原因，常常是因为把每个错误夸大，不适当地提到原则的高度。我们不应该机械地去看事情，一定要分出是不是错误，错误的大小轻重，不要随便乱给别人戴大帽子。

第三，当你去批评人家错误的时候，要指出人家错误的根源以及纠正错误的方法。批评的目的并不是出气，主要是在于真正帮助人家纠正错误。一般他说，批评的人有两种态度：第一种是声势汹汹地指责人家；第二种是和颜悦色地说服人家，善意指出犯错误的原因和纠正错误的办法。只有后一种态度，才能使被批评者心服意满，问题才能够真正解决。

上级领导人对下级的批评、务必要适当和正确，千万不要戴大帽子，因为上级领导人批评下级，与同级的同志互相批评所发生的影响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同级的人，他们认为大家都差不多，即使你批评他过火一点，或不大正确，还没有什么要紧，他也不会十分在意；如果是上级给他的批评，那就不同了。因为下级对上级所说的话，都是很认真的，所以不能随便地任意地批评。假如批评得过火或不正确，那要花费很大的气力，才能使得被你批评的人对你解除误会，才能使别人对他不至于蔑视，当然下级也要想到上级的出发点是好意，不要只看到态度或语气的不妥，就以为不得了。

批评的时候还要注意到：是老党员还是新党员，是老干部还是新干部，参加共产党久不久，革命的历史长不长。因为对于老党员批评，态度和方式好不好，没有多大关系。对新党员就不同，因为他们刚刚加入，他们的意识观念与老党员有差别，所以对他们批评，宜于采取温和的方式去劝导、说服。

总结起来，就是要使人敢说话。要人敢说话，就不能给人戴大帽子，不能把每个微小的错误都提到原则的最高度。要能善意地、诚恳地批评人、态度要好，还要指出犯错误的原因以及纠正错误的方法。

用人用得好，还要使人敢于做事，如果你有这样一个脾气，喜欢在你领导下的人遇到任何一个小问题，任何一件小事情，都要向你请教，先征求你的意见，你才觉得很快活，很舒服，觉得自己才像一个领导者，这种脾气对工作妨碍很大。一个人能有多少力量、多少时间？即使你的精力很强，“天下第一”。也要有天下第二、天下第三的人来帮助扶持，你才会成功。假使没有他们，你一个人也第一不起来。领导者犯了这种毛病，会降低干部的责任心，妨碍下面同志的工作自信力和积极性。比如一件事情做得很对，他说这是上面叫我做的，一件事情做错了，他也说这是上面叫我这样做的，他完全不负责任，事情做得对不对与他没有直接的关系。下面的干部没有责任心，工作一定不会做好，还会降低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妨碍他们工作能力的发展。

也许有些同志要说，你这种让下面的干部发挥主动性的领导方式不大好，恐怕要生出许多错误来。然而我看，错误虽不可免，但也不必怕。在一定意义上说，一个人不犯错误就不会进步。一个人犯了一次错误，同时也就是得到一个教训，不断地取得教训，方能不断地改进自己。正确的东西常常是从错误中得来的。科学家发明的东西，那一件不是从试验和错误中得来的？今天流线型的汽车漂亮得很，灵活得很，但是到博物馆里去看一看最初发明的汽车，笨得要命，真不好看。由从前的不好，进步到今天这样好，这中间经过了不知道多少次的试验和失败，才得到成功的。一个同志犯了一点小错，并没有什么关系；真的犯了错误，只要老老实实吸取教训，他的经验一定会增加，能力一定会提高，所以，不要怕下面干部犯错误，要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

总结起来说，使干部敢说话、敢做事是很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干部的积极性，使干部很安心地工作。假使你说一他就一，你说二他就二，那他就等于电话机，不能发挥他的才能。一个单位，干部不要求调动工作，而且有主动性和创造性，领导必定很好；如果干部都不安心，要求调动工作，领导一定有什么毛病。以后大家出去做领导工作，能做到使下级敢说话、敢做事这六个字，工作效果一定会好的。

最后讲第四点：爱护人。

这里有几个问题要注意。

一、使用干部不要今天拉起来，明天又放下去，好像打桩一样，这是我前面讲过的。如果你要提拔这个干部，首先就必须全面地估计他的政治品质和能力，看他各方面是否合适，要详细考虑一番，既然提拔起来，要经常留意他的工作，到他实在不能支持的时候，就要想办法，不要等他塌台以后，再来追究责任，撤换他的工作。

二、对下面干部任何不安心问题，都要想法子去解决。我住在那个山上，有时候也烦得很，刚刚看文件；就会有人来找你，到底会不会他呢？很犹豫。可是，设身处地想一想，人家热心来找你，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需要解决，所以还是应该会一会，有时候正在写一件东西，一个不速之客，事先不打招呼就跑进来了，你不能还是直挺着腰板坐在那里不睬人家，只得放下笔来，倾听他说话；谈话的时候，还要聚精会神，耐心地郑重地解答各种问题，这

样才能满足人家的要求。如果花了几个钟点，替一个干部把事情办好，也还是值得的。做干部工作，无论大事小事，都要不怕麻烦。除非不接受人家的要求，既然接受了，就得彻底替人家解决，花一些时间，决不是白白浪费的。

三、当着解决一个干部的问题，关系到他的政治生命的时候，要很郑重、很谨慎、很细心地去处理它。一个参加革命工作的同志，往往对于肉体生命并不重视，对于政治生命非常重视，他宁愿牺牲一切，却不愿被党组织开除。如果在政治上发生这种问题，他就会认为他的前途没有希望了。所以不是到了必不得已的时候，决不要开除党员的党籍。

常常有许多被开除党籍的同志来中央组织部上诉，或者写上诉状。这里举个例子：有一个人还很年青，因为有人的口供说他是托派[8]，被开除了党籍；这个人后来虽然解决了党籍问题，但是七年来光荣的历史完全不算了，同一个新党员一样。这个人要求把问题弄清楚，证人是有的，一个在西安，一个在延安，一个在一二九师，还有一个在外国，就一一写信去调查。经过比较长的时间，直到最近，各方面复信收集齐了，才知道以前是弄错了，我们承认了他过去的光荣历史。于是这个人由过去一个“死人”，只想“我还是到前线去牺牲掉算了”，现在变成活人了。调查时间花了两个月，值得不值得呢？我看是很值得的。因为两个月绝对培养不出一个干部来，花两个月挽回一个干部再值得没有了。

再举一个例子。有一男一女，有人告发他们，说男的是托派特委委员，女的是托派分子。他们到这里来读书，要求进党校，进训练班，便来找我想法子，但是人家已经控告了他们，于是我就照实告诉他们：有人说你们是托派。这年青的一男一女听了我的话，马上就惊异得哭起来了。我便保证替他们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来的时候一跳一蹦的非常活泼，走的时候都哭了回去。后来只花了两个星期工夫，查清他们不是托派，解决了这个问题，不是很值得吗？

有的同志常常怕连累自己，不敢正确地替别的同志做证明人，所以领导人遇到这类政治历史问题，更要慎重办理，否则有些人的问题永远不能解决，使被嫌疑的同志冤沉大海，这实际上是损害党的事业。这一点，无论是领导党的工作，领导军队，都要十分注意。

同志们！做父母的爱护他们的子女是非常周到的，但是共产党爱护党员也并不下于父母爱护子女。任何一个人犯了错误，都应该帮助他纠正。如果他犯过的错误非常严重，甚至是很大的罪过，怎么办呢？这时候就要看他过去有没有功，如果有功，就要把他功过比较一下，再作处理。如果一个人从前犯了错误，现在还在犯错误，这样的人，经过批评，只要赶快觉悟，下一个决心，回头是岸，将来能够转变得好，也还可以将功赎罪的。我们共产党是讲公道的。犯了错误只要自己觉悟，只要能够切实改正，在革命队伍里就应该允许人家继续革命。今天犯了错误，以前的功劳可以拿来相抵；若是今天有错，以前也有错，可以将来赎罪，我们共产党要尽最大努力把有错误的人挽救回来，因为这样做对于革命有利。

四、对于干部不要“抬轿子”，只说他的好处。如果对于下面干部只说他好，掩饰他的缺点，以致养成他自高自大，工作不求实际，这样只会害他，而不是帮助于他。

干部中间也有些人很喜欢别人说他的好话，说他好就感到舒服，不然他就生气，很不乐意，其实光说好话的人都是拍马屁的，拍马屁决不是件好事；

不客气批评别人的人，才是好人，才够得上是革命同志。有些干部常常不了解这一点。俗话说，“忠言逆耳，良药苦口”，每个同志都要注意这一点。

总结起来，爱护人很重要。凡是提拔干部，得全面估计他的德和才；既提拔起来，就得多方面帮助他，不使他垮台。对于部一切不安心的问题，都要很耐心很彻底地去解决。当牵涉到一个干部政治生命问题的时候，要很郑重很谨慎地处理。对于干部，不要“抬轿子”，要实事求是。做到这些，才能算真正的爱护人。

我就讲这些。但是有两点必须申明：第一，同志们不要引起这种感觉，以为革命纪律这东西也可以不要了，这种观念是不对的。一个革命的队伍必须有铁的纪律，来保障完成革命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如果没有铁的纪律，也就不会存在，不可能发展到现在这样。革命的纪律一定要遵守，希望同志们不要违犯革命的纪律，我这篇讲演不能帮助那些违犯纪律的人。第二，有的同志过去受了什么冤屈、处罚，不要使用我这篇讲演来打反攻战，今天乘机来反攻、报复，这样就不好。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谁能够不做一点错事？只要改正了，就算很好。同志们的气量要大些。

我的讲演完了。

注 释

[1] 见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3页）。

[2] 吴佩孚（一八六四——一九三九），山东蓬莱人。北洋直系军阀首领。一九一八年一度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主张南北议和。五四运动爆发后，以“爱国军人”姿态，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主张取消中日密约。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支持曹锟控制北京政府。一九二三年残酷镇压京汉铁路工人运动。一九二四年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战败。一九二六年又和奉系军阀张作霖联合，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同年在湖北被北伐军打垮，后逃至四川。一九三九年死于北平。

[3] 国家主义是以抽象的国家概念来掩盖国家的阶级本质的一种资产阶级思想。盛行于十九世纪的欧洲。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的一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也曾鼓吹国家主义，当时被称为国家主义派。由于他们打着爱国的旗号。曾经一度蒙蔽过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

[4] 抗大即抗日军政大学，全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学校。前身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工农红军大学，到陕北后称为抗日红军大学，一九三七年改称抗日军政大学。

[5] 陕公即陕北公学，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学校，一九三七年九月在延安成立。招收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给以短期的革命教育。一九三九年，陕公的一部分并入华北联合大学；一部分仍留延安，一九四一年并入延安大学。

[6] 鲁艺即鲁迅艺术文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培养文艺工作干部的学校。一九三八年四月在延安成立。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迁往东北。

[7] 这里所说的党校，指中央党校，是中国共产党对领导干部进行比较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学校。前身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三日在江西瑞金成立。长征以后，一九三五年冬在陕北瓦窑堡复校，改称中央党校。一九三七年初迁到延安。

[8] 托派是托洛茨基派的简称，原为联共（布）党内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

列宁主义的一个政治派别。这里指中国的托派。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投降主义者，采取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反动立场，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从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托陈取消派”。一九二九年十一月陈独秀等人被开除出党后，在托洛茨基的直接撮合下，同其他托派分子相结合，于一九三一年五月建立了统一的中国托派组织，陈独秀被推为书记处书记。不久，它的领导成员先后被国民党逮捕，这个组织遂即瓦解，但一些托派分子和托派小组织仍然继续进行活动。

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

(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刘力功去年加入了共产党，并且在抗大毕业以后又进了党的训练班，专门学习了一次党的建设的课程。当他在训练班毕业时，党组织根据他在学习过程中的表现，给他作了鉴定，认为他“非常自高自大，有不少共产党员所不应有的观点”，又是工作无经验的新党员，因此党组织决定他到基层工作中去锻炼。刘力功则坚持要进马列学院或回原籍（离延安很远）工作，否则就退出党。为教育新党员，党组织曾经与他谈过七次后。在第一次谈话中他声明退出党的说法是错误的，但是仍旧坚持自己不到基层工作的意见。党组织认为马列学院是党的比较高级的学校，不能接收像刘力功这样思想意识极端错误的分子，认为派他回原籍工作，只是满足了他的家庭观念，非但不能对当地工作有帮助，而且有害于事，因此拒绝了他的要求。在最后一次谈话中，党组织告诉他：“个人服从组织”是党的纪律，要你到华北去做下层工作是党的决定，必须服从。可是他还是要求党接受他的意见，实际上是要“组织服从个人”。最后党组织给他一个时间去反省自己的错误，几天以后，他声明愿意到华北去，但是又提出条件，一定要到八路军总司令部工作。党不同意他的意见，他就干脆拒绝执行党的决定。

中央党务委员会[1]认为，党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对刘力功进行说服教育工作。“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党的纪律，党的纪律不容任何人破坏，刘力功违犯了党的纪律，又不接受党的教育，改正自己的错误，因此，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公布于全党。

刘力功开除出党了。如果问：我们党内具有或多或少像刘力功这样观点的党员还有没有？还有。这是由于我们党内接收了大批新党员，这些新党员极大部分是散漫的小资产阶级的成分。他们为追求真理，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加入了共产党，我们欢迎他们。但是，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还带着浓厚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习惯，这就需要引起我们极大的注意，加强对新党员的思想意识的教育。同时，要求每个新党员自觉地在革命工作中锻炼，不断地克服自己的错误思想和习惯。

我们在分配党员工作时常常碰到对于党的决定讨价还价的现象，借口干部政策来抵制党的决定。这样的党员虽然他满口“干部政策”，可是他并没有完全了解干部政策。他没有想到：分配党员工作时，党固然要考虑到个人的特长，但主要还是决定于党的工作需要。试问，你如果是一个飞机师，但是我们今天还没有飞机，不能用你驾驶飞机的特长，那还不是只能分配你做其他工作？所以，不能只讲干部政策“量才使用”的一个原则，而不讲干部政策的另一个原则，而且是主要的原则，这就是党的工作的需要。那种只看重个人，不顾及党的利益的观点，是错误的、片面的，实际上是不了解干部政策。

那末，究竟一个共产党员在党分配工作时有些什么权利和义务呢？只有说明自己意见的权利，只有在党决定以后无条件地执行决议的义务。除此之外，决不能增加一点权利，也决不能附加一个条件，否则就违犯了党的纪律。能不能说“如果党不答应我的要求我就不服从”？决不能。如果那样，实际上不是个人服从组织，而是组织服从个人了。因此，每一个共产党员在接受

党分配工作时，只能是这样的立场：“我个人有做某种工作的愿望，但是如果党有任何别的决定，我绝对服从。”作为一个新党员，本来应该积极要求到基层工作中去锻炼，而刘力功却要到总司令部去工作。还有些新党员，在意见书上也说要做“上层工作”。在这一点上，许多老党员与他们恰恰相反。我碰到许多久经锻炼、有不少工作经验的党员，他们常常说：“啊呀！我们新的经验不够，要到基层工作中去锻炼一下。”而某些新党员却以为自己已经在某个学校或几个学校毕业了，学得差不多了，现在就可以做“领导工作”了。他们不懂得学校内学的理论固然重要，但到实际中去运用，并取得实践经验更重要。干部是从实际工作中锻炼出来的。班长要从老兵中提升起来，区委书记要从支部书记中提升起来。一般说来，越级提拔常常会发生领导无经验和不称职的现象，而有害干事。领导工作的能力要从下层的实际工作中生长起来。

刘力功上过党的建设的课程。曾经举过手“拥护”党的纪律。但是，要他从口头上赞成到实际上执行党的决议时，就完全相反，不服从党的纪律了。这就告诉全党同志，遵守纪律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行动上。口头上说遵守纪律是容易的，困难的是在实际行动上真正遵守纪律。所以党观察党员是否遵守纪律，要看他的行动。党不仅在课堂上要教育党员遵守纪律，而且要在每个具体违犯纪律的问题上给以纪律的教育。我也碰到过这样的党员，他平常批评别人不遵守纪律的时候，理直气壮，还要进行“不调和的思想斗争”；但是自己在执行党的决定时，就完全相反，讨价还价，甚至公然违犯党的纪律。似乎党的纪律是为别人写的，他自己可以例外。这个不成。中国共产党党章[2]第四十四条规定：“严格的遵守党的纪律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这里所谓“所有党员”，不管你是中央委员，还是一般党员，不管你是老党员，还是新党员，都要遵守纪律。所谓“各级党部”，不管是中央委员会，还是支部委员会，都要遵守纪律。一句话，党内不准有不遵守纪律的“特殊人物”、“特殊组织”。遵守纪律首先要从自己做起，要与党内一切破坏党纪的倾向作斗争，但尤贵于与自己破坏党纪的倾向作斗争。

那末，怎样才叫做真正遵守纪律呢？一句话：迅速确切地执行党的决议。为什么执行决议是遵守纪律的表现呢？因为党所规定的“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无非是用这样民主集中的制度来作出党的决议，统一党的意志和行动。这个决议，这种纪律，就不仅是口头上的赞成，而要实际上去执行。你执行中央和上级决议才算是真正遵守纪律。那末，为什么要“迅速确切”地执行呢？因为要考验你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决议是拖延的，敷衍的，甚至故意歪曲的，还是真正忠实执行的，党不容许任何党员在党的决议面前有“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态度。

为什么共产党要这样看重纪律？理由很简单，因为共产党要领导无产阶级及劳动人民争取彻底的解放，这不是容易的事。革命胜利基本的条件之一，就是要使无产阶级的党成为有组织的统一的部队。只有组织和统一才是我们的武器，才是我们的力量。要保障我们的党能有组织和统一，这就需要有严格的纪律。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说过：“无产阶级的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

中国革命是长期艰苦的事业，共产党及其党员没有意志行动的统一，没有百折不回的坚持性和铁的纪律，就不能胜利。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

占优势的国家，如果中国共产党没有严格的纪律，将无法防止小资产阶级意识侵入党内。如果党不是有铁的纪律的队伍，就不能去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因此破坏党纪，实质上就是破坏革命，我们必须与任何破坏纪律的倾向作斗争。

今天党内加强纪律的教育特别重要。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论党的纪律及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四个基本原则时，说：“经验证明：有些破坏纪律的人，是由于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党的纪律；有些明知故犯的人，例如张国焘，则利用许多党员的无知以售其奸。因此，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我们党内今天有大批的新党员，他们还没有受过党的纪律的教育，还没有养成遵守纪律的习惯，今天处在抗日战争的时代，共产党员遵守党的纪律是胜利的必要条件。我们共产党员在政权机关中、民众团体中工作着，他们行为的好坏就立刻影响到人民对共产党的观感。因此，今天在党内尤其是新党员中加强纪律的教育，使他们了解为什么要遵守纪律，怎样做才是遵守纪律，什么事是违犯纪律的等等一类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纪律虽然带着强制性，但必须自觉遵守。只有使全体党员自觉地遵守纪律，纪律才能成为铁的、不可动摇的、有效的东西。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部队，正是因为它的党员都有着高度的政治觉悟，对革命有无限忠诚和责任心，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一切经验证明，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不会是有组织的队伍。所以，在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队伍内，也决不允许那些明知故犯的不能自觉遵守纪律的分子存在。

注 释

[1]中央党务委员会是一九三三年八月八日中共中央决定设立的。决定说：“为要防止党内有违反党章，破坏党纪，不遵守党的决议，及官僚腐化等情弊发生，在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未正式成立以前，特设立中央党务委员会。”

[2]指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

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

(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日)

一入党资格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要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其重要条件之一，就是要保持党的成分的纯洁。什么人有权加入党，是我党经常留心的问题。征收党员是每个共产党员的义务和经常工作之一，所以，什么人有权加入党，是我党每个同志都应该通晓的。

第一，什么人可以加入共产党？

依照中共党章[1]第二条，对于什么人有权可以加入党的规定是：

“凡承认共产国际和本党党纲及党章，加入党的组织之一，在其中积极工作，服从国际和本党一切决议案，且经常缴纳党费者，均得为本党党员。”

党的性质和党员的成分与入党的条件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在党的建设中党员的意义和作用这一问题，占有头等重要的位置。这个问题远在一九〇三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2]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第一次引起热烈争论和严重意见分歧的问题，并成为列宁与孟什维克基本分歧之点。

列宁的主张是：

“凡是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都可以作为党员。”

而孟什维克马尔托夫[3]的条文是：

“凡是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人，都可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

根据列宁的主张，只有真正加入组织，一切服从组织和愿意将自己全部贡献给党的事业——共产主义事业的人，才能成为共产党员。为了建立党的组织上的基本原则，列宁曾与马尔托夫进行了斗争，坚决反对马尔托夫所提出的一个人不一定甚至不愿加入到党的任何组织，只要能在组织外同情和赞助党，都可算作共产党员的主张。这种十足的机会主义的观点，不仅根本抹煞了党和阶级的界限，而且混淆了党的本质，使党降为职工会或学生会，使党沉没在同情者的大海，为一切涣散的、动摇的和机会主义的分子敞开大门”[4]。所以参加党的一定组织，为党积极工作，是每个党员最低限度的义务。

坚持列宁的原则，布尔什维克建立了自己的彻底马克思主义的、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一致的战斗的党。这一事实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给了全世界共产党一个建设党的根本原则。而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年来的斗争中之所以能成为英勇奋斗的强大的党，也正因为我党在开始成立时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便对李汉俊[5]的合法主义的孟什维克的观点作了斗争，根据列宁的原则，奠定了党的建设之基础。

在现在我党大量发展党员时，列宁的关于党员的这个原则，更有着重要的意义。要克服我们党内还存在着个别党员不经党的允许任意离开原来所属的组织，任意离开工作的倾向。

第二，每个人入党者必须承认党纲，但这不等于要求精通党纲。

中国共产党现在虽还没有成文地规定自己完整的党纲[6]，但是它却有世

界共产党总的纲领（共产国际纲领[7]和它自己的最低纲领（如历次大会的政纲和一九三七年的抗战十大纲领[8]）。承认党纲是每个入党者的先决条件，但这并不是说要把精通党纲作为入党的条件。因为精通党纲，是要有理论修养的人才行的。如果要求 加入党的人特别是工人、农民，必须精通党章党纲之后才能入党，这样不仅会把许多要求入党的革命的优秀分子拒之门外，而且也是否认了党对于党员的教育的责任。

第三，共产党员不仅要积极参加抗日，而且要为共产主义奋斗：

不是每个积极参加抗日战争的人都可以成为党员的。要求加入共产党为党员，必须是承认党纲，并且愿意献身于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分子。所以，我党吸收党员，只有依靠经常有系统地在群众中宣传共产主义及党的纲领，并从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中来细心地考察和选择他们之中的先进分子。

二 党员的成分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由无产阶级中觉悟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但是，党要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必须经常有系统地注意调剂自己党员的成分。

第一，首先是加强优秀的工人成分。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斯大林指出，党应当把工人阶级的一切优秀分子吸收进来。因此，有计划地加强党内无产阶级的骨干，这是我党组织上的一个重要问题。

特别是现阶段的我党，加强和扩大工人成分是有着重大意义的。我党过去在城市职工运动中工作比较薄弱，工人阶级曾经遭遇到空前的摧残，以及抗战以来我各大工业中心城市的沦陷，更加使中国工人阶级受着非常的灾难和损害。广大的工人由在业到失业，由集中到分散，这就使党更加加重了吸收工人入党的任务。城市中的党组织必须首先集中注意力吸收工人党员，在乡村中的党组织应该特别注意吸收由城市转入乡村的工人，吸收农村的雇农和手艺人入党，以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发挥工人在抗战中的中坚作用，加强工人阶级对广大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的领导。

但是，也必须指出，共产党并不是“工党”，而是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先锋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因此，不是全体工人都可加入党的，而只是工人阶级中最觉悟、最积极和最忠实于工人阶级事业的优秀分子。

第二，党应该注意到贫苦的农民和知识分子成分。

中国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中，存在着广大的、贫苦的、革命的农民群众。他们遭受种种压迫和剥削，生活在多重痛苦和压抑下，因而决定他们愿意拥护共产党，能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反帝反封建作坚决的斗争。历史的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农民在革命中的伟大作用，而在今后革命的进程中，贫苦的农民仍然和必将成为无产阶级最有力的联盟者。因此，大量吸收他们之中的积极分子到党内来，使自己在农村中的社会基础放在农村无产者和贫苦农民分子的上层，是完全必需的。

同样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也有着重要的作用。在过去的革命运动中，特别在今日抗日战争中，都证明他们之中有许多是能够为正确的政治方向而英勇奋斗的。由于他们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使他们成为党与群众之间的必要的桥梁。我们党应该吸收许多能够献身于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事业的革命知识分子入党，同时，经验还告诉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吸收知识分子中间的革命的贫苦的成分入党。这些革命的贫苦的知识分子，是不同于一般的知识分子的。由于他们贫苦的生活决定他们最易接近党，并且他们比较接近社会的下层。思想和生活习惯都与劳苦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因此，他们是党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最好的对象。

第三，党应该特别注意到女工和贫苦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妇女——农妇和知识分子于妇女的成分。

妇女占人口的一半，没有妇女参加革命，革命就不能胜利。现在女党员的数量太少，这首先是由于党内对吸收女党员注意不够。要反对借口于中国社会男女不能接近而放弃共产党员介绍女党员的任务。每个共产党员首先是

女共产党员应该把发展女党员当作重要工作之一。党今日应该强调提出吸收大批革命的妇女——女工、贫苦的农妇和知识分子妇女到党内来。党应该以此作为有计划的经常工作之一，并且注意在学习中工作中提高她们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

第四，一切党员必须为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工人成分是党的基础，党特别要注意在自己的组织内加强工人的成分。对于在日常斗争中和革命运动中训练出来的其他阶级出身的分子，党并不拒绝将他们吸收到自己队伍中来，但是他们必须放弃自己原有的非无产阶级的、非共产主义的立场，承认党纲党章，才能允许加入党的组织。因此，党坚决反对不保持党的成分的纯洁，不加强无产阶级的骨干，不以共产主义为根本目标，使党降为各阶级的“民族革命联盟”的任何观点，而牢固地确立一切党员都必须为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思想。

三入党手续，恢复党籍或重新入党

第一，一定的手续。

新党员入党时必须经过一定的介绍人（依党章及目前规定是：工人、雇农一人介绍；小资产阶级出身者二人介绍；脱离其他政党而加入本党者三人介绍。）由党的小组和支部通过，经上级党委的批准。参加过其他政治派别的分子入党，必须经过区党委、中央分局或中央的批准。

第二，恢复党籍或重新入党的规定。

恢复党籍或重新入党的问题，应遵照中央的决定，并按具体情况决定之。其原则有四：

（一）长期脱离党，但仍在继续为党工作，党内有人证明者，恢复党籍。

（二）长期脱离党，自称仍在继续为党工作，但党内无人证明，而今日已具备入党条件者，重新入党，候有证明时，恢复党籍。

（三）曾经长期参加党的工作，中有相当时间（一两年）脱离党的工作，未做违反革命利益的事，而现在已经恢复党籍者，则脱离党的工作的这一时期，不算在党龄之内。

（四）长期脱离党，未做违反革命利益的事，经过相当长期的考察而今日已具备入党条件者，重新入党。

至于政治上变节的分子，则不得重新入党。

四候补党员[9]

第一，候补期的规定。

候补期的长短是根据新党员的阶级成分而定。目前党中央暂定候补期间如下：工人、雇农不需候补期；贫农、手工业工人一个月；革命学生、知识分子、小职员、中农、革命军人三个月；其他成分六个月，但在特殊情形下得延长之。

第二，候补期的作用，介绍人的责任，以及转党的手续和标准。

凡非工人成分入党者，必须经过一定的候补期限。候补期的作用是教育和考察。党应该按照各地具体情况给候补党员以党的教育，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提高他们的政治认识到党员的水平，分配他们一定的工作，在工作中教育他们。同时，党应该审查候补党员的个人品质，以及历史地多方面地去考察他们在政治思想上、在党的工作上和对党忠诚的程度上，是否具备了入党条件，以作为转党的准备工作。

凡新党员入党都各有其一定的在政治上负责的介绍人。介绍人对其所介绍的新党员应该对党郑重负责，决不可苟且了事。他们不仅需要精细地留意被介绍者的行动和言论的表现，而且特别应该经常在政治上、工作上积极地耐心地帮助、教育被介绍者；而党也可以以此作为测验该党员对党负责、忠实于党的标准之一。

转党标准。党应该根据在候补期内对于候补人教育和考察的结果，来判断他在思想上对党的了解程度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心如何，在工作上是否经常积极，以及在他的一切言论行动中是否忠诚于党，这样细心地去判断他是否符合正式党员的标准。倘认为符合时，则经过转党的手续，由小组、支部通过，上级党委批准。环境允许时，各地党委并得按该地具体情况，举行入党仪式。

转党条件不在于候补期限已满与否，而决定于候补党员对党的认识程度如何。如候补期已满仍不够转党标准，必得延长之，延长期限应等于其原有候补期的期限，必要时可停止其党籍。但是，延长候补期亦不能视同儿戏，例如延长一二十天用以作为党内的处分方法等。

至于青年党员，一般的不征收十六岁以下者入党，十六岁以上者可以开始被介绍为候补党员，至十八岁才能成为正式党员。但已加入党的十八岁以下的青年党员应保持原状，不能因此开除或停止党籍。

第三，候补党员的权利和义务。

候补党员应执行党所分配的特定的工作，缴纳党费，并得受适当的党的教育——阅读一定的党的文件和受政治的或军事的训练。候补党员在党的会议上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在介绍新党员时，可以提出其所介绍的对象，再由支部派人谈话和考察，作正式介绍。在党内工作上，候补党员不得为支部干事或党的小组长。以上规定，在特殊情形下，在新建立的支部或全支部绝对大多数都是候补党员时，可以有例外。候补党员不能参加党的某些会议，并不给予阅读党内秘密文件。

五共产党员的标准

第一，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

共产党是为人类的彻底解放，为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事业而奋斗的政党。因此，一个愿意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不仅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而且应该确定自己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观。怎样才能建立和坚定自己的人生观呢？首先必须认识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坚信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实现的前途。这就是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从他的阶级觉悟，从他的实际革命锻炼中，从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修养中，深切了解到无产阶级在社会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懂得无产阶级的利益及其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事业，洞悉共产党及其党员的当前任务和根本目标。只有这样，他才能确定自己的人生观，终其一生，为他的信仰的实现而奋斗到底。同时，每一党员应该深刻知道，中国革命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斗争过程，在弯曲险峻的革命道路上，革命者必须经历长期的艰苦和波折；在与敌人经常的斗争中，在每一事变的紧急关头，还有牺牲的可能。因此，每个共产党员不仅要坚信共产主义的必然实现，而且必须对于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有不怕牺牲、不怕困难和奋斗到底的决心。

第二，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

我党是以彻底解放中国无产阶级和全国人民、全中华民族，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为职志的政党，因此，民族的和人民的利益与党的利益是一致的。共产党员是在党的领导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战士，党员的利益同民族的、人民的和党的利益也是一致的。每个党员必须对于民族、对于革命、对于本阶级、对于党，表示无限的忠诚，把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革命的、本阶级的和党的利益。

但是在革命工作中，在党的工作中，可能发生党员个人的利益与党的利益的不一致。在这样的时候，每个党员必须依靠他对革命对党的无限忠诚，坚决牺牲个人利益，服从革命的和党的整个利益。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把革命的和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革命的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来处理一切个人问题，而不能把个人利益超过革命的和党的利益。

革命的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不是一句空话。党不仅要求每个党员懂得这一条，特别是要求每个党员能在实际行动和日常生活的每个具体问题上，坚决地毫不疑撼动摇地执行这一条。党内有了这样为革命为党的利益而牺牲一切的党员，才能保证党胜利地完成革命。

第三，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

十八年来党的斗争经验，证明了纪律是执行党的路线的保证。在过去，由于正确地开展了党内斗争，执行了党的纪律，我们克服了陈独秀等人的错误路线，制止和战胜了张国焘的反革命破坏阴谋，保证了党在各个时期的革命任务的实现，以及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立和抗日战争的进行。在今后，党仍应坚持这种纪律，才能团结全党，克服新的困难，争取新的胜利。因此，一个共产党员坚决地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是他的义务。他不仅应该与一切破坏党纪的倾向作斗争，而且要着重与自己的一切破坏党纪的言论行动作斗争，使自己成为遵守党纪的模范。不要以为自己能够在会议上或稠人广众之前声明拥护并举手赞成党的路线，就算遵守了党的纪律，这是十分不够的。

一个真正能自觉遵守纪律的好党员，就在于他能在实际行动和日常生活的每个具体问题上，表示出自己是坚决地遵守党的铁的纪律的模范。

革命力量的增长，共产党威信的提高，使敌探、汉奸、反共分子更加阴险地进行破坏共产党的活动。因此，在党的工作中，不但丝毫没有减轻秘密工作的重要性，相反地，党应该特别加紧自己的秘密工作，提高秘密工作的纪律，与忽视、破坏秘密工作的现象作斗争。党应该指出，在今日的某些地方党部，还竟以为在现在环境下可以忽视秘密工作，这是十分危险的。每个党员应该不忘记许多年来由于疏忽秘密工作而受到牺牲的血的经验教训。为了保持抗战的力量，为了保证革命和党的事业的胜利完成，每个党员必须高度地提高政治警惕性，严守党的秘密工作的纪律，并且与一切忽视、破坏党的秘密工作的危险倾向作斗争。任何党内的不对外公开的事件，不准任意向党外宣传；任何对其他党员没有必要说出的秘密事件，不准在其他党员中乱说。一切破坏秘密工作的行动，必须受到党的纪律的制裁，直到开除党籍。

第四，百折不挠地执行决议。

一个共产党员，不能只是口头上拥护党的决议就算完事，他的责任在于坚决地执行决议，在实际工作中实现这些决议。实现党的决议时，在工作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挫折和困难，共产党员必须有大无畏的百折不挠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在工作中萎靡不振和用雇佣劳动的态度来对付党的工作，是绝对不允许的。中国革命是艰苦的长期奋斗的事业。中国共产党的特色之一，就是它具有不怕困难、牺牲奋斗的作风。每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具有艰苦奋斗的精神，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共产党员不仅在日常工作中要忠实于党的决议，而且要在困难中，在生死关头时，忠实于革命和党的决议；不仅在有党监督时，而且要在没有党监督时，忠实于革命和党的决议；不仅在胜利时，而且要在失败时坚持执行党的决议。只有具备这样坚定和顽强的英雄气概，才配称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

第五，群众模范。

党的政治影响越是扩大，党的威信越是提高，则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对于我们党员的要求越多越严。因为是共产党员，是群众所信仰的先进队伍中的一分子，群众就有特别的要求。群众常常根据我们党员的行动来测量我们的党，所以党员无论在何时何地的一举一动，都必须给非党群众一种好的影响，使他们更加信仰我党，更加敬重我党。

党的六中全会[10]号召全党党员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应该起先锋的模范的作用：

“共产党员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共产党员在和友党友军发生关系的时候，应该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坚持统一战线的纲领，成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应该言必信，行必果，不傲慢，诚心诚意地和友党友军商量问题，协同工作，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11]

每个共产党员应该积极地以实际行动和日常生活中，真正以模范党员的姿态，响应这一号召。

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还表现在对于革命利益严肃的立场上面，对于一切为国为民的事业，应该始终不变地坚持自己的立场。任何威胁，任何利诱，都不能动摇自己的立场。谁要是放弃了革命的和党的立场，谁就丧失了共产党员的资格。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无数的模范党员，他们为了共产主义的事业而斗争，在任何困难的环境下，百折不挠，在种种威胁利诱下，表示对于党和革命无比忠诚。成千成万的优秀党员及党的领袖，在火线上、刑场上和监狱中，英勇牺牲。他们在全世界和全中国劳苦大众的面前，显示了中华民族优秀子孙的至高无上的气节。而他们一生的丰功伟业，更是光辉千古。他们是一切革命者的模范。我们党的党员不但要敬仰他们，而且应该学习他们。

第六，学习。革命事业是一种伟大的艰巨的工作，特别是中国革命的环境和革命运动更是万分复杂，变化多端，而领导革命的共产党，它之所以能在变化的、复杂的环境中把握一切伟大的革命运动，并且指导各个运动使之走向胜利，是因为有革命理论的指导。共产党员有了革命的理论，才能从复杂万分的事情中弄出一个头绪，从不绝变化的运动中找出一个方向来，才能把革命的工作做好。不然，就会在复杂的、不绝变化的革命环境中，迷失道路，找不到方向，不能独立工作，也不能正确地实现党的任务和决定。所以每个共产党员要随时随地在工作中学习理论和文化，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增进革命知识，培养政治远见。

根据目前的环境，我们应该学习什么呢？

（一）我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的党，首先，我们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才能培养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有能力的有坚强党性的共产党员。我们的学习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学习他们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背诵教条。

（二）要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时事政治的情况，不然也就不能规定当前的革命工作的任务和方法。

（三）要学习军事知识和军事技术，特别是游击战争。在今日，“党员军事化”已成为全党的战斗口号。

（四）文化程度低的党员，首先要长期地进行识字和读书读报的工作，以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只有文化程度的提高，才能求得政治上的更加进步。

（五）尤其重要的是，每个共产党员要随时随地的在实际工作中学习，向群众学习。一切实际工作中的和群众斗争中的经验教训，是我们最好的学习的课本。

自我批评是共产党员学习的宝贵的武器，虚心地接受党的批评是一个党员进步的必要条件。好的共产党员，对党的每个批评都必须以诚恳的态度、愉快的态度去接受和了解，以改正自己的错误。

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或者不愿学习。我们反对那种“自高自大”、“自称高明”的倾向，反对那种不愿学习或者对学习没有信心的现象。一个共产党员是难得机会长时期在课堂上学习的，因此，必须善于在繁忙的实际工作中，自己争取时间去学习，这一点必须有坚持的精神才能做到。

共产党员的口号是“学习，学习，再学习”[12]。全党应该热烈地响应党的六中全会提出的“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

[13]的口号。

只有具备以上的六个条件，才不愧称为一个良好的共产党员，才不致玷污了这伟大而光荣的党员的称号。

注 释

[1]见第 32 页注[2]。

[2]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一八九八年三月成立的无产阶级政党。一九〇三年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分成布尔什维克（俄文 *Большинство* 的音译，意即多数派）和孟什维克（俄文 *Меньшинство* 的音译，意即少数派）两派。一九一二年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把孟什维克驱逐出党，从此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正式成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一九一八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一九二五年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改称“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一九五二年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决定，取消党的双重名称，称“苏联共产党”。

[3]马尔托夫（一八七三——一九二三），俄国孟什维克代表人物之一。十月革命后，对苏维埃政权采取敌对立场。一九二〇逃亡国外。

[4]见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456 页）。在《列宁全集》1986 年版中，该文被收入第 7 卷，题目改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新的译文是，“为一切涣散、动摇和机会主义的分子敞开了大门。”（第 270 页）

[5]李汉俊（一八九〇——一九二七），湖北潜江人。一九二〇年首批加入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一九二一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二年脱党。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被桂系军阀杀害于汉口。

[6]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一九二三年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在一九三九年作者写本文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成文地规定自己完整的党纲。直到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才制订了党的总纲，加在党章的前面，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也是党章的前提和总则。

[7]共产国际也称第三国际，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一九一九年三月成立，一九四三年六月解散。一九二二年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纲领指一九一九年三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行动纲领》。

[8]抗战斗大纲即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陕北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其要点是：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总动员；三、全国人民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实行抗日的外交政策；六、实行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实行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实现抗日的民族团结。

[9]候补党员是一九二二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决议中规定的。一九二八年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曾经取消关于候补党员的规定。后来，中央又决定恢复。在不同时候，对于候补期的长短有不同的规定。一九五六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

大会通过的党章，将候补党员改为预备党员，相应地将候补期改为预备期。并且规定，所有新入党的人，都要经过一年预备期的考察，才能转为正式党员。一九八二年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也作了同样的规定。

[10]指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这次会议于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在延安举行。

[11]见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页）。

[12]参见列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9页）和斯大林《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页）。

[13]见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5页）。

党的支部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日）

支部是党的最下层的组织，也是党的最基本的组织。党的一切口号、主张、政策，依靠支部才能具体深入到群众中去。依靠支部在群众中日常的宣传组织工作，才能使广大群众团结在党的口号、主张、政策之下，进行革命运动。

正因为支部是党团结群众的核心，党就依靠支部去征收新的党员、扩大党的力量。支部在革命斗争中领导和教育党员，培养党的干部。所以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是党的力量增长的主要源泉。

一支部的组织

第一，按生产单位组织支部。

党的支部建立在什么地方呢？中国共产党与各国共产党一样，依列宁提出的原则，按生产单位组织支部，即在工厂、矿山、铁路、轮船、农场、农村、兵营、商店、学校、机关等生产场所和工作单位中，组织党的支部。列宁反对社会民主党[1]不以支部为领导群众的核心，而把支部当作选举运动的竞选工具。我们党在某些城市中组织街道支部，只是因为个别自由职业者的党员暂时不能编入适当组织，是一种临时性质的支部。

我们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它首先应该注意在自己的阶级队伍中建立支部，建立工厂中的党的堡垒。列宁一九〇二年在谈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2]的组织任务的时候，即已指出工厂作坊支部在革命中的重大作用。他说：“工厂小组对我们特别重要。运动的全部主要力量就在于各大工厂工人的组织性，因为大工厂中集中的那一部分工人，不但数量上在整个工人阶级中占优势，而且在影响上、发展上和斗争能力上更占优势。每个工厂都应当成为我们的堡垒。”[3]

在农村里还没有大农庄的时候，党的支部按党员的多少，环境的适合与否，在乡或村的范围内组织支部。在我们党所领导的政权下（如陕甘宁边区），党的支部按最低级的行政单位组织起来，以便利于领导乡村政权机关。

由于中国革命的特点，是要以民族的武装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所以我党在抗战的军队中（如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等）及敌伪军中的工作占有头等的意义。党必须以坚决的步骤，在军队中建立、巩固和加强党的堡垒。

党的支部怎样组织呢？党章[4]规定，在有三个党员以上的生产场所中，即可组织支部。大的支部下面，可以小的生产单位（如工厂之车间，农村之副村、自然村）设立分支部或小组。

在绝对秘密的环境下（如敌占之大城市工厂中），党的支部应该扩大与群众的联系，但支部的人数不应过多，应该短小精干，而且可以在一个工厂中建立两个以上的相互之间并不直接发生联系的党的组织。

第二，支部的领导机关。

支部领导机关的健全与否，对于党的任务的完成有决定的作用。因此，支部的党员必须慎重地选择自己领导机关的人员。要保证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或支部干事）必须是政治坚定，忠实执行党的政策，有工作能力并为大家所信仰的党员。党必须严重注意现在大量组织的新支部及新党员政治上还幼稚的情形下，投机分子混入支部领导机关的危险。

支部委员会（或干事会）人数的多少，按党员的数量和工作的范围、工作的需要来决定。在我们领导的政权下（如陕甘宁边区），则分书记、组织、宣传、军事（自卫军）、政府、工会、农会、青年、妇女等各种工作的委员。为了处理日常工作的便利，可以设立支部委员会的常委。不满五个党员的支部，只设支部书记或加一副书记。

支部应该经常有计划地输送好的干部到上级党部，但同时必须保证支部工作不因此而受到损失。

二支部的基本任务

支部不但要在组织形式上具有核心的堡垒的姿式，而且要在实质上真正能起核心的堡垒的作用。为着实现这个目的，支部必须建立起它自己的基本工作，分配和责成每个党员去执行。依据中共党章及中国革命现在发展的形势，支部的任务，或者说支部的基本工作，应该包含着下列四个方面。

第一，支部是党团结群众的核心组织。

支部在周围群众中间工作的好坏是测量支部工作好坏的尺度。支部中每个党员积极地、经常地进行群众工作，是支部周围的群众工作开展的基本条件。支部周围群众工作的开展，可以使党员更加积极，支部生活更加健全。新党员占绝大多数的支部，要特别注意分配新党员去进行群众工作；支部委员会及上级党部必须经常地帮助他们，因为他们往往缺乏工作的经验。

支部进行群众工作的目的，是要争取自己周围的群众，接受党的领导。支部及其每个党员应该密切地与周围的群众联系着，了解群众的情绪，倾听群众的呼声，依据群众当时的觉悟程度，有计划地在群众中解释党的政策和口号，散布党的报纸，宣传共产主义，使群众走到党的方面来。

支部，尤其是战区的支部，进行群众工作的中心一项，是在组织和领导群众参加抗战，动员他们参加正规军，组织游击队、自卫队，进行为战争服务的各项工作。同时，应该领导群众开展生产运动，进行经济建设，改善群众的生活，并使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条例得以实现。在没有建立我们政权的地区，要发动群众进行必要的斗争，取消不公平的和无理的负担，撤换贪污横暴的官吏、村长、保甲长[5]。应该依靠群众自己组织的力量，采取协商、调解和一切适合于抗战环境的办法，解除群众所感受的参加抗战的各种困难，以提高他们参战的积极性。支部应该在群众中作广泛的深入的宣传解释：积极参加抗战，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是每个中国人今天最高的利益。

支部在组织群众的工作上，应该依据当地的具体环境和群众的需要，去选择适当的群众组织的形式。战区中一般的要以适合战争需要、对于战争担负具体工作的组织形式开始（如自卫军、慰劳队、少先队等），以这些组织为基础去建立更广泛的群众组织（如农民救国会、工人救国会、妇女救国会、青年救国会等）。在大后方及敌占区、一般的首先要把积极分子组织起来，经过他们去组织更广大的群众。支部应该分配适当的党员到各个群众团体中去积极参加工作，并且参加群众旧有的一切团体，与群众在一起，领导他们，同时向他们学习。要以民主的作风与群众一起工作，不要包办，不要以支部的领导来代替群众团体自己的领导。要经常注意团结群众的领袖，尊重他们，向他们学习，并吸收他们到党的领导下来。

支部的责任是要引导群众一步步走向共产党的周围，所以应该在各种斗争中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使他们相信我们党的一切口号、主张就是他们的切身的要求，并且为这些口号、主张而努力奋斗。

支部要保证自己对于群众团体的领导完全正确，就必须在支部会议上经常讨论群众团体中党的工作，及时审查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党员执行支部的决定是否正确，以及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应该随时注意情况的变化，使党的活动适合于情况。

第二，支部是征收党员的机关。

支部是征收党员的机关，应该在党员中经常进行教育，使党员了解征收

新党员的意义。共产党组织力量的扩大，是革命运动发展的主要保证，无论为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推动革命的继续发展，均必须如此。征收新党员应是每个党员的经常的重要工作。支部领导机关，必须经常检查和督促党员，按照党章规定，去进行这项工作。

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威信日益提高，许多愿意和要求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革命分子，都在要求入党，这是支部征收新党员的顺利条件，支部应该利用这个条件去大量地征收新党员。但同时支部必须注意，正因为共产党政治威信的提高，敌探、汉奸、反对共产党的分子，正在用种种方法钻进共产党内，进行阴谋破坏活动。有些投机分子，也在企图混进共产党内，达到他个人的目的，并腐化我们的党。所以支部在征收新党员的工作中，应该时刻防止敌探、汉奸、反共分子的阴谋破坏和投机分子的混入。每个党员都有责任，随时随地注意发现并清查和清洗这些破坏党的分子。

支部必须使党员了解：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员必须是不惜牺牲个人一切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自觉的战士。为了保证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纯洁，支部征收新党员的工作，必须把前提放在每个党员的日常群众工作的基础上，在群众运动的斗争中发现积极分子，发现愿意并且能够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分子，接近他们，教育他们，向他们解释共产主义，吸收他们入党。支部必须教育党员，党不是亲戚朋友的集团，随便的吸收一个不合党员条件的人到党内来，这对于党和对于每个党员自己，都是极大的危险。

支部征收党员必须严格遵守个别征收的原则，防止和纠正只要报名、不经审查即吸收入党的办法，防止和纠正“小集团”整批入党而不作个别审查的办法。即使在群众斗争中有一批积极分子具备入党的条件，在吸收他们入党时，也必须逐个进行审查、通过、批准。支部必须教育党员了解党章上所规定的征收新党员的手续和办法，要他们详细去了解准备吸收入党的对象，包括什么样的社会地位，为人如何，在群众运动中特别在紧要关头的表现，判断其是否具备入党的条件。总之，既要保证支部能大量地征收党员，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混入党内。

支部必须要求党员按照党章规定缴纳党费，不能以为这是可有可无的小事。共产党员按月或定期缴纳党费，是应尽的义务。这与服从党纲、党章、党纪和参加党的组织为党工作，同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

第三，支部是教育党员的学校。

支部是教育党员训练党员最基本的学校。支部委员会应该取得上级党部的帮助，有计划地教育党员。支部教育党员的内容首先着重于共产主义的基本教育，以坚定党员的革命人生观。在支部的日常工作中，要监督党员遵守党的纪律，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党员中间各种脱离党的理论、政策、党规、党法等错误倾向。文化程度低的党员，支部应该帮助他们识字读书，督促他们自习，以提高他们的文化政治水平。支部应该教育党员进行群众工作的方法，利用现成的事例和经验教训，教育党员。

支部领导机关和支部中党龄较长的党员，应该担负教育新党员的责任。更重要的是，以自己在思想作风上、工作上、遵守党纪上的模范行为，去教育新党员。

第四，根据地内的党支部要领导党、政、军、民、学各项工作。

我们党领导的政权下的地方支部，应该是乡村政权机关的领导者，地方武装（如自卫军）的领导者，民众团体的领导者。党、政、军、民、学的工

作都是支部所必须管理的工作。这些工作都是为着一个目的：建立和巩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

支部的重要任务，就在领导民众来管理政权，领导群众参加选举，选出群众自己所信仰的领袖到乡政府的领导机关，领导群众去帮助和监督乡政府实施上级政府的指示及群众的决议，包括实行上级政府所颁布的改善民生的一切法令；同时，武装群众去反对破坏抗战法令的分子，肃清敌探、汉奸。总之，支部应保证乡村政权成为群众自己所管理的抗战的革命的政权。

要实现民众自己管理政权，支部必须首先组织民众的武装（如自卫军、少先队等），并把全乡民众组织于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工人救国会等等的团体中，使这些民众武装和民众团体成为乡村政权的支柱。

如果有些地方，政权还握在妨害民族革命战争和反对人民的不良分子的手上，支部首要的任务就在把民众动员和组织起来，用群众的力量和适当的方法，改造政权，清除坏人，使之成为真正民众的政权。如果政权为广大民众所爱戴，而民众团体和民众武装尚未组织起来的时候，支部的任务就在帮助政权机关，去发动民众、组织民众和武装民众，充实和健全政权。这都为着一个目的，就是建立民众自己所管理的民主政权。

支部在民主政权管理下的乡村中的日常工作是：领导群众参加抗日军队或游击队、壮丁队[6]，组织运输队，动员一切男女老幼，进行站岗放哨，协助政府动员征收粮税，募捐慰劳军队，实行优待抗日军人家属，进行一切参战工作，保卫家乡。同时，领导群众协助政府进行一切可能的改良民众生活的工作，如进行可能的经济建设，扩大农业生产，改善农具、种籽、肥料，开垦荒地，改良水利，组织春耕和秋收运动，组织劳动互助社、耕牛站[7]，调剂劳动力，扩大手工业，组织合作社，增加农民收入。此外，还应进行文化建设，如成立识字班、夜校，实行小先生制，举办农闲时的临时学校，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支部在领导这些活动中，应该特别注意动员妇女，她们占有人口的一半，在一切参战参政及建设运动中，没有妇女参加，是不能成功的。依靠支部的努力，要逐渐破除农村中轻视妇女、束缚妇女和对于妇女不平等待遇的现象，培养乡村中的妇女领袖，提高妇女的政治经济的地位。

“支部动员和组织民众的工作，必须首先在党内详细讨论，然后经过党员在政权机关和民众团体中进行各种解释，由政权机关和各民众团体号召，群众民主的讨论，使民众了解党所提出的号召，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动员起来响应和完成这个号召。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响应这个号召中起模范作用，并且要善于团结各民众团体中男女老幼的积极分子，采取竞赛鼓励的办法来完成这个号召。

三地方党部如何领导支部

当一个支部的组织生活和群众工作还不健全的时候，地方党部（区委或县委）对支部进行正确的领导和具体的帮助，有决定的意义。正确的适当的领导可以使不健全的支部健全起来；没有这种领导，即使好的支部工作也会退步，党员积极性不能提高反而下降。

第一，了解支部的情况，给以适当的领导。

地方党部及领导某一支部的同志，要使自己的领导正确而适当，就必先熟悉这个支部党内党外的具体情况，了解支部的历史，每个党员的各方面，支部的环境，如地方情况、群众情绪和阶级关系等。这些不是从一两次会议和谈话就可以了解的，需要比较长期的了解和研究。

因此，上级党部负责各支部的领导人，固然不可能长期不换，但也不能常调，以便熟悉情况，积累经验。不了解支部党内党外的具体情况，就不能作出正确而适当的指导。

地方党部负责各支部的领导人，在指导支部执行上级党部的一切决议和指示时，必须依据支部当前的情况，

并经过支部的讨论，去定出在这个支部如何执行决议的具体办法和步骤，而不是机械的千篇一律的应用。只有这样灵活的切实的领导，才能保证上级决议的完全执行，保证支部工作活跃起来。尤其在某些党员还幼稚、积极性还没有达到应有高度的支部中，地方党部的领导，要善于抓住当时推动工作的最中心的一环，不慌不忙地首先抓住这一工作去推动支部的积极性，提高党员工作的信心，在支部工作的继续前进中，去全部完成上级的决议，使之转变成成为活跃的健全的支部。

第二，培养支部的干部。

地方党部对于支部领导上的重要一环，就是培养支部的干部。没有积极分子，支部工作就不能活跃、健全。要经常注意挑选和培养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或干事），

在政治上工作上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掌握开展工作的方法，提高他们的责任心，要尽可能举办支部干部的临时训练班，或者经常地进行个别谈话。所有这些，是为在支部中培养出干部，使支部能够独立地进行工作。因之，在帮助支部培养干部的过程中，也必须避免上级领导人包办代替支部工作的现象，因为这种方式，是与培养干部的目的相反的。

注 释

[1]社会民主党也有用社会民主工党、社会党和工党等名称的，大多成立于巴黎公社失败后到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相对和平发展时期。一八八九年各国社会民主党联合组成第二国际。第二国际早期在恩格斯的领导下，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恩格斯逝世以后，由于第二国际内部的机会主义滋长，除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以外，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都逐渐蜕化成为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

[2]见第 51 页注[2]。

[3]见列宁《给一个同志的信，谈谈我们的组织任务》（《列宁全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213 页）。在《列宁全集》1986 年版中，该文被收入第 7 卷，题目改为《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新的译文是：“工厂小组对我们特别重要：运动的全部主要力量就在于各大工厂”

工人的组织性，因为大工厂中集中的那一部分工人，不但数量上在整个工人阶级中占优势，而且在影响上、觉悟程度和斗争能力方面更占优势。每个工厂都应当成为我们的堡垒。”（第 10 页）

[4]见第 32 页注[2]。

[5]保甲长即保长和甲长。保甲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管制和压迫人民群众的基层政治制度。保甲的编组，以户为单位，若干户为甲，甲设甲长；若干甲为保，保设保长；若干保为联保，联保设联保长。

[6] 壮丁队原为国民党政权的一种武装组织形式。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关于抗战中地方工作的原则指示》中提出：“利用一切旧政权的武装组织形式，如民团、保安队、壮丁队、义勇军等，实行组织群众与武装群众，并取得其中的领导地位。”

[7]见第 7 页注[5]。

巩固竟和加强群众工作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八日)

巩固党的首先而且基本的工作是巩固党的内部，教育党员，清除坏人。因为只有健全的巩固的党，才能够领导群众去完成它的历史任务。

但是，当着我们去巩固党的基层组织一支部的时候，除了去整理支部内部以外，同时应该加强支部在群众中的工作。推动党员到群众工作中去锻炼，加强党与群众之间的联系，都可以帮助党的组织的巩固。群众工作的好坏，是测量党组织的巩固程度的标准之一。苏维埃时期[1]江西兴国县的群众工作是模范，而这个县的党组织也是最健全的。过去，大城市中有些支部不巩固，时起时伏，大半也是那些脱离群众、不进行群众工作的支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总结苏联共产党历史的基本教训时说：

“当布尔什维克保持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时，他们将是不可战胜的——这可以认为是一个规律。”“如果党在自己的党的狭隘圈子里闭关自守，如果它脱离群众，如果它蒙上了官僚主义的灰尘，那它就会遭到灭亡。”

能不能说我们党没有领导群众或者与群众脱离呢？不能这样说。现在我们党领导着八路军、新四军，领导着广大人民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各种工作，党在人民中有着空前的政治威信。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所有支部都已成为群众的核心。在战区内，在共产党领导的地区（如边区等），能够掌握全村的党、政、军、民、学各方面工作的农村支部还不多。如果我们在巩固党的时期[2]内，把整理党的内部与加紧支部周围的群众工作联系起来，那末，不仅党的组织可以巩固，而且群众工作也会大大深入。两者相互配合的结果，会使整个工作向前推进。

我想说一说战区党[3]尤其是我们领导看政权的地方的党，如何把巩固党的工作与开展群众工作联系起来？

一般他说，那些地区群众工作由上而下建立工作的阶段已经完结，现在应该是由巩固下层来加强上层的阶段。这第二阶段在许多地区还没有开始，少数地区虽已开始但还没有完成。

现在应该开始并完成第二阶段。从何着手呢？一切工作在于乡或者村。不管上级的各个机关有多少决议、命令，但是具体实现这些决议、命令，还是靠乡一级的组织，加强和改造它们的工作是目前重要的一环。

面向乡级之后要进行些什么工作呢？

一、要采取组织上的办法，使党和群众团体接近群众。实现这一点，过去和现在的经验都说明，要把区委及区一级团体所管的地区缩小些，人口稠密的乡也要划小。我们在江西苏区和陕甘宁边区都曾经这样做。区、乡划小以后，由于工作范围缩小，就有可能去接近党的支部和接近民众。现在有些区委管的支部大多了，所以设立了中心支部，区委只去领导中心支部，中心支部成为一级。而且各级管的地区太广，直到县委，都有中心一级，区委则有类似副区委的组织。这样层次愈多，上下联系愈弱，工作推动愈慢，收效也就愈小。

划小区乡，增加区委，岂不是与行政区域不相符合而工作不便吗？如果主张政权要接近民众的话，划小是应该的。但是，即使行政区不划小，党的组织也可以划小，在同一行政区内的几个党的组织，在共同的问题上可以共

同协商。

增加区委，就要增加干部。如何解决呢？可以从下面提拔。不要怕他们能力不够，过去中心支部管理乡村支部的能力决不会比新提拔的区委干部强些，而且在工作中也可以锻炼新干部的能力。

二、支部要经常注意解决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支部的责任，不仅应该接受上级所给的任务，按照当地环境适当地完成，而且要经常了解群众的情绪，群众的呼声，帮助群众解决困难。群众的日常问题愈解决得好，支部及党员在群众中愈受拥护，则一切动员工作也就愈能顺利完成。

现在许多地方党组织很少问问下层和支部中的情况，很少引导支部去注意群众的呼声，很少把“经常解决群众的日常问题”作为指导支部工作的中心之一。一般是把工作布置下去，按级向下要这要那，而不大关心下级和群众的日常要求，如果改变了这种工作方式，则群众工作的活跃，支部的巩固，党的干部在群众运动中的锻炼，都会得到更大的成绩。

我们要向着这样一个目标：支部掌握乡或村的全局，即掌握全乡或全村的党、政、军、民、学的工作。做到了这一点，支部才算得是群众的核心，党在群众中的堡垒。现在个别地区的党已经向着这个目标努力。

满足群众的要求，岂不就要加紧经济斗争吗？我们的回答：共产党人是主张改善民生的，同时又认为，抗日时期群众运动的目的，主要的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加强抗战力量。改善群众生活，并不是说抗战中一定要比抗战前好得怎样多，这是办不到的。我们应该向群众说明：要解除目前痛苦，只有驱除日寇。当然，我们不应该忽视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的任何细小的可能的改善。愈是多注意群众各方面生活之尽可能的改善，他们参加抗日的积极性就愈会提高。同时，经济上改善群众的生活，也不仅是要求解除过度的剥削和不合理的负担，还可以从其他许多积极方面增加群众收入，减少他们不必要的损失。

三、要使群众工作活跃，不在于团体多，会议多。有些地方，一个老百姓在七八个团体名册上都有他的名字，而每个团体又规定五天或七天开一次小组会，十天或半月开一次大会。如果真有这样老实的老百姓，遵守纪律，每会必到，即使不种地，时间还不够分配。显然地，老百姓不能照各团体的章程办。

各团体领导机关的人，少去召开那些开不成的会，多用些时间到民众夜校或类似这样的组织中去接近民众，这里可以自由谈天、不妨讲讲《三国演义》，吹吹“山海经”[4]，谈谈国家大事，说说家常琐事。如果谁愿意这样耐心做，群众会由少而多，甚至不请即来。那时候什么农民救国会、青年救国会的任何一个抗战动员，都可以顺利地群众中得到解决。各团体的相同的动员工作，也可以彼此不重复而集中地去解决。这种方式行得通而且做得好，是被经验所证明了的。

当然这种深入下层工作，不能了解为我们不要自上而下的活动，而是要使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者配合起来。

四、要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民众组织于团体之内，主要问题是组织妇女的问题。现在虽然还有些男子未组织起来，或者还只是形式，但总算组织了。儿童一般地喜欢唱歌上操，所以也大体组织了。老年人除了少数以外，也组织在农民团体中了。那末，为什么我们计算各团体会员的数量总是不及这一地区总人口的一半呢？这很明显，是占人口一半的妇女还未组织起来。有些

地方名义上“组织”了，但还未“起来”，实际没有组织。妇女是群众运动中巨大的力量，哪个地方妇女已经发动起来，这个地方的群众运动就深入了。过去中央苏区的经验如此，现在有些战区也是如此。

在共产党内，加紧妇女工作是中央的指令，为什么妇女工作还是落后呢？我问了四个乡村支部书记。当他们抽象他说到“妇女工作重要”的时候，似乎也很认真，可是我问：“你的老婆参加了党没有？参加了妇救会没有？”他们虽然在不同地方不同的谈话中答复我，但答复的内容是半斤与八两：“她懂什么事？有什么用？”原来还是那个争论的大问题：“妇女有用没有用？”共产党员不打破“女人无用”的观念，连自己老婆都看不起，说服教育不了，那还说什么领导民众、组织民众呢？

如果我们在群众工作方面加一番努力，把它做得更好，可以使现在某些群众团体改变“官办”的性质，涌出许多群众领袖，变成群众自己的团体，不仅群众工作可以做得更好，而且也会帮助我们巩固党，鉴别谁是好的共产党员，谁是混进党来的坏人；还将使现在缺乏经验的党员和下级干部，在阶级意识上、工作经验上得到许多锻炼。

群众工作的深入，将使敌后的抗日根据地更加巩固，抗日军队更易补充，抗日政权更能动员民众。所有这些，正是我们在敌后坚持长期抗战所迫切需要的。我们提出巩固党和加强群众工作，也正是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支持敌后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

注 释

[1]见第7页注[7]。

[2]这里所说的巩固党的时期，指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以后的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自抗战以后，特别是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定以后，党的组织在短期内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不少党的组织很不巩固。为此，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指出：在巩固党的时期内，党的发展一般应该停止；详细审查党员成分，清刷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地主、富农、商人）、投机分子，以及敌探奸细，加强党的保卫工作和秘密工作；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阶级教育和党的教育，特别要加强对党的各级干部的教育；加强党的纪律性，严密党的队伍，把党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以反对国内投降分裂的危险，引导抗战到最后的彻底的胜利。

[3]战区党指当时红军与国民党军作战地区内中国共产党的组织。

[4]《山海经》是中国古代的一部著作，内容主要为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不少远古的神话。这里所说的“吹吹‘山海经’”，意思是谈天说地。

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三日)

我与华北六个不同地区做党的工作的同志谈话以后，觉得华北工作最弱的一环，是群众工作。这不但是华北的问题，也是华中、华南、其他战区和敌占区的问题，是全国一切地方的问题。要使抗战前进一步，要使我们党的工作前进一步，问题的根本，在于开展群众工作。这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

今就华北经验，并依据战争环境的特点，分为下面几点来说。

充分发动群众是开展一切工作的关键在华北的许多抗日根据地内，我们党内及党外的的工作，都有伟大的成就。但是，如果再看另外的一面，那也会看到工作还有不足的地方，还有弱点。

从党的方面来看。华北的党组织是新发展的，是大量地迅速地发展起来的。因此，一方面党员的阶级教育还很缺乏，另一方面，党内也混入了一些坏人。支部是新成立的，同志们的工作经验不足，大多数支部还没有变成当地群众的核心。县委以下的干部，绝大部分是新的，他们也缺乏工作经验。同时，在某些领导机关中又混进了一些不忠实的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

从政权方面来看。华北的多数抗日根据地内，乡村的政权还不是掌握在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人员手里，土豪劣绅及为非作恶的分子，仍把持着大部乡村政权，充当乡长村长。虽然上级政府曾经设法改造乡村政权，但因为一般是自上而下地改造，从下面，从群众内部去发动群众非常不够，所以改造工作未曾深入。由于乡村政权未经改造，政府的进步法令及进步措施，就不能完全实现，甚至有些被人曲解，被人倒行逆施了。例如，某县的地主把持乡政权，他们把各种负担都加在抗日军人家属及贫苦工农身上，却美其名曰“起模范作用”。

从军事方面来看。华北是处在艰苦抗战的环境中，需要大量人力、财力、物力的补充。而这些补充只能依靠民众。如果要民众在人力、财力、物力上诚心诚意、源源不绝地帮助军队，就必须在民众运动方面进行最好的工作，否则是不可能的。今天在华北各个抗日根据地，要发动民众更广泛地在人力、财力、物力上援助军队，非依靠党在群众中进行大量的组织工作不可。例如，过去党在江西苏区[1]的组织工作就是这样。一九三三年红五月时，一次即动员了六万三千人当红军。如果拿这样的标准来看华北，今天大多数根据地内的群众工作，还差得很远。固然情况不同，过去江西是实行土地革命政策，而现在的华北还无这个条件。但减租、减息、减税的政策，如果坚决地实行了，再加上党的组织工作，动员相当广大的人力、财力、物力援助抗战，是完全可能的。如果再拿今天尚未建立政权的游击区来说，在那里要坚持残酷的斗争，并使之转变为根据地，那末，群众工作的好坏，也是决定的条件。

从民众团体方面来看。应该指出，只在个别地区民众团体工作真正有了成绩，在大多数区域，还仅仅是一些自上而下、由政府帮助组织的民众团体。由于发动群众的工作，或者根本没有做，或者做得非常之不够，所以好多民众团体，在民众自己来看，并不是他们自己迫切需要的团体，而只是为军队为政府服务的机关。乡村的民众团体，大多数还是很健全的，其中许多仅仅是“抄名册”的。因此，民众团体中也就至今没有涌现出著名的为广大群众真正拥护的群众领袖。民众团体在大多数区域中，还没有成为抗日政府的

支柱。

从上述几个方面都可以看出，我们的群众工作确是最薄弱的一环，党、政、军、民、学各种工作之健全，虽然都有它们各自的单独的工作，但是把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工作联系起来，使各方面工作都能进步，都能发展，都能健全，基本的环子就是开展群众工作。如果不把这一环抓住，克服我们在群众工作方面的弱点，便无法坚持抗日根据地，无法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

但是，群众工作千头万绪，究竟应该从哪一点做起呢？究竟应该采取何种方针，才能变薄弱的狭小的群众工作为真正广大的群众工作呢？不是别的，就是在党的领导之下，从维护群众自己的利益出发，从群众内部去发动群众斗争，把群众团体自下而上地建立起来。这样，群众的利益与那些把持乡村政权为非作恶的乡长村长的利益之间的矛盾，就会尖锐化。在共产党和上级政权推动之下，就很容易去改造这些乡村政权，使之掌握到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乡长村长手里。这就是说，开展群众工作乃是彻底改造乡村政权的主要办法。为群众自己利益而斗争的群众运动开展起来了，群众在斗争过程中就会体验到，自己的力量就是团结和组织，群众团体也就可以在这一过程中健全起来，成为真正群众自己的团体，群众领袖才会真正涌现出来，群众的抗日积极性也才能提高。也只有这样，才易于使群众懂得维护本身利益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不能分离的，才能使群众更加积极地多方面地援助军队，军队的扩大、加强和物质保证才有深厚的来源，坚持长期抗战才说得上有有了可能性。

至于说到巩固党，那末，历来的经验证明，没有一个脱离群众的党组织是巩固的。一切脱离群众的党部，都是最不巩固的党部。所以，只有党与群众密切的联系着，只有党的支部真正成为群众核心的时候，那个党才是一个巩固的党，那个支部才是党在群众中的堡垒。现在党内发生的各种弱点，不管是党的组织方面的还是党的工作方面的，都是同脱离群众相联系的。为群众自己利益而斗争的群众运动真正开展起来了，就能鉴别谁是真正为民众利益而奋斗的共产党员，谁是别有企图混入党内的坏人。这样，清洗党内坏分子的工作才有客观的基础。只有群众运动，才能给新党员和新干部以实际的阶级教育，单单书本上的教育是非常不够的。我们的新党员和新干部缺乏群众工作经验的弱点是普遍存在的，他们领导群众运动的经验是很少的，但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在群众运动中锻炼和提高。他们今天没有经验，明天就变成有经验的了。参加群众工作越久，他们的经验就越丰富。他们在群众工作中，不可避免地要犯一些错误，但同时即取得了经验，取得了进步。

改善群众生活才能发动群众

“不发动群众，抗战就不能胜利。”这个道理，我们大家已经懂得。但是，有很多的同志还没有明确了解，要使群众起来，必须改善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我们的同志在华北各个抗日根据地内，都进行了这方面的工作，而且有许多成绩。但是，许多同志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还不深刻。有些地方的同志对于抗战主要是依靠工农呢，还是平均地依靠社会各阶层，这样的基本问题，还没有弄清楚。有些地区虽然政府颁布了不少进步的法令，但还没有使之彻底实现。

经验已经证明，哪个地方群众的生活改善了一些，群众就更加积极了，群众团体就更有组织了。如果哪个地方没有注意改善民生，或者虽有改善民生的法令，但实际上没有实现，群众就照旧起不来。凡是群众起来了的地方，汉奸的活动就要少些，也易于制裁些。所以为了对付汉奸，也要依靠群众的力量。

如果我们定下了改善民生的方针，那末，这个方针的实现也要依靠群众自己起来奋斗。过去上级政府减租减息的法令在许多地方没有彻底实现，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发动群众自己起来奋斗非常不够，或者并没有去发动。所谓发动群众自己起来奋斗，就是动员乡村一级的各种组织，首先是党的支部，深入各个阶层的群众中去，经过群众的讨论和决定，经过群众的斗争和努力，去实现减租减息的法令，实现那些今天可能实现和必须实现的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地方党部如果不关心群众的生活，不为群众的切身利益而斗争，置群众的痛痒于不顾，而要开展群众运动，要群众热烈起来与党与政府与军队一道艰苦奋斗，这是不可能的事。

把解决群众的切身问题列入地方党部的经常议事日程

群众的切身问题，不只是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等事，还有许多日常的生活问题。所以，党的区委、支部、小组的一项经常议事日程，应该是研究本区、本乡、本村群众的切身问题。群众的情绪如何，有些什么困难，有些什么要求，如何解决，都是地方党部，尤其是区委和支部，应该严重注意的。把区委和支部的注意力引向讨论和解决群众的切身问题，引向当地的群众工作，是今天严重的任务。

根据我与华北不同区域的九个支部同志谈话的结果，知道大多数支部是不讨论群众的切身问题的。他们的经常工作，是依照区委的布置，发展几个党员，动员几个人当兵，要多少粮食和军鞋，而且一概是分派，没有造成热烈的群众运动。他们是只向群众要东西，至于群众要些什么，就不管了，就不讨论了；不但如此，而且还应该说，我们有许多支部会议没有什么明确的内容，同志们并不知道开会做什么，会议只是一种宣传。中央组织部的巡视团曾经参加过华北某乡支部的一个小组会，区委同志和支部书记都来参加了，没有提出任何要讨论的问题，就要求党员发言。到会的党员不知说什么好，因此互相推诿，结果公推了一个平常会说话的党员起来说话。于是这个同志就说：“我不会说话，不知说得对不对。我们是共产党员，每个同志要缴党费，这是为了惦记党。党费是每月三个大子儿，没有大子儿，缴鸡子儿也行，小米也行，完了。”经他这一说，算是打破了沉闷的空气，于是第二个同志也起来讲话了：“我们一定要缴党费……”。会上共有三个党员说了话，都是“缴党费”一套。区委同志和支部书记一言不发，小组会就此散会。这样的会议如果多开几次，恐怕谁也不愿再来了。完全脱离群众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区委、支部和小组，一定会失去群众的支持，是非常危险的。

基层党组织也有好的典型。晋察冀边区有一个好支部，这个村上已经动员五十人去当八路军和出外参加救亡工作，占了全村人口的百分之十三。而在旁的地方，还不到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在那个村，村公所代表会是真正群众选举出来的，救国公债和救国公粮都完成了计划，优待抗属组织得很好，合作社开办了，减租已经实行，有了低利借贷所，减息已经实现。群众的各种团体，都组织得很好。妇女也发动了，有了妇女自卫军。所有这些，都是群众自愿进行的。为什么这个支部的工作做得好？基本原因，就是这个支部密切联系着群众，抓紧解决群众的切身问题，在十次会议中有六次讨论群众的切身问题。我想，这一模范例子，已经足够证明我们所有支部都应该怎样工作。

支部用极大的注意去关心和讨论群众的切身问题，会不会妨碍上级所分配的动员计划呢？不但不会妨碍，正是“顺水推舟”，为动员计划之“舟”准备好汪洋之“水”。地方党部，尤其是区委和支部，一定要把完成动员计划问题与解决群众切身问题联系起来，只有对群众切身问题有了很好的解决，才能把动员计划造起一种热烈的群众运动，为广大群众所拥护，并且高兴地去完成。

至于解决群众切身问题的办法，这不应该而且不可能有固定的方案，必须看当时当地的情况。但是，有一点是确定不移，到处适用的，这就是：解决群众切身问题的办法，必须在群众中去讨论，到群众中去找寻。因为只有群众才真正了解他们自己的问题，只有在群众中才能讨论出在当时当地解决

问题最适当的办法。我们的地方党部，我们的区委和党支部，只有收集了群众的意见，才能作出很好的决定，否则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常讲的那句话：共产党员“每天都是民众的教师，但又每天都是民众的学生”[2]。共产党员要领导群众，就必须首先向群众学习。“三个臭皮匠，凑成个诸葛亮。”离开群众，世上是没有什么诸葛亮的。

注 释

[1]见第7页注[7]。

[2]见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3页）。

陕甘宁边区的群众工作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日)

陕甘宁边区是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工作都很有成绩，这次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总结了各个方面的成功经验，同时也检查了这两年工作中不足的地方，以求得改进，既肯定成绩，又检查缺点，这是我们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

现在我讲讲关于群众工作的问题。

根据在华北的经验，创建根据地一定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建立军队。没有军队，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在华北，我们一开始就派部队去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在冀东、山东，日本一进攻，国民党垮台，八路军还没有去，我们的地方党就首先搞起游击队来，结果成绩很好。有了军队，就可以把政权建立起来，把地方党扩大起来，接着把群众团体也组织起来。所以说，有了军队便什么都有了。大革命失败后，地方的党几乎都被破坏了，只有在有军队的地方，党没有被破坏。陕北也是这样，刘志丹等同志很早就在这里组织游击队，进行武装斗争，建立了根据地。现在的陕甘宁边区，如果没有留守兵团和保安部队，我们也就不能在这里存在，早就被人家赶跑了。

第二阶段是大规模地建立党，迅速地大量地发展党员，军队建立了要扩大，还要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这都要依靠党。尤其在农村，人口分散，更需要有较多的党员来领导。在新开辟的地区，党员在数量上一定要多，同时还要发展得快。如果慢了，日本帝国主义就要搞它的一套组织，还有顽固分子也要来与我们磨擦，所以，先下手为强。

党组织建立以后，就要深入地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这是第三个阶段。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建立军队、建立党、建立群众组织这三个阶段，是截然分开的。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要靠军队、要靠党深入到群众中去。假如这个工作做不好，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也就不能存在。因为没有群众，军队是不能扩大的；党脱离了群众，就成了光杆子的党，这样的党也是不能存在的。所以，发动群众是为了巩固前两个阶段，这个阶段完成以后，根据地就巩固起来了。那末，这是不是说，在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就没有群众工作了呢？还是有的。在军队建立后，就可以先成立群众组织。不过在第一、第二阶段，是自上而下地组织群众。这个从上而下的组织工作，是必要的，也是必经的阶段。但这样建立群众组织，虽然很快，也有很大弱点，就是不巩固，还不能成为群众自觉工作的组织。所以到了第三阶段，就必须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

陕甘宁边区的情况怎么样呢？大家都承认，边区的群众是有革命传统的，对党中央是全心全意拥护和支持的，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和抗日热情。但正如大家所指出的，今天边区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的工作，还做得不够。不要以为有了各种群众团体，群众就发动起来了，只挂牌子是不成的。这些组织应该自下而上地加以充实、健全和提高。现在的任务是要着重乡级的工作，这是群众工作重要的一环，是巩固根据地必不可少的一步。关于边区今后的群众工作，我提出几点意见，供大家讨论。

一、继续改善人民的生活。

我们要注意群众的切身问题，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这是发动群众的关键。陕甘宁边区群众的切身问题解决了没有？边区有些地方经过土地革命，现在没有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群众有了土地，实行了民主，生活得到了改善，老百姓都有了吃的穿的，可以说大的问题解决了。但是，还有部分的问题没有解决，党、政、军要继续帮助群众解决。比如，现在边区商业资本的剥削很厉害，要想办法使群众不受这种剥削，就要着手办合作社。还有一部分地区的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各地方普遍缺少农具，许多抗日军人家属缺少劳动力，以及卫生条件不好，生了孩子养不活，等等。这些问题，都应该帮助他们解决。像组织代耕队帮助抗日军人家属，这是关系巩固部队的重要事情，不要看轻了。如果这个工作做不好，扩大军队就困难，甚至会影响军队的巩固。总之，群众有许多实际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这些问题解决得好，群众会更信仰我们党，我们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就越来越高。大革命时彭湃同志在海陆丰，为什么受农民的拥护，为什么他在农民中间有很高的威信？就是因为他很关心群众的疾苦，随时随地帮助群众解决问题。农民的一些问题，在我们有的同志看来是很小的事情，可是在农民自己看来却是很大的事情。我们不仅要帮助群众解决大的问题，也要帮助群众解决小的问题。我再说一个例子。有一个农民的父亲死了，他家的地被别人霸占，无法生活，后来我们的一个同志去帮助他把三亩地收了回来。从此以后，不仅这个农民，而且全村的群众对这个同志很信任，很快地建立起党组织。像这类的问题，在群众中多得很。我们帮助了群众，群众就会积极、热情地来帮助党和政府的工作。

边区建立了人民的革命政权，我们党是有政权的党。我们要向群众要东西，如果不要，就没有饭吃。但是，当权的党容易只是向群众要东西，而忘记也要给群众很多的东西。如果真是那样，群众就会把我们看成强迫摊派的命令机关。所以，我们不应该只知道向群众要东西，更应该时刻注意为群众谋福利。关于这一点，不论党、政、军、民各团体都应该注意，把改善群众生活的工作做好。

二、把参战动员变成热烈的群众运动。

现在边区的参战动员还没有能够形成热烈的群众运动。在这个问题上，要向群众进行宣传解释工作，提高他们的觉悟。要向他们讲清牺牲眼前的利益，是为了长远的利益，牺牲小的利益，是为了大的利益。动员时一定要适合群众的心理，使他们自愿地热烈地参加抗战工作。

在战争动员中，首先要对干部和党员解释清楚，只有经过今天的困难才有将来的胜利。有些同志经不起困难的考验，甚至为了一点私利，便丢掉共产党员的党性。我们现在吃点苦，是为了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解放，大而言之，是为全世界二十万万人民的解放。我们为这样伟大的事业而奋斗，牺牲个人一点利益算什么呢？

在战争动员中，一方面要向工农劳苦大众解释，另一方面要向坏分子作斗争。向破坏战争动员的坏分子作斗争，就能提高劳苦大众的积极性。这两件事是不可分割的。又如缴救国公粮，共产党员和劳苦大众是积极的，该出一斗的出二斗。但是，有的人便不然，该出五斗的只出一斗。要地主老财自愿出粮出钱是不行的，一定要规定他们应出多少，少了不成，抗拒的要批评、斗争。当然，简单的斗争或乱斗也不好，斗争需要讲道理。我们并不是对一切有钱的人都斗争，只有做坏事的人我们才同他作斗争。

在战争动员中，政府要规定一些法律，照法律办事。比如要按照壮丁的

数目规定参军人数。这一方面要向群众作深入的动员，另一方面政府下的命令一定要执行。此次代表大会通过要扩大三千战士，就要用这样的办法。政府的法令，不论干部和群众都要遵守，干部要起带头、模范作用。

三、做好行政村[2]的工作。

行政村的工作是发展群众运动的中心一环，它是县的工作的枢纽。我们的工作要深入下层，就要深入到乡和行政村中去。真正贯彻执行上面的方针政策和命令，要靠乡和行政村的干部。比如党中央向特委、县委、区委发出一个要大发展党员的指示，直接做工作的还是乡支部，只要基层组织积极、认真、切实地按照中央的指示去做，什么事情都可以行得通；如果基层的组织干部不积极工作，那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

做好行政村的工作的关键在党支部。要建立一个纯洁的、健全的、得力的党支部。有了这样的党支部，就可以领导党员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就可以领导各个群众组织有秩序地进行各项工作，开展扎扎实实的群众运动；就可以向各种坏分子及不良倾向作斗争，领导群众更好地完成党和政府的各项任务。党支部要真正成为乡村一切组织的核心，成为完成一切任务的领导力量。

我们要深入下层，做检查工作，不能只看下面的报告。报告上都说，任务完成了，但实际一检查，就可以发现任务完成得不一样，完成任务的办法也不一样。这里可以说说我曾经看过的两个县。一个接到上面一个命令，要动员五个人参军，于是向土豪劣绅要了一些粮食，召开了群众大会，说谁来参军，就给谁家多少粮。这里的任务虽然完成了，但工作基础是不扎实的，方法也不好。另外一个县，支部工作做得好，动员参战先做宣传解释工作，而且做得很深入，很细致，动员去的战士没有一个开小差的。同样是完成任务，但是他们的工作有很大的不同。检查基层工作，特别是支部工作，比检查县委和区委的工作还要实际。

要开好行政村的群众大会。行政村地方比较大，人口比较多。凡是关系到全体人民的事，要召集群众开会，大家讨论。这样一来，我们工作就深入到群众里面去了，同时也发扬了民主。但是，开什么会，怎么开法，讨论什么问题群众愿意来，群众来开会走路方便不方便，都要认真考虑，作好准备。总之，会议内容应该主要讨论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形式要生动活泼，而且不能耽误群众很多时间。

四、健全群众团体的工作。

各个群众团体既要做好一般的工作，又要做好各自单独的工作。比如要动员新兵上前线，动员缴纳救国公粮，各个团体都要参加，这是共同性的工作，但除此而外，它们还有各自单独的工作，如工会要管理工人，妇救会要组织妇女，青救会要动员青年，等等。群众团体不注意各自单独的工作，不注意自己本身的工作，是不对的；专做本身的工作，不问一般的工作，也是不对的。要注意把两方面的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如果是有关各个群众团体共同的工作，可以召开各界联合会一起讨论，统一解决。这样，就可以使各个群众组织的工作都能既独立自主地又相互配合地开展起来。

在群众团体内部，要来一个民主的改选运动，真正选举出群众中的领袖人物。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一般来说，对一个人，如果群众普遍认为是好的，便不会有什么问题，选举中党应该去保证；如果群众多数不赞成，我们去保证只会使群众不满。我们党内实行民主选举，群众团体的选举更应注意

发扬民主，上级简单地提一个名单是不好的，要把发扬民主当成一种制度，形成一种风气。

注 释

[1]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三日至十二月十六日在陕西安塞县举行。会上，毛泽东作了政治报告，陈云、李维汉等讲了话。这次代表大会，对于进一步建设陕甘宁边区，支援抗日战争，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2]行政材是农村的基层行政单位，由一个或几个自然村组成。

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日)

干部队伍的建设的党的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现在我讲几点意见。

第一点，提高老干部的政治文化水平。

边区老干部很多。老干部是我们的骨干，他们有宝贵的经验。老干部参加革命到现在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是，我们自己问一问，老干部领导革命的本领够了没有，在政治上文化上各方面的本领够了没有？还不够。因此，应该天天努力提高我们的本领，提高我们的水平。工农出身的同志因为过去吃了地主资本家的亏，他们的文化程度低，写也不会，书也看不懂。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觉得自己文化水平低，吃不开了，唉声叹气；另一种是下决心来努力提高文化程度，一年不成两年，这样慢慢地学下去，就可以赶上来。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今天不懂明天就可以懂，应该有这样的学习决心。没有文化不成，不要说别的，如果没有识字的人，军队中连文书也找不到，工作便不能做好。干部没有文化，没有知识，革命是革不成功的。

文化与政治是密切相联的。如果没有文化的提高，要提高政治水平是不可能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有很多理论著作，给了我们很多的东西，如果不识字，没有相当的文化程度，要学懂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能的。许多不识字的同志都是好同志，但有时了解问题眼光不远大。不识字不能看报，许多地方发生的事变不了解，许多东西不懂得。没有文化，政治水平很难提高，不能看得远，只看到目前，只看到陕北。这不行，要看到全中国，看到全世界。许多同志以为自己年纪大了，不能学习，实际上是可以学习的，没有一个人从娘肚里出来便是知识分子。一些同志以为学习便要进党校、马列学院。能够进党校和马列学院学习当然很好，但不能大家都去。因为学校没有那样大，不可能住很多人；同时工作还要有人去做。问题怎样解决呢？就是毛主席说的进“长期大学”，就是要坚持自学。你现在二十几岁，活到六十几岁还有四十年，学成之后是头号的“博士”。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我们的特委、县委、区委的领导同志，要有计划地看书，要好好地学，长期地有恒心地去学，像党中央的干部一样。这件事，对领导干部是重要的。自己的知识。不增加，不提高政治、文化水平，要想工作有进步是很难的。从什么时候学起呢？从一九四〇年一月一日起吧？不行。要想到便做，从现在就学起。负责的人要带头学，你这样做了，别人也会照样去做。

第二点，提拔新干部和新老干部团结的问题。

先讲提拔新干部的重要。现在的干部是不是够了呢？很不够。边区党委就常说干部不够。天下很大，现在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开展，新的根据地在不断建立，军队在不断扩大，党在全国需要用很多干部，如果没有大批的新干部补充到干部队伍中来，我们的革命事业就要停顿不前，就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有些人说，新干部没有老干部老练，经验不如老干部多，资格不够。照这样说来，就没有办法提拔新干部了。很明显，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老干部都是从新干部锻炼出来的，有经验的干部开始也都是没有经验的。新干部经

过锻炼，就会从没有经验变成有经验，由不老练变成老练。至于说到资格，那末，资格不老的干部不一定都做不好工作。当然，我们的工作要以老干部为骨干，有资格的老干部做县委工作、区委工作固然很好，但是，有的地区干部的党龄都非常短，那也只有靠资历较浅的干部担负领导责任。比如在华北那个地方，如果都要有八年以上党龄的人才能做县委、区委的工作，那末，在整个的华北就没有几个能担负县委、区委工作的同志。那里的干部绝大部分是在一九三六年、一九三七年参加工作的学生。因为那个地方是在抗战以后，我们的八路军到了才搞起来的。就是靠这些干部打开了局面，工作开展，而且搞得相当好，如果没有新干部，华北的根据地就建立不起来。边区虽然老干部很多，但是也要大量提拔新干部。这不仅是边区工作的需要，而且以后要为全国输送干部。

抗战以后，我们党接收了大批的知识分子到党内来，参加军队工作和政府工作，进行文化运动和群众运动，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但是，也还做得不够，在某些地方还出了一些毛病。党中央最近作出了一个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为什么要专门作出这样的决定呢？这是因为，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力量，并且是重要的力量。我们要把这个力量吸收进来，在抗战工作中，在革命事业中，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现在我们的抗战工作，建设根据地的工作，基本上是在农村里面进行的，需要大量的革命知识分子干部到农村去，到军队中去，做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没有知识分子，革命就不能胜利。

过去有的地方对于知识分子不敢放手使用，甚至把他们排挤出去。在某些老干部里面就有排挤知识分子的现象，因为他们没有懂得知识分子的重要，不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知识分子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有很大不同。我们国家里，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愿意为工农阶级服务的，他们有更多的革命积极性。在历史上，五四运动就是由先进的知识分子发动和领导的。五卅运动、一二九运动都有大量的进步学生参加。至于参加抗日战争的学生，那就更多了。这些运动，对于我们党的建设和发展，对于中国革命的推动，对于抗日救亡运动局面的打开，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再看农村里的革命，不少领导人也是知识分子。彭湃同志在广东省领导过四十二个县的农民运动，他就是一个知识分子。领导陕北革命的刘志丹同志也是知识分子。再推远一些，辛亥革命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他也是学生出身。这些事实都证明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要革命的，许多革命是靠知识分子来领导的。

有些同志有一种错误的认识，他们不加分析，笼统他说知识分子就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我们说，知识分子有的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有的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在中国，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国民党在抢，我们也要抢，抢得慢就没有了。日本帝国主义也在收买中国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如果把广大知识分子都争取到我们这里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那末，我们虽不能说天下完全是我们的，但是至少也有三分之一是我们的了。

吸收大批知识分子到我们这里来，分配到各地开展工作，这样就发生了一个新老干部的团结问题。过去在军队或者是党政部门都发生过新老干部不团结的现象，现在有些地方也发生了这样的问题。这里说的老干部，就是土地革命时期出来的干部。他们中的有些同志往往看不起新干部，总是说，你才参加革命几天，有什么了不起，我革命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呢。

有些新干部也看不起老干部，他们把老干部看成“土包子”，说你过来，我和你谈一谈马列主义，你懂吗？这样一来两方面就对立起来了，关系就搞不好，互相不接近。新干部和新干部在一起，老干部和老干部在一起，工作就一定做不好。

现在我们新老干部、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应该团结起来，取长补短，互相学习，共同提高。这是革命的需要。我们许多老干部，他们有一肚子的实际经验，但是讲不出来，写不出来，知识分子新干部读书多，会说会写，但是没有实践经验，写出来的东西往往很空洞。一个是会写没有经验，一个是有经验不会写，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非常需要互相帮助，彼此学习，共同提高。

我在这里要讲清一个问题，新的知识分子干部，会有不少毛病。老干部有责任帮助他们克服弱点，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老干部不应该忌妒新干部有才有识，也不应该向人家摆架子，而应该向他们学习。新老干部一走要团结，如果闹不团结，主要的责任应由老干部担负。因为你是老干部，怎么能够和新干部一样犯毛病呢？你从前也是新干部嘛！所以我们要帮助新干部。现在我们党内有许多新的知识分子干部，新的工农分子干部，他们都有许多毛病，这要慢慢地去克服，才能使他们逐渐变成一个好党员。我们对新的知识分子干部不应该害怕，不要认为有了他们，老干部就吃不开了。不是这样的。党是以老干部为骨干的，但是仅有老干部还不够，还需要大批的新干部。老干部是宝贵的，新干部也宝贵。

第三点，干部中间的思想斗争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反对干部里面怕斗争的倾向。我们不主张乱斗，而是主张在原则问题上进行必要的斗争。因为各个干部的思想意识不同，还有剥削阶级的影响，所以对一切不好的倾向必须斗争。斗争是为了教育全党，并帮助一些同志克服他们的毛病，挽救一些人，以免他们的错误继续发展，甚至跑到反革命的阵线去。党内不允许无原则的和平，更不允许相互包庇。有了错误不进行必要的斗争是不对的。

党内斗争主要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常常说，共产党员只有掌握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才可以不断前进。这是非常重要的，你们可以翻一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本书，在这本书里总结苏联革命成功的六条经验，其中第五条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那里说：“如果党不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如果它不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如果它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来教导和教育干部，如果它善于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它就会是不可战胜的。”

我要特别着重他说，领导着政权的党，领导着军队的党，自我批评更加重要。因为党掌握了政权以后，犯了错误会更直接更严重地损害群众利益。党员违犯了纪律，特别容易引起群众的不满。你有枪，又当权，群众看到了也不敢讲。所以，一定要严格要求我们的党员和干部，并且经常倾听群众的意见，有人做了违背群众利益的事，就要给以严肃的批评，以至纪律处分。对于违法的人，例如贪污分子，还要发动群众去斗争，并绳之以法。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首先应从领导做起，检查自己有什么缺点，有什么错误。先检查自己，批评自己，不能只说下面不好。如果工作出了毛病，作为领导者，自己应首先承担责任，不能上推下卸，倭过于人。一般说来，看别人的毛病比较容易，看自己的毛病比较难。领导者本来有责任，但不批

评自己，光批评别人，这种批评便没有效力，别人是不会接受的。在批评下级的时候，领导者说话要慎重。领导者一句话说得不妥当，在下面就可能产生不好的影响。有的话在上级会议上可以讲，如果在别处随便讲，便会引起不好的后果，使下级不满。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从维护党的利益出发，要坚持原则，要实事求是。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采取客观的态度。看问题要全面，要看本质，不要只看局部，看现象。在我们这次代表大会上，党、政、军、民各方面都对自己的工作作了很多的自我批评，这很好。从总的方面看，我们的军政关系是好的。八路军对于边区的工作有没有帮助？帮助很大。比如它完成了保卫边区的任务，这是一大功劳。边区各级政府对于八路军好不好，帮助大不大？是好的，帮助也是很大的，首先是解决了军队的吃饭穿衣问题。这是从大的方面看。只有从大的方面看问题，才能把问题看得全面，看得远。地方的同志要真正地帮助军队，有了小的矛盾要向群众作解释工作。同时，在军队内部要进行教育工作，使广大指战员体谅群众的困难。这是我们领导者的责任。如果军政两方面都能这样，我想这次大会以后我们的工作是可以大进一步的。在军民关系的问题上，八路军与群众的关系是好的，比旁的军队好得多。但也还有缺点。这些缺点不改正，会在群众中产生不好的影响。在这方面，军队应该多责备自己，时刻注意把军民关系搞好。军队应更好地帮助群众，这样就可以取得群众更多的帮助。地方的同志也要看到自己工作的不足之处，多责备自己。两方面都只说人家的长处，不说人家的短处，这样，关系就可以搞好了。

第四点，纯洁干部队伍。

边区的党员和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有没有坏的呢？当然也有。坏人有两种，一种是从外面混入边区的，一种是在边区的和平环境中产生的。这两种坏人已经查出一些，现在还有未查出的，正在继续审查。

我们有的同志往往是太老实了，只看到公开反对我们的分子，而没有看到那些表面上很革命，而实际上反对我们的坏人。有些人本来是反对共产党的，但是共产党一到那里，他为了保存自己的财产，也跑到共产党里头来，说要革命要抗日。还有破坏分子，也用这种方法混入我们党内和政府内。有些地方的领导机关失去警惕，往往把这些坏分子提拔成为干部，这些坏人就钻我们的空子，搞各种破坏活动。坏分子一般都是采取两面派的办法欺骗我们。但是，只要我们提高革命警惕性，他们的真面目还是不难识破的。做坏事的人表面上虽然装得很好，但心里是坏的，一定要做坏事，形式与内容相矛盾。他能够在一段时间里装假，但他不可能在很长时间里始终装假。有句老话：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他一件事情可以装得好，但一百件事情就不能都装得好。现在我们的同志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当然；还有一种人，他本来是我们的同志，但是在根据地的和平环境中腐化变质了，也去做坏事了。有人以为共产党内没有坏人，这是完全不对的。在革命运动中，特别在大发展时期，革命队伍里会混进坏人，少数本来革命的人会变质，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我们的任务是不断纯洁干部队伍，纯洁党的组织，与各种坏人作斗争。

我们内部是巩固的，坚强的，如果敌人打过来，就可以把他们打出去。最怕的就是我们内部有坏分子。如果内部不巩固，外面的进攻就抵抗不住。因此，要做好防微杜渐的工作，我们对于这样的问题，既不要麻木不仁，也

不要惊慌失措，麻木不仁会给坏分子以可乘之机，惊慌失措则会把事情搞乱。只要我们采取既坚决又稳妥的办法去做，纯洁干部队伍，巩固党的组织，是有保证的。因为我们有政权，有枪杆子在手，同时最大多数的群众也是拥护我们的。对于所有做过坏事的人，危害过党的事业的人，应该严肃地进行思想教育和组织审查。如果他硬要那样做而不肯改正，就只有开除，以至法办了。

同志们！我们不要把以上的问题看成是小事。这些问题解决了，对于巩固我们的党，对于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于整个革命事业的发展，是有很多好处的。边区的工作做好了，对中央的工作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我们要有远大的眼光，要有很大的气魄，把边区的各项工作做好。

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

在党的六中全会[1]上，中央和毛主席提出，把学习作为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一项任务，大家都接受了这个任务。一年多来，虽然进度不同，但大体上都在学习。交换一下学习的经验，对于今后的学习是有帮助的。

我觉得对于学习的意义认识得够不够，是决定我们能否下决心学习的关键。我们过去对于学习的意义了解得不够切实。比如大家读过列宁那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以为懂得了学习理论的重要。但是，读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尤其读了那篇结束语以后，实在使人感觉到列宁那句话又有新的意义，认识比过去切实得多了。

在实际上，我们过去还不曾把学习理论作为党员对党应尽的责任。即使在六中全会以后，虽然大家知道了学习是党员的一种任务，可是许多同志了解得还不深刻。我们好多同志总以为只要一天到晚不停地工作，就算尽了我们党的全部责任，这种想法是很不全面的。一天到晚工作而不读书，不把工作和学习联系起来，工作的意义就不完整，工作也不能得到不断改进。因为学习是做好工作的一个条件，而且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学习理论既然是每个党员的责任，那末，党内的老干部、高级干部首先要努力学习，成为学习的模范。因为你是老干部，因为你常常担负独当一面的领导工作，你就更有责任而且更有必要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高级干部要思索一下，看看下列两种情形，哪一种对党更有利？一种是，一天到晚地埋头工作，不去找时间读书；另外一种，就是一天抽两小时来读书。我认为，后一种无疑对党更有利。因为你是老干部，有斗争经验，学习理论更容易把书本上的东西消化成为自己的，这样，领导工作的水平就可以大大提高。同时，党要培养大批理论联系实际的干部，也首先寄托在老干部和高级干部的身上，老干部要担负起这个责任。只要大家认识清楚学习的重要性，就应该想法挤时间来读书。

我们这些老干部如果要学习，现在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十年内战时代，在白区[2]，虽有教材教员，但因为白色恐怖，没有读书的环境。在苏维埃区域[3]，虽然没有白色恐怖的不安，教员也有，教材也可设法找到，但由于战争频繁，读书的机会也不多。在今天，延安和某些根据地的读书条件比过去好得多了。我们这些老干部应该趁此机会读些书，增加一点知识，不要再把这个机会错过，否则将来就悔之晚矣。现在无论怎样忙，为了把握伟大而又变化多端的中国革命运动，必须增加一点革命的理论，增加一点历史的知识。

各人的程度不同，环境不同，读书应该采取不同的办法。像我们这样没有什么底子，各种知识都很缺乏的人，要老老实实做小学生。要将现有的主要教科书一本一本地读，既不是弛怠，也不用着急，一步一步来。可以每个星期读三四十页，每字每句都要读懂，不懂的就要认真请教。

一本一本书读懂的办法很重要。过去我们许多干部，书拿到手上，这句不懂那节不晓，而又不曾想法一句一句地弄通。这样，没有益处，而且不能坚持，必然半途而废。现在要改变这种状况，要读就读懂，不要一知半解。这种力求把书上的意思都读懂的办法，是达到融会贯通的必经步骤。对于初

学的人，不要企图每门功课读很多参考书，那样读完一本书要延长几倍的时间，倒不如一本书多读几次，逐渐增加参考书，逐渐加深理解，得益更多些。

学习理论一定要联系实际。老干部要认真总结自己的经验，把它提到理论的高度，来指导以后的工作，但是，如果书还没有读懂，就不要急于去“联系实际”，弄得牛头不对马嘴，还不如先把书上的东西读懂。读懂就是消化。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原理和思想方法，就会自然地同自己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把具体经验提高到一般理论，再拿这种一般理论去指导实际工作。

读书要做笔记。这有两个好处，一是让你多读几次，一是逼着你聚精会神，认真思索，使你了解深刻些，而不像随便看过去那样模模糊糊。

读书最好有个小组，几个人在一起讨论一下，可以互相启发，程度低的还可以得到程度高的同志的帮助。

读书要与懒惰作斗争。要订出一个切实的读书计划，照着去办，坚持不懈。

共产党员特别是高级干部对革命所负的责任这样重大，自己的知识又这样少，应该是“加油”的时候了！

注 释

[1] 见 52 页注[10]。

[2] 白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国民党统治区域的称呼。

[3] 见第 7 页注[7]。

严格遵守党的纪律

(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九日)

一、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纪律？

甲、中国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联合起来进攻革命，力量异常强大。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是长期的斗争，而且十分复杂，非常残酷。无产阶级政党如果没有铁的纪律，就不能巩固自己，团结群众，坚持斗争，战胜强敌。

乙、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占极大优势的国家。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还有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中国无产阶级富有组织性和纪律性，但人数较少，历史较短，他们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有自然的联系，优点在于可以与之结成亲密的革命联盟，缺点在于容易保留和滋长自由散漫的习气，或受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没有一个具有铁的纪律的党，无产阶级就不能团结和领导小资产阶级。

丙、中国革命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1]。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有了铁的纪律的党，才能建立有铁的纪律的军队，以此战胜强敌，创建受到广大民众拥护的政权。

丁、中国革命必须正确处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问题，即统一战线问题。特别在同资产阶级实行联合的时期，资产阶级会从思想上政治上文化上向无产阶级进攻，这就要求每个党组织和每一党员严守党纪，防止被资产阶级所腐化。

戊、在抗日战争时期，大量新党员涌进党内，新党员中的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成分，他们缺乏严格遵守纪律的习惯。

全党严守党纪是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

二、用纪律保障党的意志和行动的统—。

党的纪律规定：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为了保障党的意志和行动的统—，也是为了保障党的组织的统—。

纪律是我们的重要武器。维护党的统—，不靠刀枪，要靠纪律；同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端正路线和方针政策。

社会情况复杂，各人看法不同，党内有争论是正常状态。必须用纪律来约束党组织和党员的行动。

三、党的纪律是统—的，必须无条件遵守。

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无特殊人物，无特殊组织。

领导干部、领导机关必须成为严守党纪的模范。要特别防范高级领导人破坏纪律的行为，如张国焘。

不愿意遵守纪律的党员，害怕铁的纪律的新党员，尽可出党。

个人对组织，少数对多数，下级对上级，全党对中央，服从是无条件的。组织、多数、上级、中央的决策正确时，自然要服从；如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怎么办？在行动上必须服从，同时应该按党章规定的权利，提出建议，或保留自己的意见。

在革命成败的紧急关头，对错误领导者进行斗争是必要的，但仍须遵循

党章的规定，采取合法的手续（如遵义会议）。对危害党的阴谋分子的斗争，在紧急情况下可采取特殊的措施，但仍应遵守党内斗争的原则（如长征中对付张国焘）。当然，叛党投敌者不在此限。即使党员个人（或下级组织）意见正确，工作能力强，地位比较高，资格比较老，都不能作为不服从纪律的借口。

四、纪律是自觉的，又是强制的。

既知重要，就必须遵守，凡入党者都应有此自觉性。坚定的革命者视纪律为自由。

纪律有强制性。不自觉遵守，必须强制执行。明知故犯者，要给以处分；情节严重而不愿改正者，应开除出党。

为维护党的铁的纪律，每个党员、每个组织，都应该自觉自愿地接受其他党员和上下周围组织的监督，同时诚恳虚心地接受群众的监督。

五、强调纪律并不妨碍党员、党组织应有的权利。

党内有发表意见的自由。

在决议作出以前，有争论的自由；在决议作出以后，有保留不同意见的自由（但行动上必须服从）。

每个党员、党组织都有权上诉，直至中央。

纪律与自由，是矛盾的统一。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是一个最有纪律的党，也是一个最讲民主、最讲自由的党。

中国共产党经过将近二十年的斗争，已经是一个成熟了的党，广大党员对党忠诚，有高度的觉悟，因此，铁的纪律能被有效地执行。

注 释

[1]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7页）。

党员对党要忠实

(一九四〇年)

前几天，有两个知识分子新党员分别来找我谈话。他们已经在—个学校毕业，不久将出外工作。第一个同志说：“有三件事过去没有向党报告过，今天临走时必须向你说—下。”接着他说了三件事，都不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但过去都未填在入党志愿书上。第二个同志也报告了—件他在党内从来没有说过的事情：某年在某地方为了“饭碗”问题加入过国民党，但是既未开过会，亦未领过党证。我问他为什么入党时和入党后不说呢？答复是，说了怕党不接收为党员，怕不准在党的学校读书。他们在讲完了过去的隐瞒之后，都表示：现在—切话都对党讲了，对党没有—点亏心的事了，痛快了。

我听了之后，认为他们临走时能把隐瞒的事讲了出来，总算向党讲了老实话，这是—个很大的进步。我原谅这些党员的幼稚，但同时不能不指出；党员对党隐瞒应该向党报告的事情是极端错误的。我们共产党不允许党员有这样的行为。为了使他们自己认识这个错误，我要他们个人写—个对党的声明。

这一类的隐瞒，在党员中特别是新党员中还有没有呢？过去有，现在也有，而且还不少。

最普遍的情形是：家庭社会地位确实是大地主、资本家或者父兄在旧军政界服务，但是在党表上—概不填，只写家庭社会地位是小资产阶级。有些人在社会上有过各种职业，但党表上填得非常简单，甚至有的不是工人却在党表上填着“无产阶级”。为什么隐瞒呢？就是因为说了这些怕入不了党，怕在党内受歧视。有人填“无产阶级”是想在党内吃得开。

所有这些隐瞒都是错误的。从根本上说，这种行为都是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严格他说，这种人，做—个光明磊落的共产党员，还是不够格的。他们设想隐瞒之后就可不经详细考察而入党，但没有想到，详细考察每个党员的社会出身和家庭背景，这是党所必需做的，即使你入党时瞒过了，如果后来被发现，就要经过更详细更严格的考察。发生这样的问题，主要应由对党隐瞒的人自己负责。每个党员应该相信，党在考察党员时主要是观察党员的政治立场和对党的事业的实际表现。党也懂得，在反动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中未尝没有革命的子女。因此，应该信任党，对党毫无隐瞒，乐于接受党的任何考察。

另—方面，应该承认部分党的工作人员中也存在着缺点。他们选择新党员对象时，只要“纯洁”分子。他们所说的这种“纯洁”，仅仅是年龄轻，毫无社会经验。他们对于家庭社会关系或本人社会经历较为复杂的分子，就不敢介绍入党。结果是，学校和单位内年幼的纯洁的人—批—批入了党，长胡子的就吃不开。甚至有这样的怪现象：儿子入了党，父亲还是非党员，而儿子的思想又是在父亲的影响下进步的。这些做党的工作的同志不了解，我们所说的纯洁，主要的不是年幼龄轻、没有社会关系、单纯的纯洁，而是指在复杂动荡的环境中忠心为共产主义坚持奋斗的纯洁。

我们共产党是言行—致的政党，而且只有共产党才能言行—致。我们共产党内也不允许有对党言行—致的党员，不允许任何党员对党讲—句假话。我们绝不能像剥削阶级政党那样，党员可以说假话，鬼话连篇，欺骗人

民。如果我们的党员也染上了这种恶习，那末，我们党内的互相信任就不可能建立，党的意志的统一和铁的纪律也就不能建立，共产党将不成其为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队伍，也决不能被人民信任而成为人民的领袖。

因此，在党员面前放着这样一个问题：你要做一个好党员，就要与自己作斗争，经常以正确的意识去克服自己的不正确的意识。这个思想上的斗争和斗争中的胜利，就是自己思想意识上的进步。自己不跟自己的错误意识作斗争，偷偷地容忍自己错误意识存在着，则错误意识就会发展，结果越错越远，终究会离开革命的队伍。共产党员必须言行一致，这是党规定的。违反了这一条，就是违犯党的纪律。有些人对党说一次两次假话，经过教育不加以改正，反而假话越说越多，越说越大。这样的人，不管你口里讲得如何革命，不管你过去有多大的功劳，应该立即开除出党，没有价钱可还。

向党隐瞒的人，说假话的人，固然有许多人是政治上很幼稚的党员或新党员，但是，确有一些政治上别有企图的分子，过去做了许多坏事的分子，自首变节的分子，或者是叛了党的内奸和混进党内的敌对分子。所有这些人，他们隐瞒历史，假话连篇，目的是为了破坏我们的党。这同上面所说的幼稚的共产党员，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此外，还有一些投机分子，他们为了取得党的信任，爬上领导岗位，也常常会采取隐瞒欺骗的态度。对于这几种人，必须提高警惕，防止他们利用任何机会破坏党的事业。

党员的质量重于数量

(一九四〇年十月一日)

为什么要郑重地提出党员的质量重于数量这个问题？

第一，因为在敌占区、大后方的党组织是秘密的。一方面，党处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直接统治之下，随时随地都可能遭受到武力的压迫、政治的诱惑、奸细的破坏，经常处于严重的被突然袭击的状态。另一方面，党在与敌对势力的斗争中，不像八路军、新四军所在地的党，有武装力量可以自卫，仅仅是依靠党员革命意志的坚定，党的组织的严密，党与群众的联系。在这种状况下，如果党员的政治质量不高，如果党内混入了奸细，那就不能与敌对势力作残酷的斗争。我们在全党范围内提出党员的质量应重于数量，那末，在敌占区及大后方，这个方针就更为重要，更应严肃对待。

第二，现在大后方的党员已经有了相当的数量，我们的方针，不再是以发展为主，而是以巩固为主。

第三，今天大后方的党组织一般说来还是极不巩固的，许多地方的党员的质量还不高。在敌占区虽然有无数党员具备着反抗日寇的英勇气概和共产主义的坚定性，但是也有很大一部分党员质量不高。大后方的党员大多数是在抗战初期入党的，遇到政治局势逆转，或者受到某些诱惑，有些人就容易动摇。虽然这种情况在革命运动中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其原因在于抗战初期吸收党员时有些地方的同志缺乏政治经验，但是，应该说，我们领导机关缺乏应有的注意，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们强调提高党员的质量，并不是说大后方的党不要发展了，现在大后方的党组织，有的地方党员太多，有的地方党员还太少。党员多的地方，一个“保”^[1]或一个村庄有几十甚至上百名党员，内中不少人并不工作，也不开会。这样的组织，实在既不精干隐蔽，又不起大的作用，宁可缩小些。那些不愿开会不愿工作的人，不必强迫他们退党，也不要开除他们的党籍，实际上可以把他们当作党的同情者。这样整理的结果，虽然党员数量减少，但是质量提高了，秘密工作会做得更好些，领导干部的精力会更集中些。这是合乎精干隐蔽的政策。许多地方现在还没有党员或党员很少，那就应该发展党员。但是发展党员时，要避免过去的缺点，而着重注意质量。不必要求大后方农村内每个“保”都有支部，但是每个“联保”要有一两个支部。支部人数不求多：五人左右至多十人。现在大后方发展党员，主要看当地组织开展工作是否需要。如果当地组织已经太大了，那末，即使有条件入党的农民，也不必急于吸收入党，尽可使他们做党外同情者。只要客观环境一变，党需要发展党员时，这些同情者随时可以吸收为党员的。

提高质量不仅仅是洗刷落后分子，还必须加强党内的教育。每个干部，每个党员，都要经常阅读党出版的书籍或其他进步的书籍，增加知识，自修深造，在政治上不断提高自己。不识字的党员，要把识字读书提高文化作为对革命的责任。如果大后方、敌占区的党员人人都照这样做，定下一个长期学习的计划，则几年之后会造就成千成万政治上相当高明的干部。这虽然不是党员数量上的发展，但这种质量上的提高，远胜于数量上的发展。培养这样成千成万的干部，并且能够保存下来，使用到革命决战关头，实在是无敌的力量。

注 释

[1]见第 65 页注[5]。

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干部的重要性

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三五年曾经指出：“人才、干部是世界上所有宝贵的资本中最宝贵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应该了解：在我们目前的条件下，‘干部决定一切’。”[1]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八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中也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2]这些话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因为党的一切决议和政策，都要通过干部去实现。党的干部不同于一般党员，是党的骨干。干部在党的组织中占重要地位。党看重干部的作用，认为没有坚强的干部队伍，我们党的事业就不能发展，就不能取得革命胜利。因此，干部对于党的事业负有重大的责任，应该成为一般党员和群众的模范。

干部的现状

目前干部已有很大的数量，并且有各种干部，包括党、军、政、民、文、技等。这是很大的成绩。但干部依然不够，特别是新开辟的根据地。这是因为：革命事业发展很快，工作范围扩大了，工作性质又是空前的复杂。党员增加了很多，但干部不能与党员按同比例增加。

我们党政军各部门，基本是以老干部为骨干。党政方面，地委书记、专员以上，都是老干部；中下级干部，百分之八十五是新干部。在中级干部中，有百分之八十五是知识分子。军队因有老的基础，中级干部主要还是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干部，山东及华中、冀中新建立的部队除外。这是目前党的干部的大体状况。

在各个根据地中，还有广大数量的非党干部。

挑选干部的标准

(一) 忠实于无产阶级事业，忠实于党。

忠实，讲得具体一点，就是革命利益高于一切，有为党慷慨牺牲个人一切的决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爱出风头，闹名誉地位，吹牛拍马，耍两面派，是同党的干部的称号不相容的。要做到革命利益高于一切，是一个教育和锻炼的过程。

(二) 与群众有密切联系。

共产党要处处依靠群众。先了解群众，帮助群众，群众才能帮助我们。不要看不起土生土长的地方干部。他们与群众有密切联系，要尊重他们。

(三) 能独立决定工作方向并负起责任。

必须能独立工作（因为是战争环境，中国又大）；在失去联系时能独立

负责，但又不是拒绝上级领导。

能独立工作的条件是学习，理论联系实际。一个干部没有理论不行，只凭经验不够。要有进取心。态度不高慢。

忠于职守。拿得起，放得下。

(四) 守纪律。

纪律是保证政治上组织上统一的武器。

责人易，责己难。向好的看齐、不是向坏的看齐。

总之，用干部的标准，概括起来有二：政治，能力。两者不能缺一，以政治为主。

挑选干部的标准，同时是干部检查自己的标准。每个干部都应该经常进行自我检查，有错误就改，不足的就补。

了解干部和审查干部

了解干部是制定干部政策的基点。

审查干部，必须区别好坏，了解优点和缺点，但在现状下（延安招生，全国一时有很多人涌进来），首先要区别好坏，这种审查是不可免的。

审查干部必须实事求是，客观，严格。结论应该是不可反驳的。切忌以主观的推测为根据。不单看言论和态度，主要看本质和实际。不仅看一时一事，主要看整个工作历史。不决定于家庭，决定于个人。不怕复杂的社会关系，也不允许被审查者隐瞒社会关系。

审查干部必须对党对干部有高度的责任心。不能疏忽大意，不能冤屈好人。疏忽和冤屈都要承担责任。冤屈好人的责任并不小些。

审查干部必须采取正当的方法，切忌耍手腕。绝对不准以特务手段对付党的干部。

审查干部必须做出符合实际的书面结论。切忌含含糊糊和悬而不决。切忌空口无凭。

提拔干部

(一) 原则：

德才并重，以德为主。反对只顾才不顾德，也反对只顾德不顾才。才和德应该是统一的。才，不是空才；德，也不是空德。考察一个干部的才和德，主要应看其在完成任务中的表现。

坚持人、事两宜的原则，用人得当，适得其所。

要求干部能上能下。只能上、不能下，只能升级、不能降级，是个人第一、党性不纯的表现。

(二) 提拔干部中的缺点：

不敢或不让新的知识分子干部做更负责的工作；反对知识分子，不放心知识分子。

主观上还未注意到本地群众领袖的培养。

只提拔，不教育。

以上缺点，必须纠正。

（三）提拔干部的方法：

提拔干部是经常的有步骤的工作。要有准备，预先审慎考虑过的才提拔。切忌提而不当又放下去。能力大小和工作历史必须符合于位置，即工作称职。超过则跌，过降则升。不越级提拔，越级提拔一般证明有害无利。

先从日常工作中认识之，证明能胜任较繁重的工作；

尤须于斗争中考验之，证明政治坚定，主动得力，作风端正，从群众运动中发现和提拔。不怕没有人才。

吸收一批优秀分子到领导机关来工作。

使用干部

（一）原则：

按照才干，按照需要，同时兼顾，量才为主，应急也不可免。量才的原则是用其长，不是用其短。发挥长处是克服短处的最好办法。

使用干部到当时当地最需要的环节上，而不是平铺分配。

（二）目前使用干部工作的缺点有二：

一是远未量才使用。原因：有客观困难，对干部不了解；仅顾自己、轻视全局的本位主义。如何克服？先了解干部，量才使用是一个过程；建立相当统一的各系统干部的管理机关，以大局克服本位。

二是轻视行政工作。不把好干部分配到政权机关；干部不愿到政权机关。原因：对政权机关工作的作用认识不足，有些人没有勇气。

（三）使用的方法：

放手使用，同时要经常地适时地检查和帮助。

适当分配，并保持相对稳走，不轻易调换，以造就人才，积累经验。

领导机关要有本地干部。

对于模范干部，要有计划地逐渐分到各区去，特别是落后区。

合理地经济地使用干部，由工作来决定组织形式，而不是相反。

教育和培养干部

老干部需要教育，新干部更需要教育。

革命基本理论和实际工作教育要一致起来。只停于实际，就不会有远大目光；只停于高远理论，就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理论和实际两者不能或缺。看不见理论和实际统一，或者看不见理论和实际有别，都不对。

理论教育的对象，一种是有较长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一种是有较高文化水平和政治认识的知识分子。有经验者，从理论上去反省经验；无经验者，理论与实践相配合。教员的教育方法，是从实际经验归结到基本理论上。要打破轻视实际的观点，同时，也要反对不安心学习理论，急着要去工作的思想。

实际工作是重要的教育武器，实际工作的过程，就是教育干部的过程。分配干部适当的工作，使其负责，在工作中受到教育。在工作中发现干部有

错误时，要及时教育之，纠正之，说服之，使之从错误中求得教训，并且提高到原则上来认识。同时，要鼓励他们吸取和正确地运用别人的经验。发展其长，克服其短。适当表扬优点，适当批评弱点。

纠正干部问题上的错误倾向

反对家长式的对待干部，同时反对放任干部的错误。赏罚要分明，批评和奖励要适当（包括时间、程度）。以党的原则立场来团结干部。

反对私人拉拢，搞个人系统。互相捧场，拍马奉迎，是最可耻的，结果害党害己。

反对当面客气，背后指摘，甚至打击报复。要正面、坦白、诚恳地对待同志。

反对轻视干部政治生命、随便摆布干部的倾向。要真正爱护干部的政治生命，鼓励干部在政治上的进步，克服倚老卖老或自甘落后的现象。同时，经常关心和解决干部的生活困难。

反对滥用纪律惩办干部。对待干部的错误，基本办法是教育。纪律是不得已的教育，当然又是必要的。处罚干部必须适当。

加强党内干部的团结

目前总的情况：基本路线一致，部分的不协调。党内干部不团结有四种：新干部与老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以及同类干部（军队与军队、地方与地方、部门与部门等）之间。其中，以新老干部的不团结为最多最久。新老干部不团结的实质，是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民干部与新参加革命队伍的知识分子干部之间的关系问题。

干部闹不团结的原因，从客观上说，是工作性质不同，要求不同，个人的经历不同，工作能力强弱不同，等等。从主观上说，是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宗派主义，互不佩服，有功必居，有过则推，不以党的利益为重。

新老干部不团结，主要责任在老干部。

鼓励干部互相了解、互相学习、互相尊重。两方闹不团结，领导人各自作自我批评，这有决定意义。党组织要主持公道，任何偏袒都是错误的。该批评的必须批评，该支持的必须支持。这是加强干部团结的正确办法。

必须使所有干部认识一个基本问题，领导革命的基本力量是党，不论新干部和老干部，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都必须在维护党的利益的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

加强同非党干部的团结

不团结非党干部，就不能团结全国人民，革命就不能胜利。这个问题，目前和将来都是对我们党的一大考验。人心归共，看你的气量如何。我们的缺点是宗派主义。不确认非党干部的地位，不接近他们，看不起他们。以成

见看待非党干部，对他们要求过高。以他适我，不是我先适他。党员干部缺乏自我批评，缺乏大众的民主的作风。

党与非党干部闹不团结，应由党员干部负主要责任。

用各种方法团结非党干部，应取的基本态度是坦白、诚恳、爽直。一切原则都必须讲究适当态度以达到之。

建立和健全管理干部的组织

干部工作是组织部门中最主要的工作。干部部门要有相当数量和质量
的干部，人选力求忠实，公正，有能力（包括有一定的革命经验和社会经验，以及细心、耐烦等）上下信任，使之符合于党的发展的需要。

干部部门应经常了解、考核、选拔干部，向党委提供意见。干部的任免、奖惩等重大事项，应按组织原则，根据考察材料，并考虑干部部门的意见，经党委会讨论通过，不是一两个人说了算。

注 释

[1]见第 24 页注[1]。

[2]见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26 页）。

学会领导方法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一、组织工作要适合于政治路线的要求，保证政治路线的实行。因此，有两个要求：对政治路线的正确了解；对具体情况的切实了解。只谈路线，不了解具体情况，是空谈。只知道具体情况，不了解路线，是盲目。要克服“上级只谈政治路线，下级只谈具体工作”的缺点。

二、要做到主观与客观一致。领导机关决定计划，执行计划，检查工作，都必须主客观相一致。要重视我们现在的特点：在根据地当权；主要在农村；斗争形式以战争为主；工作有很大发展：各地都有大批新党员。

三、计划是主观的，但必须建立在客观可能的基础上。计划要适合于路线，又要适合于客观实际情况。客观情况是基本的。

四、新发展要从旧阵地出发。

五、工作要抓住中心，照顾其他。中心为主，做到全局与局部的一致。

六、大刀阔斧与精雕细刻相结合。先抓住，后消化。工作要从一点一滴做起，踏踏实实，不能存侥幸心理，不能希望一蹴而就。

七、检查工作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考察、补充和修正决议，使主观逐步达到与客观相一致。

八、兜底查。检查支部和乡的工作，要抓住一两个典型，总结出经验，教育其他。

九、领导方式的中心问题，是正确处理上下级关系。上级的基本态度是帮助下级，吸收下级的经验来改善领导。上级决定本身有缺点，完全由领导负责；下级执行中有缺点，领导也要负教育不够的责任。不能只批评下级，上级不作自我批评。学专制的办法是完全错误的。上下级关系不协调，一般情况下，主要是上级负责。下级要尊重上级，对上级要善意地提出批评和建议。

十、领导机关要区分命令和建议。必须有命令，但在某些问题上要有弹性，允许下级根据实际情况处置。

十一、当权的大党，领导干部很可能成为官僚。要坚决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

领导要具体区别不同地方，分配以不同的任务；区别任务的缓急；区别主要工作和次要工作。掌好舵，指出主要的努力方向，预防某种偏向。

十二、领导干部的工作方法：中心工作与经常工作要分清。不忘记经常工作，但必须抓住中心，防止事务主义，乱无头绪：工作一件一件来，每件工作做到底，就是最有成效，最快速度。平均使用力量，瞎抓一气，必无成效。遇事不要慌张，也不要松弛。不仅自己会干，而且会推动别人干，要改变那种一人忙众人闲、上忙下闲的状况。不仅要有听的时间，而且还要有想的时间。从感性到理性，这是思维的过程。会要少开，开会要有准备，出文件要解决问题，否则无结果。

党员要积极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

（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

（一）向全党解释，各种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是革命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是具体的革命工作。应纠正某些党的组织和党员对革命工作抽象的狭隘的了解，以至轻视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认为这些工作没有严重政治意义的错误观点。

（二）解释学习理论和参加实际工作都是每个共产党员不可或缺的责任。但在革命运动中，尤其领导着军队和政权的党，党员决不能离开各项实际工作去“专做”理论工作（虽然可以和应该有一小部人专门从事理论的研究），同时也决不能单单埋头实际工作而完全不学习理论。因此，借口学习理论而不愿参加实际工作，或仅仅埋头实际工作而不在工作中抽暇学习理论的倾向，都必须纠正。

（三）每个党员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对于他的工作的分配。纠正某些党员不愿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及分配工作时讨价还价的现象。

（四）一切在经济和技术部门中服务的党员，必须向非党的和党内的专门家学习。他们的责任是诚心诚意地学习，并熟练自己的业务和技术，使各部门建设工作获得发展，并使自己获得在社会上独立生活所必需的技能。

（五）党必须加强对经济和技术部门工作中党员和非党员的领导，照顾他们的政治进步，并在各方面帮助他们。

尊重和团结非党干部是党的重要政策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

一、团结于党周围的非党干部是社会各阶层的进步分子，是党广泛联系群众的桥梁，不反映党外人士的意见，党的政策就不会完全正确。不经过党外人士的传布，党的政策就不能深入群众。没有党外人士的同情和合作，革命胜利就不可能。因此，我们不仅须与已经共事的非党干部亲密团结，而且竭诚欢迎广大的党外人士与我们共事。

二、由于客观环境变迁，党的路线正确，几年来我们与非党干部有了更多的接触，我们学习着与非党干部共事，非党干部对党更加接近了。但是，团结在党周围的非党干部人数还不多，党与非党干部的关系，一般地还处在不正常状态。党内非但缺少礼贤下士的空气、反有浓厚的排外思想。不少党组织，还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不重视以致歧视非党干部。党内许多同志对非党干部或则深具戒心，有才不用，口讲接近，实际疏远，或则高傲自满，党气凌人，满口原则，不近人情。因此，使热心革命者受到冷淡和排斥，已经共事者感到苦闷不安。总之，我们虽有团结非党干部的方针，但还没有具体明确的非党干部政策。

三、有人以为党与非党干部之间的不正常关系，主要是由于非党干部不顾环境，强调一面、一意孤行，任意批评等等所造成。这种意见基本上是不正确的。个别非党干部对环境了解不够，或存在着某些缺点，这是事实，也是难免的。不正常关系的主要责任在于党，而且，非党干部的某些缺点，或是由于我们的工作缺点所引起，或则需要我们帮助才能纠正。

我们在这方面的缺点，主要在于：

(一) 不了解非党干部的重要。由于过去党处于秘密环境或被“围剿”环境，与社会接触的范围太狭小，得不到党外人士广泛的帮助，看不到和不了解非党干部的作用，形成了关门主义传统。

(二) 对非党干部政治上不信任，疑神疑鬼，任意“逻辑”。往往以为，不是党员即是可疑分子，要求入党者即是别有用意。认为只有自己的思想正确，而非党干部的意识、习惯都有问题。对非党干部不能量才使用，不依其经验、能力给以适当的位置。这样，就使非党干部政治上受着压抑不安，精神上受着冤屈痛苦，深感不能见容于共产党。

(三) 思想上组织上存在着宗派主义。表现在要求非党干部与我们集体共事，但不尊重其个人自由。非党干部在总的方向上与党共同努力于革命事业，但在生活习惯、思想意识上，应有其个人自由。多数党员不重视其与我们大同之点，完全否定其个人自由。因此，加以责备和非难，认为难于共事。于是，排挤非党干部是事所必至，理成当然。这种不看大同，专找小异的结果，使党与非党干部之间不能融洽。在非党干部担任行政领导的部门中，只要求非党干部政治上工作方针上服从党的领导，而这一部门中的党员却不服从非党干部行政上的领导，以致党的领导完全代替了行政领导，行政问题不经行政机关解决，致使非党干部感到棘手，工作无法做好。

(四) 曲解党性为脱离社会的“纯洁”。许多党员不愿结交党外朋友，不敢向党介绍党外人士，以为“洁身自好”即为最高之党性，战战兢兢，惟恐有失于党性之纯洁。因此，党不能经过党员团结成百成千的非党干部。非

党干部感到我们毫无友情，难于接近。党性的“纯洁”变成了排斥非党干部的护符，变成了个人主义的对党不负责任。结果在党与非党干部之间隔起了人造的墙壁。

（五）党与非党干部间缺乏适当的组织联系。党、政、军都没有适当的组织照顾非党干部，干部部门没有把非党干部作为干部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非党干部没有可以直接反映情况、提出建议和申诉冤屈的机关，许多问题不能解决。

四、改善党与非党干部之间的关系，必须确定以下办法：

（一）重视非党干部的作用，在政治上信任他们。事实证明，许多非党干部是破釜沉舟而来的革命分子。过去对非党干部的许多疑虑（例如社会关系复杂，意识不正确等）。常常是由于我们的社会经验不足，对他们了解不够。反之，非党干部的许多意见、批评、不满，常常是正确的，或反映了我们的某些缺点。因此，今后对非党干部不要疑神疑鬼，应该信任他们。人之可靠与否，不在其有无党票，而在其为人历史和现实的表现。

（二）打破宗派主义，即打破“你们”和“我们”之间的人造墙壁。在一条战线上奋斗的党员干部和非党干部，都是革命同志，人人都有革命、工作、说话之权，党员干部无权垄断革命。在革命工作中，与共产党员负同等责任的非党干部，他就有与共产党员同等的革命功绩。脱离党外人士的“洁身自好”是党性不纯的表现，礼贤下士、尊敬贤能是共产党员应有的风度。党员干部只有团结非党干部之责任，并无排挤非党干部之权力。一切歧视、排挤非党干部的倾向，都是党性不纯的表现。

（三）使用人才的原则，是用人唯贤。要注意用人之才，不能只考虑是否党员或党龄之长短。按才能排位置，不按党票排位置。共产党员应承认人之长，检查己之短。一切嫉妒，一切阿Q精神，都干事无补，既损人也不利于党。应满腔热忱地向非党干部学习，学习他们的一切长处。党的领导责任，在于发挥非党干部的才能，使之服务于革命需要。对于担任一定领导工作的非党干部，应同党员干部一样，给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必要的信任和必要的权力，使其有施展才能的机会。当然，不能因尊重非党干部而分配以不适当的过高的位置，或给以空的头衔。

（四）要尊重非党干部的思想自由和生活习惯，同时要求他们在工作上服从党的总的方针，这是彼此合作不可缺一的条件。非党干部忠实于革命利益的具体表现，就在于他忠实于本职工作，发挥自己的才能，成为工作的模范。除此而外，苛求其与党员一样服从一切组织纪律，是不适当的。

（五）非党干部负责某一行政部门之领导时，党必须要求他们在工作上符合于党的方针，但该行政部门之党的组织则应教育党员成为工作的模范，尊重和团结非党干部，保证行政任务完成。在担任领导工作的非党干部服从上级组织领导的前提之下，该部门之党员应在行政上服从他们的领导，违反者应受到批评或处分。

（六）在民主选举的政权机关和民众团体中，共产党员与非共产党员合作共事，应共同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少数服从多数。

（七）要相互开展善意的批评。非党干部有不满，发牢骚说怪话，并不等于思想上反对党。应把非党干部善意的批评视为鞭策、鼓励我们的有益武器。欢迎非党干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同时，要使非党干部了解我们的处境和工作缺点的来源，不要单看个别党员或个别方面的缺点，而主要看全党

和总的方面。非党干部如提出不正确的意见，或工作上发生不适合于党的方针和客观需要的问题时，党组织亦不应敷衍客气，必须对他们进行坦率的批评，请其改正。党与非党干部的相互批评，是两者之间的正常关系。只有彼此相见以诚，才能和衷共济。

（八）党对非党干部应在政治上、工作上、物质上给以帮助。政治上除党员在党内所有的义务和权利以外，非党干部与党内干部应同等看待。要求入党者应按党章规定给以答复。在目前物质困难的条件下，要给以可能的物质帮助，以爱护党内干部的态度去爱护非党干部。

（九）党与非党干部组织上的关系，应作如下规定。党的一般支部会议欢迎非党干部参加，只是无表决权，但有发言权。定期召开党员和非党员联合的各种干部会议。党的组织部门或干部部门，负有照顾非党干部之责任。各部门的负责人要经常听取非党干部的意见，非党干部有直接找该部门负责人或各级党的干部部门谈话之权。非党干部与党员一样，有向党组织控告之权，直到党中央。党继续赞助非党干部和党员干部共同组织专门性质的团体，例如自然科学研究会、法学研究会、同学会等等。

到什么地方学习

(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延安有一个时期的教育方法，在新干部中造成一种风气：不愿参加工作，要求“长期学习”。这种风气现在已有改变，但未完全扫除。近来又有一部分党龄较长（十年或十年以上）、工作经验很少的（在秘密党内与党的生活长期隔离的，或长期未做过党的工作的，或只做过一个时期很少一部分工作的）老干部，要求进中央党校学习，不愿意组织部分配他们到工作中去。虽然组织部一再表明，他们是党保存下来很宝贵的老干部，但缺少工作经验，党为了爱护和培养他们，要求他们到工作中去锻炼，充实自己，提高自己，可是这些解释并没有使他们满意。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以为应该说明下面几点。

不愿立即参加工作，要求进学校，或者要求长期学习的同志常常说：“让我进学校学习，我要在政治上开展一下。”党当然希望干部在政治上开展起来，但应该研究，干部在政治上如何才能开展？事实证明：真正政治上高明的革命家，只能在革命斗争中培养，不能专从学校里训练。共产党的真正领袖不论是苏联的或者是中国的，决不是毫无经验、夸夸其谈的人，而是既有丰富革命经验又有真正革命理论的人。干部也是一样，真正政治上开展的干部，决不是毫无革命斗争经验的，因此，没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人，如果不到工作中取得实际经验，单靠听讲看书，甚至饱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则，想在政治上真正开展是不可能的。因为使政治上开展的最基本的东西，是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没有实际经验，就没有政治上开展的基础。

当然，这不是说，每个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政治上都很开展了。我们党内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政治水平一般说来还很低，而且还有一些经验主义者，这是事实。但是，许多同志政治水平所以不高，有的同志有经验主义的毛病，决不是因为他们有了某些工作经验，而是因为他们用自己狭隘的经验去观察去解决一切问题。因此，要提高干部的政治水平，克服经验主义，既要在思想方法上，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在党的路线上和政策上加强教育，又要扩充他们各方面的革命斗争经验，并使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两者结合起来。如果两者不是相辅而行，则提高政治水平和克服经验主义是不可能的。本来这个道理很简单：政治高明不表现在人身的别的部分，表现在人的思想上。而思想上的高明和发展，只是因为这个人丰富地接触了并且理性地认识了革命运动中的许多客观事物。

如果上面的说法是合乎事实的，那末，缺少工作经验的干部，为了建立政治上开展的基础，为了自己在政治上进步，应该先到工作中去学习。

先进学校读书，还是先去参加工作？这是缺少工作经验的干部时常犹豫的问题。经验证明，除了学习专门的知识以外，一般没有或者缺少工作经验的干部，应该先到工作中去学习。延安训练新干部有过好坏不同的两种方法。一种是抗战初期的抗大[1]、陕公[2]的训练方法，学生在学校只学习几个月，之后就去参加工作。他们在学校中不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是培养生气勃勃的革命作风。现在许多抗大、陕公毕业之后参加了工作的学生，已经在经验、能力和政治上都有了进步，这是正确的训练方法所获得的结果。后来延安又有另外一种训练新干部的方法，就是把没有工作经验的新干部长

期放在学校里“学习理论”，教的是一大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抽象原则，学的是教条，许多学生既没有学到理论，而一接触到实际问题，就目瞪口呆、手足无措。这是不正确的方法，错误的方法。本来这两种学生的政治文化水平是一样的，但因为训练方法的不同，学习方法的不同（工作中学习和学校内学习），而得到了不同的结果。参加了工作的学生，在经验、能力和政治上，已经超过了没有参加工作的学生。这两种训练方法所得的经验是宝贵的，现在对于错误的方法不应该重复而应该纠正。今后应该确定一条章程，没有或很少工作经验的干部，不是光在学校里长期学习，应该先到工作中去学习。没有工作经验的新干部只在学校中学习，要掌握理论是不可能的。真正的理论，只有在实际工作中才能逐渐深刻地领会，因为理论是实际的反映，归根到底是来自实际，而不是来自书本。这正像我们读书一样，某一本书自己确实已经读过几遍，但是，隔了几年，因为工作需要，再去读它一次，就好像是没有读过的新书，就觉得过去实在没有读懂。这个道理不是别的，就是实践与认识之间的关系问题。认识必须由实践中得来，而且只有经过实践，认识才能发展。所以，要使没有工作经验的干部真正在思想上政治上进步，不是先进学校（抗大、陕公那种几个月训练的学校不在此例），应该先去工作。

我不是一般地反对干部进学校学习。对于那些必须进学校学习的干部，我赞成他们进学校。但是对于缺少工作经验的干部，我赞成他们到工作中去学习，根据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3]去学习。

有些同志也感觉到了自己工作经验很少，需要到工作中学习，但又以为这次中央党校彻底改组[4]，许多中央委员当教员，不进党校恐怕错过学习机会，因此，虽想参加工作，更想先进党校。我以为事实上中央委员会的许多同志不仅是党校的教员，而且是全体在职干部的教员。每一个中央的决议、指示，就是学习的最好的讲义。而且在职干部的教员，不止中央委员会的某几个人，是中央委员会的全体。党校规定学员最多只学三年（预料），而在工作中，则中央委员会是长期的教员。

缺少工作经验的老干部不应该满足于自己党龄长，应该看到自己工作经验的不足。革命队伍里不能卖老资格。革命工作能否做好，不决定于党龄长短，决定于是否有工作经验、组织能力、政治水平和高度的积极性。如果在“老资格”上心满意足，就会阻碍努力，阻碍进步。这非但对于革命没有丝毫益处，对于自己也是一种倒退。

“我是老干部，难道我的工作经验还不如新干部？”这种想法也是不对的。我们承认所有奋斗了多年的老干部，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工作经验，但是，必须懂得今天工作的复杂程度，如果只靠我们过去的工作经验去应付，也是应付不了的，例如，我们在秘密党内从未动员过老百姓驮盐，没有征收过救国公粮，没有搞过春耕运动，没有干过政权工作、军队工作，没有干过管理吃饭穿衣的经济工作，没有做过现在这样繁重复杂的技术工作，等等。这些工作在秘密党内一概没有做过，件件没有经验，难道我们不要学习学习吗？不要赶上去补课吗？新干部没有这些工作经验是自然的，我们既称老干部又没有这些工作经验，就必须补课。过去没有这些工作经验是由于工作关系或其他原因，但现在不能安于现状，或者责备过去，抱怨别人。而应该踏踏实实去补课。这是革命对我们的要求，也是我们对革命的责任。我对于缺乏工作经验的干部，丝毫没有轻视的意思，而且我自己也是缺少工作经验的一个。但是缺少工作经验的同志，需要经过哪条道路才能把自己充实起来的问题，

是需要弄清楚的。

注 释

[1]见第 25 页注[4]。

[2] 见第 25 页注[5]。

[3]这里所说的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指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决定指出,在职干部教育,应以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四种为范围。业务教育,实行”做什么、学什么”的口号。政治教育,包括时事教育和一般政策教育而项。对于一切文化程度大低或不高的干部,除业务教育和政治教育外,必须强调文化教育。高级和中级干部具有学习理论资格(文化程度、理解力和学习兴趣等)者,于业务学习和政治学习之外均须学习理论。决定还指出,在鉴定干部的时候,学习的情况如何应作为鉴定标准之一。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应以极大的注意力放在干部教育(在职干部教育和干部学校教育)上面。

[4]这里所说的中央党校彻底改组,指一九四二年二月的改组。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根据这个决定,中央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政治指导由毛泽东负责,组织指导由任弼时负责。

关于延安几种干部培养与使用的决定

(一九四二年四月四日)

(一) 有工作经验但文化水平很低的在职的老干部，尤其是属于这类的中级和高级干部，必须根据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1]进行学习。对于文化学习决不能轻视，必须认真学习以提高文化水平。

(二) 文化水平虽高，但没有或很少工作经验的新干部，除一部分学习专门知识者外，必须首先参加工作或学习一个很短时间后即去工作，以便获得工作经验，不应该长期在学校中学习。

(三) 党龄虽长，但很少或没有工作经验的干部（例如与党失去联系很久的干部），必须参加工作，尤其下层工作，以增补其工作经验之不足。

(四) 长期在高级领导机关工作，但没有或很少下层工作经验的干部，在不妨碍该机关工作的条件下，应将一部分调去参加下层工作，同时吸收有下层工作经验的适当干部去代替之。

(五) 机要部门及有专门技能或正在学习专门技能的干部，不应调动，并应使他们长期安心工作。

(六) 必须纠正以为党务工作才是党的工作，其他工作不是党的工作，或轻视党务以外其他工作的错误观点。一切党务、行政、军事、机要、经济、民运、文化及其他工作，都是不可缺少的革命工作：必须克服只愿做党务工作，不愿做经济技术或其他工作的倾向。

注 释

[1]见第 146 页注[3]。

增强新党员新干部的党性

(一九四二年九月)

最近，中组部需调一批人去敌占区[1]工作，其先决条件是，他们要在敌后有可利用的社会关系，或能找到立足过渡的关系。通过在各机关、学校寻找和与有关同志谈话，在条件比较合适的一百七十七人中，除少数人表示服从党的分配，接受工作外，其余大部分人均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或掩饰推倭，或当面拒绝。这些人都是抗战时期入党的知识青年。在国内外斗争日益艰难的时期，尤其在整风[2]时期，竟有这样多的新党员新干部的党性观念如此薄弱，实在是相当严重的现象。

不服从党的工作分配的是些什么人呢？

第一，自称文化人的人。这些人表面上以无秘密工作经验或社会关系与身体不好等为理由，实际上是自命不凡，以文学家、戏剧家、歌唱家自居，怕危险或离不开爱人。

第二，在社会上混过事，有些世故经验，抗战时走顺风入党的人。这些人在谈话时，尽量减少某社会关系的可利用程度，实际上是因家在延安，现在工作相当稳定，不愿做危险的事。

第三，年轻幼稚、苟安现状及对秘密工作恐惧，或在参加革命时即多少带有光耀门庭思想的人。这些人在延安机关、学校中是相当多的。他们除不开爱人、对秘密工作恐惧、怕危险外，还有不少是因为现在回去，没有一官半职，觉得对家庭乡里，面子上不好看。

第四，一帆风顺的大学生。他们原是少爷出身，参加革命时有赶热闹的成分。他们的社会关系并不坏，却要描写得无法利用，实际上也是离不开爱人，怕危险。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几种人不接受工作的一个共同的基本原因，就是没有为革命随时准备牺牲生命的明确观念。他们中也有人曾想到革命难免要牺牲，但最好不是他自己而是别人，万一临到自己头上，也应尽量躲避。所以，遇到党分配有生命危险的工作时，他们总要用尽一切办法来推倭，而且为了推倭得很漂亮，使党不宜察觉，他们总有一大堆理由为自己辩护，什么自己“特殊”呀，“不合个性”呀，党还“不够了解”他呀，他“还不到牺牲的时候”呀。在他们看来，不接受党要求的工作，是因为党分配给他的工作不合乎干部政策。甚至少数人竟含有这样极端荒谬的思想，以为拒绝党的工作，实际是为了爱护党；如果接受工作，反而是一时的感情用事，党性不强，不替党爱护干部。

另外，从各种表示愿意接受工作的人来看，也还没有那种在延安牵挂多、身体弱、敌后关系不好，而能经过考虑。决心为了党的利益去牺牲个人一切的人。这说明，即使接受工作的新党员新干部，也还没有达到一个党员应有的党性水平。然而，尽管如此，毕竟去敌后工作的人，生命危险性是很大的，他们表示愿意去，说明他们的个人利益多少被克服着。这不能不说同他们过去受过的下层的相当锻炼或延安某些学校较严的教育有很大关系。

新党员新干部中很少有能无条件接受工作的人，这是否意味着抗战后入党的知识青年和大革命或内战时入党的知识青年的质量有根本的不同呢？

从各时期参加革命的不同阶级出身上的人数比例上看，现在党员的质量

虽较过去有很多差别；但并无根本上的不同。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均系小资产阶级，普遍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思想。他们在每况愈下的生活中日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以至不断地加入到党内来。大革命和内战时如此，抗战后更如此。所不同的是，在三个时期中，随着环境的不同，斗争各有偏重，因而参加的人数比例不同，受革命的锻炼也不同。如果把大革命和内战时大批脱党的人算进来，那时的党员数目也是极大的。现在仍留在党内的大革命和内战时的党员，连牺牲的人算在内，同那时的党员数目相比，倒是少数。虽然在抗战后有不少人因抗日而加入党，但由于党的教育和战争环境的锻炼，照样能把他们中的很多人提高到真正党员的水平。所以说，抗战时入党的知识青年比大革命或内战时入党的知识青年，虽有区别，但在质量上还是一样的。如果单就政治常识的水平看，由于大革命和内战以来政治斗争的增长、进步书报的增多，抗战时入党的知识青年倒比过去两个时期还要高些。

那末，为什么延安的新党员新干部会有这样严重的党性薄弱的现象呢？这里有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延安的新党员新干部绝大多数是年轻的学生，他们生长在抗日的环境，又处在和平的边区，入党后就未得到适当的锻炼，有的还是“老延安”，几年来只在几个机关、学校转来转去，碰不到任何较大的困难。因此，他们的缺点很少有机会得到暴露和纠正，甚至还在无形中增长。如果看同样党龄的新党员新干部，经过几年前方的或下层工作的锻炼，则显然与长期在延安的新党员新干部有所不同，这更说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青年，只有在长期的艰苦环境中锻炼。才能逐步消除其小资产阶级意识，增强无产阶级意识。

第二，我们在教育上的一些缺点或多或少助长了他们的不良思想。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学校教育中的教条主义，使他们对书本上的条文津津乐道，无形中助长了其自高自大的态度和不务实际的作风。（二）组织教育中的某些不适当的做法，助长了他们投机虚伪的心理、自由散漫的习气和看重个人利益的偏向，比如，组织生活多流于形式主义，忽视真正的纪律教育；又如，分配工作或学习时，迁就得多；再如，党的建设教育未能着重强调个人服从党的问题，模糊了干部与普通党员的界限，等等。（三）本位主义的影响）比如，一些机关对于经过学习后仍旧要调回本单位工作的干部，往往直接将其送入某校或要求中组部送入某校，实际某校对其并不合适；又如，某些机关、学校暗地拉人，甚至当中组部调动某系统的干部时，某干部本可接受调动，而原机关、学校却有意无意地示意其不接受调动；另外，还有一些机关采取不负责任的办法，当发现某党员干部思想意识不太好时，不去耐心教育，而用调工作、送学校的办法推出门了事。凡此种种，都直接或间接地助长了某些新党员新干部的个人主义思想及不良倾向。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现在延安新党员新干部党性薄弱的原因，既有内在的，也有外在的。因其有内在原因，所以，党性薄弱现象难免，因其有外在原因，所以，党性薄弱的现象完全可以防止或在短时间内得到克服。办法就是改变外在不好的因素，使它成为好的因素。要使一个党性观念不强的人较快地达到坚强的境界，可以用加强对其教育和锻炼的方法。这在过去老党员老干部身上得到过证明，现在前方的新党员新干部身上也得到了证明，在这次接受去敌后工作的人身上又得到了证明。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新党员新干部如何教育、如何锻炼。

根据目前新党员新干部党性薄的情况，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增强其党性的工作：

第一，加强新党员新干部的党性教育。利用这次整风的机会，以这些不接受工作的人为例，在各机关、学校展开讨论，以转移风气。要使人们了解，没有党就没有个人，只有在党性建立之后，个性才有可能建立与发展。每个党员必须具有随时准备为党牺牲的决心，这是党员是否合格的标准。必须明确自己是革命的牺牲者，而不是革命胜利的享受者。要知道，牺牲的场合，不仅在残酷的刑场上和战场上，而且还在极平凡的技术工作和事务工作上。在这些岗位上任劳任怨、千辛万苦、积劳成疾也是牺牲。牺牲的价值不取决于表面上代价的大小，而取决于党对它的需要。

第二，大批地分派新党员新干部到下层锻炼。在整风后将大批的延安新党员新干部派到地方上去，派到技术部门去，派到事务工作中去，对新党员新干部使用的基本原则是，要使其多走逆风，少走顺风。必要时，对某些新党员新干部要分配其不愿干的工作，以磨练其意志。但组织部门在分派工作时，必须审慎行事，不得草率，防止出现更坏的结果。

第三，加强纪律教育。组织部门在分派工作时，事先必须多加考虑，一经决定，绝不准讲价钱，严格纠正过去的迁就作风。在安排新党员新干部工作与学习时，必须拒绝任何人的任何非组织路线的建议，严格纠正本位主义的一切直接或间接的不合组织纪律的作风。在各学校中及党的建设上，必须加强纪律教育，强调无条件地服从党，强调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对违犯纪律的人，要及时地给予适当的纪律教育与纪律制裁。各级行政与党的负责人，应对过去纪律教育情况详加检讨和总结，并把纪律教育作为日常考察的一个内容。

注 释

[1]敌占区指抗日战争时期我国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的地区。

[2]这里所说的整风指中国共产党自一九四二年起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通常称延安整风。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经过这个运动，全党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

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

(一九四二年十月七日)

许多干部现在只强调党要正确执行干部政策，而不注意用干部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干部本人理应多讲标准，多要求自己，但现在延安的一部分干部，一谈到干部政策，就意识到党应如何照顾他，了解他，爱护他。相反，作为一个干部应该特别注意的四条干部标准（忠诚于党，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服从纪律）则漠然视之，把它放在次要地位，甚至根本忘掉了。很明显，这是不对的。一九三八年我在抗大[1]及其他学校学生中讲干部问题时，只讲党对干部的政策，未讲或未强调干部本身品德的修养，这是有片面性的。

一、关于新知识分子干部。

新知识分子干部的好处，是对事物敏感，工作热情。也有缺点，就是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他们是愿意克服自己的缺点的，党组织也是可以把他教育好的。

不少新知识分子干部现在感到工作“不合手”，在技术、经济和其他部门中工作的同志不安心。是组织上分配错了，还是自己想错了？我看，主要是自己想错了。

(一) 自己理想中的革命家与现实需要的革命家不相符。

理想中的革命家：根据过去青年学生运动的经验，往往是高谈阔论的“政治家”，开会演说，游行示威，文艺活动，鼓吹革命。

现实需要的革命家：要会解决军事、政治、吃饭穿衣的问题。开会、游行、文艺、鼓吹革命虽然也要，但已经很不够。换句话说，这些不是基本的，因为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现实需要的工作，是党、政、军、民。这里又有许多部门，而且不可缺一。吃饭穿衣，就是一件大事，一件难事。作为一个革命家，不能只是高谈阔论，主要是工、农、兵、学、商，三百六十行，即做各种各样的实际工作。否则，就要打败仗，革命革不成，就不能生存。

理想中的革命家与现实需要的革命家之所以不相符，其原因就在根据地与非根据地的区别，旧观念与新事实的矛盾。

(二) 想做政治工作，不想做技术、经济、事务工作。

技术、经济、事务工作有其政治意义，政治工作也会带有技术、经济、事务性。军事机关，不仅有政治部，而且有参谋部和后勤部。地方工作呢？有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各个部门。单纯的政治工作，是没有的。

可否改行？比如搞文艺，许多人想去，我看不行。文艺有用，但仅仅文艺不够用，不能人人去弄文艺。而且，从事革命文艺工作，也要了解技术、经济、事务。文人也要下乡，不经历一番，不能成“家”。

“事务主义危险！”有些人这样说。他们不了解，现在需要办事，事务是革命的事务，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办革命事务，不会成事务主义。

新党员新干部必须从下层实际工作锻炼开始。从中组部派给陕甘宁边区的几百个新的知识分子干部着，他们到了下层参加实际工作之后，确也能埋头苦干，不仅在工作中积极刻苦，而且在思想意识上也是有极大进步的。他们的吃苦精神并不下于边区老干部，能与老干部团结，能接近群众，在群众中可以取得很好的信仰。因此，我们深切地感到对于新干部的锻炼，必须从

下层实际工作开始。

（三）所谓“大才小用”。

先说“大才”。现在中学生、大学生是可贵的，因为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知识分子就是有用之才。但这仅仅是“做人之才”，还不是革命的大才。中学、大学的程度在革命队伍里还不行吗？一部分行，一部分不行，而且不行的比较多。因为革命工作，不仅需要书本知识，还要社会知识和革命实践知识。现在有些研究工作者已经觉悟到这一点，叫苦连天。当然，新知识分子干部比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干部书本知识多，这是好的，但实践经验少。

新知识分子干部往往看不起农民出身的老干部，以为自己文化知识高，又很“大方”，老干部没有文化，又很“小气”。他们说：“农民干部是为土地、为自己的好处才来革命的，我呢？是思想自觉来干革命的。”其实，这种骄傲，这种想法，都是不对的。他们的书本知识、文化程度虽然比农民出身的老干部高，但是这些老干部的革命实践比他们多。新干部非但不应该骄傲，还应该向老干部学习。所谓“大方”、“小气”，我的看法倒是相反。我对农民有个估计：小事小气、大事大方。如果为了革命而拼命的时候，农民同志往往比知识分子勇敢，舍得牺牲。我不是说知识分子完全要不得，而只是说有些没有工农化的知识分子，在小事上大方，但是碰到了大事就有些小气。农民同志的缺点是有私有性、保守性，他们的好处是革命性强，这是主要方面，我们对农民同志应该有个比较正确的认识，看到他们的两方面。现在我们要记得，知识分子要工农化，革命主要依靠工农群众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们革命性强。

再说“小用”。要适当估计自己，不要嫌事小。做大事都是从做小事开始的。

（四）所谓“没有前途”。

共产党员事业心很强，志气最大，都希望有光明前途。但是，他们把个人的前途，寄托于革命的前途。无整个革命的前途，即无个人的前途。没有人民，就没有英雄。现在有很多人闹名誉地位，都想在历史上提一笔。但是，人太多了，写在历史上的不能有几万个。这样讲，是泼冷水吗？不是的，行行出状元。办法是：各安其位，精通业务。

二、关于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干部。

老干部经过长期奋斗，是我党我军之骨干。现在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不要卖老资格。老革命不必挂起招牌。要了解：德、才、资三个条件，不能专讲资格，需要重视才干。德、才不能分开。不能完成革命任务之德，是不完全的德。老革命是好，但不要成为包袱。使前进不轻快。

（二）要提高文化。这是前进的关键。学文化是学其他知识的基础，不学文化不得了，就会赶不上革命的需要。革命不等人，不学习如何为革命多做事？有的同志怕学习赶不上别人，这不要急，后来可以居上。应该有信心，可以学好，而且可以成为全才。只要自己立志，党可以帮助。学习不是一朝一夕，要长期下苦功夫。主要不是讲学校，而是靠自修。

（三）要主动团结新干部。在新老干部团结方面，要向老干部作负责的解释。老干部是老革命，处于领导地位，应负主要责任。当然，新知识分子干部也有责任。要了解新干部，不单指摘其缺点，应帮助、教育他们，要看到新干部是自己的同伴和将来的替手。而且，新干部也有长处，要向他们学习，取得他们的帮助。新老干部团结好了，就是老干部进步的表现。

三、关于专门技术干部。

现在专门技术干部不多，但已有了一批，这是我党我军不可少的。他们是革命的专门家，是在困难条件下工作和生活的专门家。革命者必遇困难。中央知道他们的苦干精神。

（一）专门家与政治。不要说专门家不懂政治，不然，他们为何来陕北？但是，在政治上要帮助他们。革命的专门家做技术工作，是为革命事业服务的。在技术上，我们要尊重他们。外行不能冒充内行，当然，经过努力，将来是可以学会的。外行应该变成内行，外行可以成为内行。

（二）在做专门技术工作的同志之间提倡合作。在学术上可以自由争论、研讨，工作上要互相合作，共同为革命服务，于革命有利，现在的情况是，政治上是合作的，技术上合作不够。各部门之间，各个人之间，都有程度不同的问题。合作之困难何在？不在生活习惯，而首先在思想。

进了革命队伍，还带有旧的思想习惯。旧社会是个人主义，我们是集体主义。集体力量一定比个人力量大吗？回答是肯定的。世界上一切事业实质上都是合作办成的。干好革命就是大家商量出来的。难道能否认科学上个人的发明和创造，能否认个人的努力吗？不能否认。但不学习前人的成果，就没有新的发明。人们如果都不合作，都在个人小圈子里打转转，可能都成为蠢人、野蛮人，书也读不成了。现在个人主义旧思想是存在的，必须纠正。

要采取科学态度，不要自以为是。有的医生不喜欢会诊，不希望别人治好自己治不好的病。有的人不愿别人说自己的短，而喜欢说别人的短。这是一种自以为是的态度。什么东西在作怪？面子、地位。请教别人，是否丢脸？并不丢脸。世界上的事物，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十分复杂，不认识或认错了，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我们要力求不错。不论医生或做别的工作的，特别是政治家，对不认识和认不清的事物要持慎重态度，这不会丢脸，轻率才易丢脸，毛主席处理事情就十分慎重。犯了错误，研究教训，决不是丢脸；不研究，不吸取教训，才会丢脸，有时会大丢其脸。总之，老实人不丢脸，不老实，怕丢脸，越会丢脸。请教别人是否降低自己地位？地位靠做好工作，不靠搞形式，摆架子。搞形式，摆架子，统统靠不住。提高地位在于自己少犯或不犯错误，决不能靠压低别人来抬高自己。

（三）前途远大。目前困难是有的。比如科学设备差，这是革命的专门家不可克服之困难。但是有前途的，因为革命有前途，革命成功了，科学设备可以取得。专门家有知识，可以搞创造发明。目前要增加经验，读书，集体研究。将来新的高明的人来了怎么办？不要怕吃不开。革命发展是必然的，吃饭的地方大得很，那个时候，提高自己技术的机会就更多了。共产党是否得新忘旧？新旧都要。团结人越多，革命的前途越大。

四、关于领导干部。

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责任是重大的。要使用人才，掌握政策。使用人才是件大工作，班子配齐才能唱好戏。要使领导工作做得好，就要注意以下几点。

努力学习，加强自己。学习什么呢？学理论，学正确的思想方法。在这个问题上，处在领导地位的同志，特别是军事系统的负责同志，不要因为怕犯教条主义错误而不敢读书。我们反对教条主义，不是不读书。现在我们的毛病，是马列主义不够。要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需要认真学习马列

主义。当然一般知识也需要。要读懂马列主义，而没有一般的知识，那马列主义也不容易消化、掌握和接受。正因为我们的一般知识和理论知识少，文化程度不够，所以有些同志就上了人家的当，成了教条主义的俘虏。读书要有信心。读得进的关键，是痛感知识少，下决心读。理论上、思想方法上搞好了，对党对革命是有很大大好处的。

识大体，顾大局。在工作上，如果只看到你的一部分，就要发生本位主义，妨碍大局。

赏罚分明。有些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对犯了错误的干部不大注意批评，使他接受教训，把工作搞得更好一些。爱护干部主要是政治上爱护。干部犯了三分错误，你把他当作十分，这是不对的。但是，完全不批评他，纵容错误，也不对。如果犯了严重错误不处罚，这样就不能教育他，也不能教育其他同志。如果对于好的同志不赏，这就不能使他更进步，也不能教育其他同志。所以，我们现在要提倡该赏就赏，该罚就罚。

五、关于军事干部。

军事干部需要爽快坦白的作风，但对革命队伍内的同志和老百姓不能横蛮霸道。会不会产生横蛮霸道的作风？很可能，因为手中有枪杆子，还有功劳。这是军事作风不良的一个方面。军队与地方的关系，双方要多责备自己，少责备别人。西北局就是采取这个办法来解决军政关系的，这很好。如果只进行自我批评，不责备别人，那就更好。军队是重要的，但没有地方和人民的支持，会变成光杆，一天也不能立足。

注 释

[1]见第 25 页注[4]。

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今天我讲四个问题。

一地方党委工作要照顾全局

这次会议讨论了党的领导一元化问题。要做到党的领导一元化，首先必须反对闹独立性的倾向。与此同时，地方党委工作也要照顾全局。如果地委、县委的工作不照顾全局，在客观上就会帮助闹独立性倾向的发展。所以，要实现党的领导一元化，就必须把反对闹独立性倾向和地方党委工作要照顾全局这两者结合起来。

过去地方党委领导不了军队，也不敢领导。现在中央已给了这个权柄，西北局也给了这个权柄，地方党委就要实行对军队的领导。今后如果地方党委和军队的关系再搞不好，一方面要责备闹独立性倾向的单位和个人，另一方面也要责备地方党委没有尽到责任。

地方党委用什么办法来解决照顾全局这个问题呢？以前地委、县委只管党务，今后除管党务外，还要管政府、军队、民众团体的工作。就是说，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以后，地方党委要管党政军民四方面工作，责任大大加重了。地方党委只有照顾好全局，党的领导才能稳固。领导者的责任主要是指明方向，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帮助人家做好工作。地方党委千万不要把军队的、政府的、民众团体的事统统自己揽起来，甚至包办代替，指手画脚，这是做不好领导工作的。换句话说，就是地方党委不能只是自扫门前雪，也不能代替人家去扫他们门前的雪，而是要领导大家去扫，指挥大家去扫。

军队问题也是地方问题，军队是地方人民的一部分，养兵就是养民。这样的观念，在地方干部中间是不是弄得很清楚呢？我看不一定。延安有些地方同志和我谈过，感到有关军队的动员工作太多，老百姓很苦，不如少一点好。这话不能说没有理由。但是，有些同志把老百姓和军队对立起来，没有把军队看成是老百姓的一部分，不懂得没有军队就没有老百姓的道理。要知道，陕甘宁边区如果没有联防司令部，没有留守兵团，老百姓过去土地革命革来的东西就都保不住。

照顾全局这句话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无论地委也好，县委也好，或者其他领导部门也好，过去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情况不完全熟悉，一下子要求人们照顾好全局，恐怕还不行，在某些事情上可能会发生一些缺点和问题，对此，军队不要挑毛病。总之，军队同志和地方同志都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互相谅解，互相帮助。

二老干部要带头学文化学科学

今天讲提高文化是指哪些人呢？是指土地革命时期农民出身的老干部，我们要努力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学文化不仅是识字，还要学习各方面的知识，包括历史知识，自然科学知识，等等。

我们过去十年进行的土地革命，是在山里、在乡下革命。参加革命的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他们起来革地主阶级的命。所以在我们党内、军队里面，干部也好，战士也好，绝大多数是农民出身。他们打仗很勇敢，但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不识字或识字很少。这不是他们的责任，而是社会制度不好，旧社会穷人不能进学校读书。现在陕甘宁边区的环境比较好，有条件让他们学文化。但也有一些同志不相信文化的作用，说打仗时老子一冲就行了。毛主席经常讲，打仗一冲就算了吗？不算！要有两冲：第一冲军事，第二冲政治。应该看到，我们的干部将来要担负的责任更重、任务更大，那时必须有文化，没有文化就办不好事。

有些农民出身的老干部很愿意学习，但先学文化好呢，还是先学政治好？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很好解决。比方在党校的学生，叫他学文化，但他看到人家学《六大以来》[1]，他也要学《六大以来》，结果挤来挤去就把文化课挤掉了，而政治也不能学懂。所以，文化低的，要尽心尽力学文化。政治是重要的，我们共产党就是搞政治的，但是搞政治要有一个基础。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这些不是电影，是写的书。如果连字还认识不多，许多基本知识都不知道，怎么去学？所以，要搞通政治，就先要提高文化；没有文化，就不可能学懂政治。

现在不学文化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革命的世面将越搞越大，新环境、新事物会更复杂，没有真本领是掌握不了的。随着形势的发展，以后还要进来一批有本领的新人物。你们没有文化，他们有文化；你们没有知识，他们知识很广泛，你们怎么同他们共事呢？当然不是说有新人物进来了，党会把老的一脚踢开。党不会做这样的事。但也不是一定要把老的摆在前面，新的摆在后面。革命是不能论资排队的，后来的可以居上。这要看什么呢？要看他有没有本领，有没有高明的政治眼光，有没有工作经验。你说我是老干部，有经验。但青年也会有经验，新的知识分子也会有经验，他们可以在实践中锻炼出经验。所谓新、老，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靠老资格，不求进步，就不行，革命需要我们的干部更进步，更高明，可否让革命等等我们？说我还没有进步，革命先不要发展？那可不行，革命不能等你，你不赶上去就要落后，所以说现在不学不得了。学了怎样呢？我们把它掉一个头，叫做不得了！为什么呢？同志们想一想，我们是老干部，是经过十年内战的，有丰富的革命经验，如果再加上文化知识，再加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经验、文化知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三样东西都有了，而且能够把它们结合起来，那还了得！

许多同志讲，我年纪这样大了，还有什么信心学文化知识呢？我的家乡有一句老话：“六十岁学吹打。”六十岁的人气短了，但他还要学吹鼓手。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许多同志说，我记忆力差了。我们要承认，老年人的记忆力是比青年人差一些，但理解力要比青年人强。比方从前我在学校学英文，觉得难得很。一九三五年我到苏联，看不懂英文报纸，要人家翻译成中文。后来我旁边住了一位大学生，我就跟他学英文，用了几个月工夫，马

马虎虎能看懂报上一点消息了。以前英文文法学不通，为什么这个时候能学懂一点呢？因为平常接触东西多了，也就容易学懂了。还有，我十五岁在上海当学徒，开始连报纸也看不懂，几年以后就能读懂了。我们应该有可以学好文化的信心。

同志们可能要说：“好呀！我也非常盼望学习，陈部长你就把我送到学校专门去学习吧！”这就很难了。我们学习主要的还是靠自修。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因为进学校学习的时间并不长，最多不过是两年。如果我们下决心要学文化，是不是住两年学校就可以解决问题呢？我看不可能。学习是一个长时间的问题，要做长期的打算。第二，大家都进学校是不可能的，因为工作离不开。在工作中学习是最主要的办法，是最靠得住的办法，只要身上揣着几本书，摆在干粮袋里，闲的时候就看一看。以后有了钱，不要做新衣服，而是买几本书，买一本字典，买一部《辞源》，有不认识的字就翻开字典、《辞源》查一查，养成这个习惯，一个字翻上三五次就认识了。《辞源》比什么先生都好，那是许多人编出来的。商务印书馆编《辞源》的时候，就请了几十个人，这些人都是全国有名的学问家。

提高文化水平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们党要帮助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同志提高文化水平，这对我们党的领导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责任。如果党没有帮助他们提高文化，那就是没有尽到责任。但是，另一方面，老同志自己要努力，如果不努力，只是党的帮助也解决不了问题。我们一定要想多种办法使这些同志的文化知识水平提高起来。

三认真开展自我批评

在这次高干会上，许多同志进行了自我批评。我和军队的同志接触不很多，了解的情况不很全面，但是我有一个感觉，这次高干会上军队同志的自我批评精神很好。自我批评有什么必要呢？毛主席那天讲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十二条，其中有一条就是讲自我批评的，世界上第一个领导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苏联共产党，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中，总结了几十年奋斗的历史，一，共有六条经验，其中有一条也是自我批评。可见，自我批评是很重要的，我们不应该忽视它。我们要同一切反革命作斗争，同党内各种“左”的、右的错误倾向作斗争，在进行这些斗争中，我们还要同自己的错误作斗争，这就是自我批评，如果没有这一条，我们的党就搞不好。自我批评对于我们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共产党是做事业的党，共产党员是做事业的人，做事就不可能没有错误。无论何人，哪怕他再高明，哪怕他很有本领，但还是有犯错误的可能。我们要决定政策，就要研究情况，用脑筋去想问题，如果自己脑子里所想的是主观主义的，和实际情况不相符，那就会犯错误。既然错误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而我们的革命工作，在错误之中又是不会成功的，那末，有了错误，发现了缺点，我们就要纠正。怎样纠正呢？就是要作自我批评。同时，人家批评得有道理，就应该接受。

我们批评同志，不是批评别的，是批评他的错误。这样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列宁说过，一个政党是否郑重，要看这个政党对自己错误的态度怎么样。我们共产党是一个郑重的党。考察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的标志之一，就是看他对自己的缺点、错误采取什么态度。如果他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错误，敢于研究并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那他就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如果他对对自己的缺点、错误采取马马虎虎的态度，那就不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

我今天同军队的同志们谈这个问题，因为你们不是普通的共产党员，而是军队里的党员，是军队里的党员干部。你们要好好地想一想，你们肩上的责任是何等重大！中国革命靠的是什么呢？就是靠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叫做武装斗争。武装就是指军队。当然，在党的领导下，我们还要做好政权工作和民众团体工作。在这些工作中，现在哪一个工作最重要呢？我看军队工作最重要。当然。军队是党领导的。我们没有党不行，没有党连在这里开会都不可能。没有党领导的军队也不行，我们也不能在这里开会。军队是革命队伍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军队干部的好坏，对革命成败有直接的影响。当然，今天决定中国革命的成败，不单纯是军事问题，还有政治问题，党的建设问题，中国革命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才能成功，如果我们搞不好，中国四万万五千万老百姓的解放，不知又要拖后多少年！既然是这样大的责任放在我们肩上，那末，我们有毛病，有缺点，有错误，就一定要改正。

有同志认为，开展自我批评会失掉自己的信心。他说我们军队是硬的，如果搞自我批评，今天批评一下，明天批评一下，军队就不能打仗了。我说，、这样想是不对的。自我批评是否会失掉自己的信心呢？比如贺老总[2]，在这次高干会上的报告中，就充满了自我批评精神。她的这种自我批评是不是会使我们对工作丧失信心呢？我想不会的，相反，我们的信心更大了。只要我们对对自己的缺点、错误估计得客观，不夸大，也不缩小，实事求是地把毛病找出来，我们以及我们的士兵，都不会失掉信心。我们不抹煞成绩，同时

也不掩盖缺点、错误。这样对整个工作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那末，自我批评是不是会丧失我们的威信呢？威信在军队里头是很重要的。如果军队领导干部没有威信，下级就不听命令，那就不能指挥作战。但是要知道，靠上面发给你一个威信，靠招牌来建立威信，都是靠不住的。威信是建立在正确的军事指挥和平时工作上面的。进行自我批评，克服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只会使你的指挥更正确，工作做得更好，因而你的威信就会更高。有些同志认为有了什么毛病，要不分场合到处作自我批评。如果是那样，当然也不好。应该弄清楚一点，就是我们的批评是对待革命同志的。在敌人跟前，我们不能作自我批评。不能把党内处理问题的原则用来对待敌人。

我们自己应该有自我批评，这一条要经常注意，同时有很多事情还要认真听取别人的意见。因为我们自己的意见不一定是客观的，而别人对自己的缺点、错误可能会看得更清楚些，处理问题可能要更客观些。要做到客观，有先要对自己客观，对自己客观了，就可以把人家也看得客观。开展自我批评，会使一个人更虚心、更客观。如果军队干部自己不虚心、不客观，其他部门的干部也就不敢批评军队干部，在军队里，横行霸道的作风有没有呢？我想还是有的。霸道的作风，也就是不客观。霸道作风应该是对付敌人的。比如打仗的时候，我们应该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是，我们不能把它搬到党内来，也不能把它搬到革命队伍里来。如果把它搬来对待自己的同志和党外人士，这就不好了，应当改正。

四坚决反对自由主义

对犯错误的同志既不能进行打击，搞残酷斗争，也不能采取自由主义的错误态度。

对于新的知识分子干部中间存在的一些问题，自抗战以来，我们曾采取一种自由主义的错误态度。有的同志讲了三个原因：一是由于过去搞过火的打击，现在走到另一个极端；还有一个是统一战线环境；第三是由于我们队伍里新的知识分子成分大量增加。我很同意关于这三个原因的分析。过去我对知识分子中间存在的问题也估计不足，我有责任。一九三八年我在抗大[3]讲演，只讲了季米特洛夫[4]的六条干部政策，没有讲到对干部本身的四条要求，即：第一，对党忠实；第二，同群众有联系；第三，有独立工作能力；第四，遵守纪律。

我们对于党内的错误倾向，反对得也少，只讲团结，没有斗争，这是有普遍性的。毛病在什么地方呢？第一，工作是被动地而不是主动地去做。组织部长的责任是，看到一种错误的现象，就要问，就要批评，说这是错误的，值得注意。这项工作应该是主动地去做，如果是被动的，人家不找来就不讲，闹得天翻地覆的时候才讲，那就来不及了。第二，只注意组织上的问题，不注意思想上的问题。如果思想根子不挖一挖，是不能够去掉毛病的。第三，只注意下层，不注意上层。一般来说，下面有一种什么倾向都是小倾向，大的事情是闹不出来的，闹独立性也不见得是下面能闹起来的。反对错误倾向，最重要的，是在高级干部身上。只要上面的错误纠正了，下面的文章就好作了。我这样说，是不是对下面的小问题就不要管？那也不是。下面的小问题还是要批评，但是更应该注意上面的大问题。第四，过去我们只注意个别现象，不能够把某种突出的个别现象作为典型进行一般教育。中央的同志、尤其是毛主席就不同，他们很注意通过个别事例教育大家。以上这些毛病。实际上都是自由主义的表现。自由主义好不好？当然不好，因为它会助长错误。其结果，只能损害人，损害党。那末，怎样才能克服自由主义呢？第一，我们要像毛主席讲的那样，嗅觉要灵敏，要主动地发现问题。第二，共产党员看问题要尖锐一点，不能明哲保身。第三，在反对错误倾向时，态度一定要坚决，一次不行就几次。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就能够逐步克服错误倾向。第四，要注意纪律。要有赏有罚，赏罚分明。目的是使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使正确的同志更前进一步。

注 释

[1]《六大以来》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在延安编印的党内秘密文件汇集，分上、下两册。一九八〇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 指贺龙。

[3] 见第 25 页注[4]。

[4]季米特洛夫（一八八二—一九四九），保加利亚人。一九二一年任工会国际中央理事会理事，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三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

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日)

同志们！现在大家要下去做工作，我来讲几句后送行。我们党的文艺工作者，十几年来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化，有了很重大的贡献。这是不能够否认，也不应该否认的，但是我今天不打算讲这方面的事情，我想讲讲我们做文艺工作的同志们中的两个倾向，或者说两个缺点。请同志们考虑一下讲得是否对。两个什么缺点呢？一个是特殊，一个是自大。这两样东西我看都是不好的，都是应该去掉的。从积极方面说，也就是希望大家不要特殊，不要自大。

先讲不要特殊。在我们做文艺工作的同志里面，或者说宽些，在我们做文化工作的同志里面，有没有人感觉我是一个文化人，和旁的党员不能相比，对党的关系也要与众不同呢？我看这种人是有的，不但他们自以为特殊，旁的同志也把他们当作是特殊。这种现象，应不应该在党内存在？为要答复这个问题，先得弄清楚文化人是以什么资格做党员的。可以有两种看法：第一种是，基本上是文化人，附带是党员。这种党员是以文化人资格入党，而不是以千千万万普通党员中一分子资格入

党的。第二种是，基本上是党员，文化工作只是党内的分工。也许还有第三种，文化人和党员各半。不过，这只是过渡形式，是一定要向第一种看法或第二种看法发展的。党对这两种看法的态度怎么样？毫无疑问，党是要求确立第二种看法，反对第一种看法的。因为只有这样，党才能成为统一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党。要是不然，你以文化人资格入党，我以军人资格入党，他又以农民资格入党，党就成了什么样子呢？党就不成其为党，成了“各界联合会”。这是一个原则争论，原则区别。党是不是像共产党？党员是不是像共产党员？原则区别就在这里。可否来一个妥协？妥协就是帮助“各界联合会”的成立。所以，妥协的路是没有的。那末，党员中间是不是还有分别？有分别，分工就是分别，但是分工并不能作为特殊化的根据。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五十三条党章^[1]里面，一条也没有讲起党员分工以后怎么样，党员就是党员。要说分工，个个党员都分了工，我们党内就没有一个不担任任何具体工作的“单纯党员”。是不是文化工作比别的工作高一等？这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士大夫观点，而不是我们的观点。我们认为凡是对群众、对革命有必要的工作，都同样有价值，做好了都同样有功劳。一定要问什么工作最必要，那末，只有说劳动最必要。这才合乎历史的实际。而劳动者恰恰就没有向党向社会要求过什么特殊化。如果一定要求特殊，这个要求是前进的还是后退的？这是后退的要求，这是要使先锋队的党员向党外老百姓看齐，使党向“各界联合会”看齐。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志，都不要有这种落后的要求。

同志们或者还要问，那末，党为什么又说要照顾做文化工作的同志呢？我想，这不外是两个用意：一个是因为分工的特点。每种分工都有它的特点，用做文化工作的方法去做军事工作不行，用做军事工作的方法去做文化工作也不行。文化工作中个人活动要多一点，这在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里面说得很好，如果不照顾到这一点是错误的。还有一个用意，是因为考虑到一部分文化工作同志的弱点。做文化工作的同志们过去大都是分散工作，

受党的教育比较少。和工农兵的结合也很差，因此在思想意识上不免产生一些弱点，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要人家长期照顾，到处对人家讲，我有缺点，你们要照顾呀！这就并不漂亮了。这是我要说的关于不要特殊的第一层。

这一层弄清楚了，接着就好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要不要遵守纪律？这个问题在大多数党员是容易解决的；在文化工作的同志中，过去就曾有过一些麻烦。但是，如果我们的党员不是请客似的请来帮忙的，——这种客是请不得的，请来也会越帮越忙，——那末，就要毫无例外地实行我们的党章第四十四条：“严格的遵守党的纪律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可否不要纪律呢？如果不要也可以，那就是毛主席讲的六个字：“亡党亡国亡头”，就一定不可避免。我们的党是一个战斗的党，我们在斗争中依靠的武器，唯一的就是纪律。你说机关枪也是我们的武器，但是我们的机关枪又是哪里来的？是由有纪律的党领导群众斗争得来的。并且越是有了机关枪，就越要依靠纪律。一连人作战的时候，我要向这里冲，你要向那里冲，大家都不听连长的指挥，怎么能不打败仗呢？如果我们的党没有纪律，大家争论没有一个止境，我们怎么能有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的一致，怎么能不亡党亡国亡头呢！纪律有没有束缚性？我们的纪律基本上是自觉执行的，但是假如有一回有一个党员偏不自觉，那怎么办？那就得来一点束缚。是不是这一下就把我们的天才束缚住了？我说不会。我们的纪律只束缚那些非无产阶级的妨害革命的东西，就像游泳术对于游泳的人只束缚他不要淹死一样。真正的游泳家在水里是自由的，真正的革命家，在有纪律的革命运动里，也是自由的。如果我们一定要革命，又一定要施展一些妨害革命的“天才”，那么对不起，就得束缚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决不会感到是束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毛泽东同志，这些人我们都承认有天才，但是他们都是遵守纪律的模范。所以，同志们对于这一条完全可以放心。

同志们过去对于有纪律的生活既然不很习惯，现在又要到前方到乡下去工作，那末，在遵守纪律的问题上有什么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呢？我以为要特别注意真心地遵守和具体地遵守。所谓真心地遵守，就是要心口一致，言行一致。口头上说要遵守纪律并不难，我们要求的是会场上这样说，散了会私下里也是这样说，不但这样说，而且这样做。所谓具体地遵守，就是要在各种具体的情形下面来遵守。我们说要服从真理，服从革命，赞成的人一定是很多的；说要服从无产阶级，服从共产党，赞成的人也不少；再说要服从党中央，服从毛主席，这也还比较容易；但是说要服从支部，服从直接的上级，这就发生了困难。为什么？因为这种人只能抽象地遵守纪律，不能具体地遵守纪律。具体地遵守纪律，就一定要服从支部，服从直接的上级，即使上级的人比你弱，你也一定要服从。做不到这一步，我们的党就要垮台，因为假如谁都是觉得自己的本领强，自己的意见对，没有一个约束，结果就谁都服从自己，不服从别人，而党的统一就完全没有可能了。

第二个问题，做文化工作的同志要不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实际的政治？这个问题对大多数党员是不成问题的。做社会科学工作的同志，在纠正了教条主义倾向以后，一般也不成问题。而做文艺工作的同志中间，就一直有些不同的议论。有的说，做文艺工作可以不学这两项。有的说，学了反而妨碍文艺。也有的并不发议论，就是不学。但是，我们的文艺工作，不是叫做革命的文艺工作吗？要判断我们的文艺工作究竟是不是革命的，合不

合群众的需要，除了学习革命的理论 and 革命的实际，还有什么旁的办法？严格地说，任何文艺工作都是脱离不了政治的。比如怎么写光明写黑暗的问题，就是一个政治性质的问题，也是文艺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不把这一类问题搞通，我们写出来的作品怎么能反映一个时代，怎么能反映这个时代群众的斗争？所以，那种以为作家可以不学习政治的意见，实际上就是否认文艺要服务于政治、服务于群众的意见。这个道理，毛主席在去年文艺座谈会上曾经详细说过，我现在不多重复。我只补充一点，就是学习政治不但于创作有好处，于作家为人也有好处。政治可以使我们放开眼界，放大胸襟，可以使我们去掉一些小气，少一些伤感。我们有些同志，一高兴就是灵感，一不高兴就是伤感，这叫做感情用事。这样，事情固然搞不好，自己也很吃亏。我们是干人类解放的大事业的人，就算二十岁加入共产党，活到六十岁不过四十年，还要为一点小事情烦恼，不是太划不来了吗？现在同志们到实际工作里面去，这一点，关系更大。为要把工作做好，为要和一起工作的同志团结得好，都需要大家努力注意学习政治。

以上是讲不要特殊。现在再讲不要自大。这与前面讲的问题是有联系的。所以要特殊，就因为自大，要反对特殊，就要进一步反对自大。我不是说做文艺工作的同志都自大，但是确有一部分同志有这个毛病。毛病是从两处来的，一是对整个文艺工作有不合事实的估计，一是对个人成就、才能有不合事实的估计。这里要分别研究一下。

有些同志觉得自己过去写过很多文章，画过很多画，作过很多曲，演过很多戏，因此很值得骄傲一番。这是不是值得骄傲？我说丝毫值得不得骄傲。如果做文艺工作是一个人的分工，那末，他这门工作做得好，是他尽了份内应尽的责任，做得不好，就是失职，就是不及格。文艺工作的内容，无非是群众的生活和斗争，这些事情本身都是旁人做的，作家不过是将它们用文艺的形式表现出来，要是旁人不做，作家也就没有什么可表现。为什么表现实际，硬比实际做的更值得骄傲呢？而且天下的事情真是多得很，大得很，比如革命，就是要使全人类翻一个身的大事，文艺家就是能把这件大事完全表现出来，他对于人类历史的作用也还是不能和革命本身相提并论，何况文艺家所表现的又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有些同志又觉得自己有许多读者，有许多群众，因此值得骄傲。这个想法适当不适当？我看也可以考虑。群众为什么欢迎一个作家？主要是因为他的作品能够反映他们的感情，所以一个革命的作家，一个和革命群众在一起的作家，自然就能够得到革命群众的欢迎。如果有人把这种关系绝对化，以为自己无论拿出什么作品来总是会有群众的，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不要说一个和群众走反对方向的作家，就是走同一方向，但是自己走慢了，落到群众后面去了，也会被群众所遗忘的。并且我们还要计算一下，现在我们多数做文艺工作的同志究竟有多少群众？应该承认，我们的读者还只是群众里的一个很小的部分，离开与广大群众相结合这一步还远得很。在这个时候就忙着骄傲自己有群众，这就更加有害了。我们不要把文艺的地位一般的估计过高，同时对个人在文艺上的地位更不要估计过高。我们做文艺工作的同志，是否都能很客观地估计自己呢？我看有些同志不见得能够如此。我们有些同志喜欢做“家”，人家恭维他们是“家”，他们不推，人家不恭维，还要急于抢着自称为“家”，久而久之，也就弄假成真起来，俨然有了个架子。这个架子是很不妙的，这是一个“包袱”，一个负担，背着它就不好往前进。我们的这些同志忽略了一个简单的真理：“小

菜煮在锅里，味道闻在外面。”一个人的成就，要靠群众的判断和历史的考验，不是靠自称的。我们口称不如上秤称。看自己的知识够了没有？没有呢！我们的年纪还轻，知识还少得很。我们名为共产党员，但是对于党的知识就不多。工人工作是怎样一回事，农民搞土地革命、搞农业生产是怎样一回事，现在八路军、新四军打仗又是怎样一回事，许多人都不十分了解。不但革命的知识，就是社会的知识也很少。我们的同志有住在上海的，是不是知道上海呢？大家知道上海有交易所，但是证券交易所也好，纱布交易所也好，究竟是个什么情形，知道的人就少了。我听说茅盾写《子夜》，就跑了好久的交易所。但是，许多同志不但不知道什么是交易所，就连在上海吃的大米是哪里来的，拉的大便往哪里去的，住了七八年都不知道。所以，我们的知识实在是很少的。同志们现在都很年轻，知识少，不能成“家”，这不奇怪，也不可怕。可怕的就是现在不学习，不深入群众，自以为差不多，到了四五十岁以后，还是现在这个样子，没有充分的知识，没有真正成熟的内容丰富的作品。这种自大的人，就因为不知道这个危险，所以自己不求进步，也不求旁人的帮助。他们最主张批评，最喜欢批评旁人，偏生最不喜欢旁人批评自己。表面上说几句“欢迎批评”的话有没有呢？是有的。每逢演戏，开演前都有人出来说：“我们这个剧排演时间仓促，技术上比较差，希望同志们批评。”但是，这类话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说有的是假的。你要真的批评起来，那就成了仇人。他们心里是只许人家说好的。这样，使人家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真正同志式的“是则是，非则非”的态度，既然没法拿出来，不如敬而远之了。我们现在就要提倡真正同志式的态度，就要提倡自我批评。有些同志想，实行自我批评，这不要丧失自己的身分吗？恰恰相反，最不能实行自我批评的人，最自大的人，就最容易丧失自己的身分，自己的架子搭得越高，跌下来就越痛。斯大林说：“使布尔什维克增光的不是骄傲，而是谦逊。”我们共产党是一个照实际办事的党，是一个说老实话的党。我们做文艺工作的同志也应该照实际办事。能够说老实话，听老实话。这对于同志们自己，对于党，对于整个新文艺运动，都是有好处的，都是必要的。

我今天就讲这两点，因为是专讲缺点，又是实行同志态度，讲的话也许不很好听。但是，我的意思是为同志们好，还是为同志们坏？这是大家一定能够弄清楚的。我讲的缺点也只是一部分同志的缺点，就是这部分同志，也有很多优点。头一条就是他们拥护光明，反对黑暗；拥护工农兵，反对侵略者，这是任何不革命或反革命的人所不能比拟的。他们的缺点也只是革命中的缺点，从旧社会带来的暂时的缺点，在革命队伍中一定能够很快克服的。我们的同志都是很聪明的人，这一回经过了整风[2]，现在又到群众中去做实际工作，进步一定很快。如果我今天的话能够对同志们的进步有所帮助，那就是我最大的快乐了。

注 释

[1]见第 32 页注[2]。

[2]见第 156 页注[2]。

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

（一九四五年五月九日）

如果有同志问我，你做了几年组织部长，有什么交代没有？我说有一点。今后我不做这个工作了，彭真同志做这个工作。他问过我，你有什么交代？我说：有多少党员，多少干部，多少党表，多少小册子。这是在少奇同志房子里交代的了。现在不讲这个，讲另外一个交代。我感到我有责任，把我所看到的一点，在这个代表大会上向各位代表讲一讲。同志们研究，看我说得对不对，不对的可以批判，条条可以驳。这七年来我看到一点，就是在党内一部分干部中间，有一股骄气。什么是骄气？就是骄傲之气。七年中间我在工作中接触的干部多不多呢？不很多。去过华北没有？去过华中没有？去过后方没有？都没有。但是，这些地方来延安“朝山进香”的很多，就在这些接触中间，我看到有一种情形，就是许多人喜欢人家说他好，不喜欢人家说他坏。有的人只能升官，不能降级，有功必居，有过必避，有功的时候他一定要居；有过的时候你批评他，他总是想很多道理来解释，其目的就是说明他没有过。人家说功他就舒服，说过就不舒服。我们党内一部分干部中间是有这种倾向的。我再把界限分清楚一下，我们党内干部基本上是好的，还是坏的？基本上是好的。基本上是不是布尔什维克？基本上是布尔什维克，是带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我前面讲的那种状况，在党内整风^[1]以后和整风以前是不是一样呢？不一样，有变化，整风以后有很大的改进。这种状况还有没有呢？在一部分干部中间还是有的。整风有一部分干部整到了，有一部分没有整到，我说是一部分，不是全部。在这一部分前面我再加上两个字，是“很大”的一部分，并不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这些干部是地方的，还是军队的？我说，都有。地方也有，军队里也有。照我看来，军队里头比地方多些。这是我的看法。有骄气的干部是下级干部，中级干部，还是高级干部呢？都有。下级也有，中级也有，高级也有，大头子也有。下级干部的个人主义，高级干部的个人主义，性质是一样的。但在我看来，两个“包袱”不同。因为下级干部虽然背个人主义这个“包袱”，但他只能背那么多。比如当一个连长。他只能背一条被单，两双鞋子，一包牙粉，一把牙刷，身上只有这一点。背那么一点好不好？也不好。但是大干部、大头子，党头、军头，就有大行李。有被子，有褥子，有时候有两条被子，还有毯子。行李担子里，有大行李，也有小行李。所以说高级干部中间，如果有这种倾向，那危险性一定大于下级干部、中级干部。我说的“包袱”是什么性质？是共产主义者的思想里有个人主义的成分。为什么骄傲呢？骄傲并不是没有原因，是有原因的。因为他看到自己有功劳，看到这一点就骄傲起来了。如果他觉得自己毫无功劳，那还有什么可骄傲的呢？骄傲是因为觉得“兄弟有点功劳，可以骄傲”。

所以我顺便讲一点对功劳和错误的看法。假设你在党的领导下做一点工作，做得还不错，对这个功劳怎样看法？我说这里有三个因素：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可不可以把次序倒转一下，第一是个人，第二是党，第三是老百姓？我说不能这样看。为什么不能这样看，人民为什么是第一呢？道理是很清楚的。哪一条英雄好汉要是这样想：“如果我不干革命的话，老百姓一世也不能翻身。如果我不出来的话，老百

姓不得了，中国共产党不得了。”我看是错的。这条英雄好汉，死了以后，革命是不是停顿呢？老百姓是不是不革命呢？老百姓还是要革命的，党还是要继续前进的。可见头一条不是英雄好汉，而是人民。第二是党，对党的作用要有足够的估计。比如拿军队来讲，我们的军队也会打败仗，但是打不垮。这一件事我有亲身经验，耳听为虚，目见为实。长征中，五军团[2]行军时天天打仗，打了一百天，看起来不能再打了，手里拿着火把走路，精神很不好，但如果上面决定要打，那任何人都可以丢掉火把照样打，把敌人抵住。被人家俘虏去，还一个一个跑回来。长征时那样苦，谁也不愿意到旁的地方去，还跟着我们。因为这种队伍是共产党的队伍。这种队伍好带也不好带。不好带，是大家都讲革命的道理，来不得强迫命令；好带，是因为大家都觉悟了，每个人都拼着命干，自觉地干。在别的军队里头，一个连长，团长、师长反水，就可以把队伍带走，可是我们的军队不是这样。某个什么长反水，下面的战士可以把他杀了，不跟他去。这样的例子多得很，从前有，现在也有。这是什么力量呢？这是党的力量。共产党到了一个地方，人民就欢迎，老百姓首先问你是不是八路。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老百姓拥护共产党。他是穷人，他想翻身，打土豪分田地，想“共”一点产，他赞成共产党。这不是个人力量，这是党的力量，党的影响。我们共产党有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在内战后期，虽然路线错了，老百姓还是欢迎我们。我这样说不是为那时的错误辩护，而是讲事实。老百姓不说你是教条主义路线，他只看见你是共产主义者、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为人民谋利益。这一切证明我们党的力量是伟大的。所以，头一条是人民，第二条是党，第三才是个人。

个人有没有作用？如果我否定个人的作用，那也是错误的。如果说，个人完全没有作用，那我们现在还拥护毛主席干什么？我说个人有作用，有时还有很大的作用，这是有事实根据的。现在除了极少数反动分子以外，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讲我们的毛主席领导得好。但无论怎样，根本的东西是老百姓，是共产党。如果承认上面的话是对的，那末，一个人做了一个时期的工作，还做得不错，是不是可以说，我的功劳蛮多？这样说法就不适当。应该这样看：在人民的革命要求之下，在党的领导之下，我们适合客观情况，做了工作，错误还不多，工作还马马虎虎。客观情况可以做到十分，你也做到了十分，这种情形很少。客观情况可以做到十分，因为你自己有缺点，只做到八分或六分、五分，这种情形是很多的。那这里头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呢？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客观情况很好，本来可以做到十分，但是因为自己有错误，成绩一点没有，缺点蛮多，或成绩只有二分、一分，错误有八分、九分，非但无功，过错一大堆，就更不应该骄傲。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看问题，这样看对不对？对的。我们确实不敢把个人的作用看得过了头，看得太大。

如果别的同志尊重你，说你的工作做得很好，那就要小心。说你好，你的肩膀不要觉得轻松了，轻松了就要摔交。什么时候容易摔交呢？长征中有这个经验，平常走路生怕跌交，小心得很；如果你以为自己行军从来没有跌交，那就很快要跌交了，所以大家说你好，一定要小心。要想一想我是不是那样好，恐怕没有那样好，应该小心一点。我们中国共产党里有好多这样的例子，觉得个人作用大得很，超过人民，超过党，最后跌下爬不起来。最显著的例子，我看到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陈独秀，一个是张国焘。陈老头从前还不是了不起！大革命时公认为党的领袖。张国焘，张主席，在边区做过主

席、但是当他离开了老百姓的时候，当他离开了党的时候，一个大钱也不值。前清时候用的是麻钱，后来用的是铜板，他值不值一个铜板呢？不值。他们现在搞什么？陈独秀死了，他搞过取消派反对我们，老百姓不拥护他。陈独秀是不是从前的陈独秀呢？后来的陈独秀和大革命时候的陈独秀是一个人，前后都是陈独秀，以前拥护他做领袖，以后大家都不理他了。张国焘从前是张主席，现在搞特务，有没有人拥护他？拥护他的只有蒋委员长，老百姓不拥护他。他原来的山头大不大？四方面军很大，但他走的时候单枪匹马，干部统统离开他，警卫员也回到了延安，他一个人在清明时节雨纷纷中走了。这件事，可以做我们的教训。个人的作用是有的，不过自己不要估计太大了。任何人离开了人民，离开了党，一件事也做不出来，应该这样估计。我们的功劳是哪里来的？头一件，老百姓要革命。我们是党员，在党的领导下，适合老百姓的要求，做了一点事，如此而已，一点不能骄傲。

对于犯错误的看法，我觉得除了一个人的立场不正、心术不正以外，犯错误还有其他原因。因为他对客观的事物看错了，所以行动也错了，这是结果。这种情形多得很，过去多，现在多，将来还不知道有多少。人家说“老兄你错了”，是不是面孔就要红，就不高兴？有错误当然不好，但只要态度正确，也不要紧。假如你有错误，人家讲了，就请教请教，问一问人家怎样看法，纠正一番，以后可以少犯错误。我们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是什么就是什么，应该怎样就怎样。有的时候你愈要面子，将来就愈要丢脸。只有你不怕丢脸，撕破了面皮，诚心诚意地改正错误，那时候也许还有些面子。共产党员参加革命，丢了一节，准备牺牲性命干革命，还计较什么面子？把面子丢开，讲真理，怎样对于老百姓有利，怎样对于革命有利，就怎样办。我们肩头担负这样重的任务，如果强调讲面子，在讨论问题时，就会不客观，看问题就有个人的角度，有利于他，有利于他的面子，就赞成你的意见；对于他的面子不好看的，便不赞成。如果一切从自己面子的角度出发，讨论问题、看问题搀杂个人得失在里面，立场不正，就不会看得很清楚，不会讲真理。结果一定害人害己。错误就是把客观看错了，结果也错了。例如敌人很强，我们侦察错了，以为很弱，便打了败仗，败仗就是其结果。这种情形不但过去有，将来还有很多，每个人都会有的。

我为什么在七大的会议上费这么多时间，讲一讲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我有责任，我做了七年组织部长，看到这件事，需要在大会上讲一讲。希望大会的代表审核一番，对不对，对的几分，错的几分，或者全对，或者全错，错了条条可以驳。如果这种情形确实存在，希望大家在这一方面有所改正。现在是一个时机，很重要的时机。毛主席的报告指出了，根据现在的世界大势、中国大势，我们是处在决战的前夜。我们有这样的志向，要解放全中国，使全中国的人民起来，把政权拿在手里。要做这件事，而且马上就要做，开七大就是为了实现这样的任务。现在全党的任务是要增加力量。增加力量的方法很多，有的是扩大解放区，有的是缩小沦陷区。对个人来说，要增加又要减少，增加就是要学习，减少就是要把“包袱”放下，放下“包袱”也是增加力量。这个力量的增加是不可估计的。如果我们的同志都把心摆得非常正，非常实事求是，毫无个人主义，可以抵得十万军队，一百万军队，这是无敌的力量。

同志们，中国共产党是有军队的党。我们干革命，有地方工作，有军事工作，现在主要是军队工作，武装斗争。军队是拿枪杆子的，它的组织更集

中，干部的责任很大，高级干部的责任更大。四万万五千万人能不能翻身解放？解放得早还是迟？少牺牲几十万人还是多牺牲几十万人？全国人民把希望寄托于我们党的身上，把希望寄托于我们的高级干部身上。如果我们搞得好，便胜利得早，人民解放得早。如果搞得不好，四万万五千万人便不能很快解放，革命胜利会推迟多少年，人要多牺牲很多，那我们就对不起老百姓。我们党的工作好坏，决定着中国革命的命运。共产党员，是老百姓派你当代表干革命，老百姓要你领导他们求得解放。我们有这样的责任，不能搞坏，搞坏了不是一个人、几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得失。我们要兢兢业业，所有坏的东西，一切应该丢的东西，统统丢掉。我们要在老百姓面前，负起责任，如果不是这样做，便没有尽到责任。人们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是否对人民尽了责任，可以考验谁是优秀子孙，谁是不肖子孙，这个责任摆在我们身上，我们要好好地、兢兢业业地注意这个问题。我重复一句，我们的同志基本上是布尔什维克，基本上是好的共产党员，现在我说的是好中间还有一些缺点，一部分干部有这样的缺点，现在要把缺点改掉。从前内战时期，有一本《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3]，那是不好的。我们要把“包袱”丢了，真正为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把自己的力量加强，把党的力量加强。

注 释

[1] 见第 156 页注[2]。

[2] 五军团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它由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宁都起义的部队改编而成，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主力军团之一。长征中担任后卫任务。当时，董振堂任五军团军团长，李卓然任政治委员，陈云是中央代表。

[3] 《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是王明写的一本“左”倾教条主义的小册子。一九三一年出版，题为《两条路线》。次年再版，改为现名。

怎样才能少犯错误

(一九四七年二月七日)

我们可不可以少犯错误？这个问题提得好。拿我来说，我是中央委员，我犯了错误，影响就比较大。

我们怎样才能少犯错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呢？在延安的时候，我曾以为自己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少。毛主席对我说，你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他要我学点哲学。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还是对我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他以张国焘的经验并不少为例加以说明。第三次毛主席同我谈这个问题，他仍然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

后来，我把毛主席从井冈山到延安写的著作都找来看，研究他处理问题的方法。同时再次考虑，错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得出一条结论，是由于主观对客观事物认识上有偏差。凡是错误的结果都是由行动的错误造成的，而行动的错误是从认识的错误来的。认识支配行动，行动是认识的结果。比如。蒋介石为什么说三个月或者五个月就可以消灭我们呢，他的这种错误的判断，就在于他对我们的兵力是同群众密切结合的这一点缺乏估计，同时夸大了自己精锐武器的作用，忽视了自己军队的士气低落和同群众的严重脱离。敌一九五师的失败，也是由于赵公武[1]和陈林达[2]对我们部队的认识不对，他们错误地认为我们兵力分散，不能集中。我们这次在敌后，有些同志有点惊慌失措，原因是他们过高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明明是个瓜皮帽，却把它看成了猫耳山[3]。因此，我认为我们做工作，应当把百分之九十九的力量用在了解情况上。情况了解清楚了，就可以正确地决定对策。我在延安时从枣园出来后到财办工作，如果要我明天作报告，当天晚上还忙于搜集材料，以了解情况。不忙于决定对策，而首先了解情况，这才不是本末倒置。

实事求是既容易做到，也难以做到。要做到实事求是，就要从具体分析实际情况中找出对策。人之所以犯错误，都是由于不了解实际情况就匆忙地决定对策，主观与客观相脱离。当然，我们过去所以犯错误，也不是对实际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只是了解的情况是片面的，而不是全面的，误把局部当成了全面。片面的情况不是真正的实际，也就是说，它并不合乎实际。所谓难也就难在这里。我参加革命二十多年，犯错误都是因为认识上存在片面性。要少犯错误，就要避免认识上的片面性。其方法，我概括为三条：一、交换，二、比较，三、反复。

交换是带头的。所谓交换，就是要互相交换正反两面的意见，以求了解事物的全面情况。交换时要特别找同自己相反的意见，相反的意见可以补充我们对事物认识的不足。相反的意见即使错了，也有可能反映了事物的一个方面，或者包括一些历史经验的推论。因此，对同自己相反的意见，我们也要作些分析，吸取其中有用的部分。陈独秀的错误，李立三的错误，王明的错误，不是由于这些人发神经病，或者因为他们是傻瓜，主要是由于他们夸大了事物的一面，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一九三〇年的革命高潮，只是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运动处于低落时高，而不是比大革命失败前高。红军力量比过去是大了，但还不是大到足以打垮蒋介石军队的程度。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变，使全国的抗日反蒋运动掀起了一个高潮，但还不是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四中全会[5]的错误结论，临时中央作出的关于争取革命在

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错误的决议，都对当时的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我们不能说犯错误的同志对形势的判断是毫无根据的，但是他们夸大了客观事物的一个方面。所以，我们应该收集反对意见，对于正确的反对意见，可以补充我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不足。对于不正确的反对意见，我们要把它驳倒。愈是不正确的，就愈要把它驳得彻底。既然要批驳，就得找论据，这可以加深我们的认识。正确的意见往往就是由系统地驳倒不正确的意见而产生的。各种资产阶级的、假马列主义的错误思想，为毛主席的真马列主义的正确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毛主席的著作都是采取这个办法写的。如写《论持久战》，他先收集速胜论和亡国论的论据，经过分析、批驳，得出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这个正确的结论。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主席首先批驳只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或者只要研究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或者只要抄用北伐战争的经验，就可以解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的错误意见，然后提出必须研究中国革命战争尤其是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的特点、规律和战略战术的正确主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是先批驳文艺是超阶级的、文艺工作者无所谓阶级立场的观点，进而阐明了文艺必须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所以，要做到交换，特别是要做到同反对自己意见的人、同其他阶级的代表交换意见，首先要明确交换的目的在于能使自己对事物认识得更加完整。同时，要设身处地地站在对方立场上想一想，他们的意见是否有道理，凡是有理有据的都要吸取。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往往不喜欢同自己意见相反的人谈话，互相交换看法，这是不好的。

交换是为了更全面地认识事物，比较则是为了更好地判断事物的性质。不经过比较，就看不清事物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它的要害和本质是什么。检验黄金的纯度要用试金石，验血也有参照的标准。我们如果用比较的方法，把一九三二年的革命高潮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相比，再与上海三次暴动时相比，就知道一九三二年的革命高潮达到什么程度，然后再决定我们的策略，这样就不至于采取“左”倾冒险主义的行动。前几年有位美国将军叫史迪威[6]，他派观察组到延安，拿我们对美国的政策，来比美国对我们的政策，结果改变了对我们的态度。所以一经比较，就能够对事物认识得更清楚、更深刻。又比如，今天我们要不要在南满坚持，只要把现在坚持所带来的牺牲与将来退到长白山可能造成的牺牲，大小轻重，有无价值，加以比较，就容易作出必须坚持南满斗争的决走了。

比较仍然是认识的过程，反复则既是认识的过程，也是实践的过程，反复，首先要在决定了对策之后，再找反对的意见攻一攻，使认识更正确。而最要紧的，是在实践过程中反复认识。凡是正确的，就坚持和发展，如果发现缺点就加以弥补，发现错误就立即改正。总之，判断，行动，再认识，修正之，这样就可以不犯大的错误。

从我的经验看，如果上面说的三条要求都达到了，就能够比较全面地认识客观事物，避免某些片面性，作出比较正确的决策，比较好地做到实事求是。在这个问题上，应当是不充好汉，不爱面子。如果不从认识自己错误上求进步，装洋蒜，一定要跌筋斗。愈怕丢脸，一定会丢脸。不怕丢脸，反倒可能不丢脸。要论事不论脸。做到了这一条，自然不会一听到反对意见，就毫不思索地跳起来。

我们要求犯错误的人论事不论脸，同时要把客观事实拿给他看。大家都根据客观事实想问题，定政策，自然可以求得党内一致。

论事不论脸，这里有个立场问题，有了坚定的立场，才能掌握这个方法。如果尽是为个人打算，一辈子也掌握不了这个方法。个人主义与马列主义的矛盾就在这里。真要做到实事求是，必须有无产阶级的立场。大家如果都能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方法就容易一致，对问题的看法就容易一致，事情就好办了。党内只应当有这种态度，这就是共产党员的态度。在两个人谈话中可以承认错误，在小组会上可以承认错误，在大一点的会上可以承认错误，在千万人面前也可以承认错误，这叫论事不论入，论事不论脸。这样，扯皮就少了，事情也就好办了。

注 释

[1]赵公武，当时任国民党军安东警备司令。

[2]陈林达，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九五师师长。

[3]猫耳山是吉林省临江附近的一座山。当时中共中央辽东分局设在临江。

[4]财经办事处指西北财经办事处，一九四二年六月成立，主任贺龙。陈云于一九四四年三月任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日常工作。该办事处隶属于中共中央西北局，统管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的财经工作。

[5]指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6]史迪威（一八八三——一九四六），美国职业军人，曾任美国驻华武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任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及中国战区参谋长。因与蒋介石发生矛盾，一九四四年被美国政府召回。

健全党内生活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目前辽东党内存在着组织生活不健全的状态。这在上面有，下面也有。有的是受人影响，有的是本来就有的。

辽东党内，干部来自五湖四海，有先来的，有后到的。形势复杂，又战又和。这就容易发生无原则的纠纷，必须以严肃的原则性去对付之。

我提出下面三条意见。

（一）正面地坦率地辨明是非。

正面地坦率地辨明是非，这是应有的原则态度，不是得罪人。否则，就会助长混乱，不能解决问题。

被责备者不要一触即跳。“大广播”比“小广播”好，正面讲比背后讲好。是否是事实，一见面就清楚了。

（二）党内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

民主不仅一般需要，在目前情况下有特殊需要。不经大家交换意见，是不可能集中的，形式上集中了也难免出错误。

不民主，只集中，必然愈不能集中；多交换意见，反而容易集中。

核心领导只有经过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并在实践中经过考验，才能建立起来。

民主又必须集中。个人意见不被采纳，不能生气，也不能不尊重集中的决定。

（三）每个党员都有在党内发表意见、讨论问题的权利，但又必须有服从决定、积极工作的义务。

遇到不如意的事和人，就不干工作，或在言论行动上消极，这是不对的。遵守纪律的重要，恰恰是在自己意见不被通过的时候，或者是有关自己的问题的时候。

在我们党内，个别党员的利益必须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四个服从”是一个也不能少的。这是我们党的铁的纪律，也是健全党内生活、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有力武器。

干部子弟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子弟自居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六月十日信此刻收到。

十八年不见你，看你的来信，文字已写得很清通了，我很高兴。从个人方面说，我与你父亲[1]都顾不上子弟的入学和生活，没有尽到父兄的责任。但是这点我们当年都计算了的，如果只顾一个人的家庭子弟，就无法努力于改造整个社会，我们就这样决定了弃家奔走。现在解放全国的目标不久就会实现了，但这还仅仅是改造社会的第一步，全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仍旧低。我们的目的不仅要打倒反动势力，而且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所以困难的长期的工作还在后面，这后一段的工作是要与全国人民大家一齐干的。

你祖父和祖母是最使我感动不忘的。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之后，我与你父亲和吴志喜[2]同志（当年冬被残杀了）在小蒸进行农民运动时就住在吃在你们家里。失败[3]后，你们全家逃到上海，仍旧是你祖父行医来维持这么多人的生活，我们仍吃在你们家里。你祖父是很有气节的，他深信革命会胜利；处在困难之中毫无怨言和后悔，真正难得。

此外，我以父兄的责任，还要叮嘱你一件事，而且你可以把这一段信上所说的抄给霓云[4]要他也注意，就是你和霓云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的子弟自居，切不要在家乡人面前有什么架子或者有越轨违法行动，这是决不允许的，你们必须记得共产党人在国家法律面前是与老百姓平等的。而且是守法的模范。革命党人的行动仅仅是为人民服务，决不想有任何酬报，谁要想有酬报，谁就没有当共产党员的资格，我与你父亲既不是功臣，你们更不是功臣子弟。这一点你们要切记切记，要记得真正革命功臣是全国老百姓，只有他们反对反动派，拥护解放军，解放军才能顺利地解放全中国。你们必须安分守己，束身自爱，丝毫不得有违法行为。我第一次与你通信，就写了这一篇，似乎不客气，但我深觉我有责任告诫你们。

我大概会到南方来一次的，但行期未定。那时你父亲能否从工作中抽身则我不能预计，我可以约他一下，如有可能当同他南来。

你与霓云商量一下，如果章练塘[5]或小蒸尚无电报局，不能与北平通电报，则你们在松江找一个转电报的通讯处告我，以便有急事时打电报，信件来往要两星期（这次你六月十日信，六月十六日投到，费时七八天）。

请你代我向你祖母请安，并问候你母亲，祝你好！

注 释

[1]陆恺悌的父亲陆铨（一九〇六——一九七九），上海青浦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一月参加青浦县小蒸农民暴动。一九四九年时任石家庄市总工会主席。

[2]吴志喜（一九一一——一九二八），上海青浦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第五期学生，曾任中共青浦县委委员。一九二八年一月参加领导青浦县小蒸农民暴动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信中所说的“当年冬被残杀”的时间，系指农历。

[3]指一九二八年一月江苏省青浦县（今属上海市）小蒸地区的农民暴动失败。

[4]霓云，即廖霓云，陈云的表弟。

[5]章练塘，即今上海市青浦区练塘镇。

高级领导人要提高革命觉悟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日)

保障党的团结，防止党的分裂，其责任主要是在高级领导人员。我党是经过几次分裂的。张国焘等人都搞过分裂活动，使革命事业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是，我们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取得了胜利。现在四中全会重新提出一个决议草案，号召增强党的团结，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张国焘这样的野心人物是可能出现的。妨碍党的团结，不幸发生党的分裂这样一种危险，如果我们不严格地防止它，那并不是不可能的。当然，讲起这样的事情是不愉快的，但是我们要面对现实。过去有许多同志设想，像张国焘这类野心人物，可能不再在我们党内出现。理由是什么呢？有这样几条：第一条，党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革命已经胜利，干部都经过锻炼，都希望我们党内不出张国焘这类野心人物。第二条，只要加强党内马列主义教育，就可以不出张国焘这类人物。第三条，说我们有毛主席在，大概可以不出，把希望寄托在“毛主席万岁”上。

现在看来，这三条都有很大的作用，但是只有这三条，我看还不足以保证我们党内不再出张国焘这类的人物。我们党是处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头，现在阶级没有消灭，就是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意识还要长期存在。这种社会情况、阶级意识还会反映到党内来。我们党内的情况是，在不少的高级干部中间，个人主义的成分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的，只要气候适宜，只要条件具备，小个人主义可以变为大个人主义。原来想，革命已经胜利，似乎可以不出张国焘之类人物了。现在看来，恰恰相反，革命胜利了的国家，更容易出。现在比起秘密工作和在山沟里打游击的时代，更容易出野心人物。大家是为革命来的，还是为做官来的呢？回答这个问题也容易。起初是干革命来的，以后是革命加做官，即革命，又做官。后来官越做越大，味道也越来越大，（笑声）有人就只想做官，不想革命了，把革命忘光了。在胜利了的国家里头，有电影，有照片，开会时热烈鼓掌，阅兵时可威风啦。火车站欢迎的时候，送鲜花，夹道欢呼。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以腐化。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我们对于执政以后党内的状况是不能盲目乐观的。所以，希望我们党内不出野心人物，这种好心肠，我看是会落空的。把希望寄托在这一点上，是很危险的。

这次会上，被批评的同志可以有两种态度：一是改正，一是不改。现在他们开始检讨自己，哪怕检讨不彻底，我们也是应该欢迎的。瞿秋白同志讲过，水牛转弯不大容易。这是常有的，我希望他们能彻底改正。但是我现在要说，就是这些同志改正了，以后是不是还会出？过去出张国焘，以后是不是还有李国焘、王国焘呢？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绝不能说没有。说没有，就要犯错误。宁可说，可能出现。至于乱子是否闹得像张国焘那样大，可以分裂党、分裂军队，那要由条件来决定。出是可能的，但是乱子闹得大不大，要看当时的具体条件。我们不要高枕无忧，认为党内不会出怪事。

“加强党内马列主义教育，这是很好的，但我看只靠教育也不能保证党内不出李国焘、王国焘。马列主义的教育，当然有很大的作用，我们是相信这个主义才来干革命的，我们必须加强党内的马列主义教育，这是肯定的、无疑问的。但是，我看不能因为有马列主义教育，以后就不出问题了。张国

煮不是老党员吗？他比一般干部受的马列主义教育还少吗？但是他叛变了。这证明什么呢？证明只靠马列主义的教育，还不能保证我们党内不出野心人物。

至于说有毛主席在，我们党内就可以不出野心人物，我看也是靠不住的。毛主席当然是伟大的领袖，是我们党团结的核心，但是，这是否可以保证我们党内不出李国杰、王国焘呢？也靠不住。我看，只能出得少一些，出得慢一些。有些露了头以后，因为毛主席在，容易解决，解决得快一些，但不能保证不出。“毛主席万岁”这是一个政治口号，但是毛主席在生理上是不能万岁的。我在这里，在四中全会上，说毛主席生命不能万岁，这似乎不太好，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毛主席实际上是不能万岁的。

那末，我们翻来覆去地想一想，可靠的是什么呢？我们党内可能出现分裂的危险，就没有什么办法防止了吗？我看可靠的、永久的办法，可传到我们子孙后代的，就是提高高级领导人的革命觉悟和革命嗅觉。我们这些高级领导人，行年有四十几岁的，有五十几岁的，有六十几岁的，也有七十几岁的，将来一批一批地都要死去，同时一批一批地补上来。我们不能保证不出野心人物，但是我们可以想办法使乱子不闹大。出了野心人物的时候，乱子闹得大不大，关键是什么呢？我看关键是在几百个高级领导人，就是省（市）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及军队中的负责干部。如果这几百个人有高度的革命觉悟，有高度的革命嗅觉，那末，出了李国焘、王国焘也容易把他揭露。如果这几百个人觉悟不高，嗅觉不灵，出了野心人物的时候是可能闹不团结的，甚至可能闹到党的分裂。出大乱子出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这几百个人里面，首先是在座诸公，穿黄衣服的，穿黑衣服的，党头、政头、军头这几百个人。如果出了野心人物，能否迅速地把他们揭露，不闹成大乱子呢？那也决定于这几百个人。只要这几百个人头脑十分清醒，革命胜利就会有保证。

高级干部要提高革命警惕，提高革命嗅觉，千万不要“伤风”。我看这是我们党的团结的可靠保证。再加上一条，我们要严守党的制度和党规党法，发扬党的优良作风，那党就有保证了。靠别的，我看都靠不住，要靠我们自己。

在胜利的环境中高级干部不要头脑发昏。我们想一想，一九四五年七大到现在，跌了大筋斗的几个主要的领导同志，哪一个同志不是因为骄傲，背上背了一个大包袱，上面写着两个字，叫做“正确”，背了“正确”的包袱，就会跌筋斗。这一件事很值得我们注意。我并不是说犯错误好，而是说没有犯过错误的同志，很顺利的同志，应该十分警惕。同时犯过错误的同志，如果一个时期正确了，不小心，骄傲了，同样可以再跌筋斗。同志们，人家对你鼓掌的时候，那可要很小心。一个人在人家鼓掌时，他可以有两种态度，一是小心谨慎，一是昏头昏脑。昏头昏脑就很可能是跌筋斗的候补者。

要把思想方法搞对头

(一九五七年一月九日)

商业部门的领导同志，一天到晚忙于非常具体的经济工作，对思想政治工作注意不够，这样就很容易产生事务主义。如果不注意扭转，就会变得目光短浅。这件事，值得我们警惕。

在我们的工作中，建议提出“七分经济，三分政治”的口号。否则，工作的盲目性无法改变。我们如果不重视这个问题，就是带有原则性的领导方法的错误。那末，倒过来“三分经济，七分政治”，行不行？这也是不行的。我进了北京城以后，从中财委[1]领导上来说，没有注意这个问题。现在如果再不提出“七分经济，三分政治”，则业务总是挤了政治。只要我们按照“七分经济，三分政治”长期做下去，有可能保证工作不犯大错误。否则，十分有九分会变成“斗争对象”。看来，这个问题要“奋斗”，要“突围”。

在这方面，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在部长、副部长。部长、副部长要领导学习。国务院第五办公室[2]和商业部先搞起来，下边也就跟着搞起来了。要把学习作为指导工作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作为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这要成为一个章程。领导干部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没有尽到领导责任。

我看学习的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总结经验。把总结经验列入学习的一项，不用说是很重要的。二是重大的时事和政治问题的学习。三是学习若干重要的理论问题。学习理论，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因此，首先要学哲学，学习正确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就总是要犯错误。你们都是有经验的，问题在思想方法。因为思想方法不对头，所以经验提不高。这一点，对于任何工作岗位的同志，对于解决任何问题，都是最重要的。此外，还要解决依靠群众的问题。疑难不决的事情，要请教群众，没有这一条，不能算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在工作中，不仅要依靠组织，更主要的是要依靠群众；这应该成为我们的一个口号。

我们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也就是毛主席说的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从实际出发的关键是，从片面的实际出发，还是从全面的实际出发？有些同志不花时间去弄清楚全面情况，弄清楚事物的本质，而是看到一些现象，就想当然，发议论，作结论，这是十分有害的。所以，重要的是要把实际看完全，把情况弄清楚，其次是决定政策，解决问题。难者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只要弄清了情况，不难决定政策。我们应该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来决定政策。这样决定的政策，才有基础。比如，要解决猪肉供应紧张和猪的增产问题，若不管饲料、猪仔的来源，不管价格高低，不管群众愿意不愿意饲养，而是临时乱抓办法，那就永远也做不好这一工作。

一个人看问题总是有局限性的。集体讨论、大家交换意见，是达到全面认识的重要方法。肯用脑筋想问题、发议论的同志，是很好的同志。不想问题，不发议论，天天搞五福布的，就要差一点。在交换意见时，对于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决不要生气。他们的意见，对的或者错的，都有益处。正确的东西，是在否定错误的东西中生长起来的。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得出持久战的结论。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批驳一切经过团结和一切经过斗争，得出既团结又斗争的结论。毛主席如果没有王明、张国焘

这些反面教员，未必能那样的成熟。对于各种意见要进行比较。所有正确的分析，都是经过比较的。这是“试金石”的方法。通过比较，可以弄清楚事物的本质。毛主席为了说明新民主主义，就把它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作比较，加以区别，这样就不含混了。人们认识事物，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需要有一个反复的过程。这里重要的，是找“反对派”；如果没有“反对派”，也要假定一个“反对派”。毛主席自己就假定过许多反对的意见，别人不推翻，自己来推翻，推翻了再来。上述这些，都是全面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

注 释

[1]一九四九年七月，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简称中财部）与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下，设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在此基础上，于同年十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仍简称中财委），统一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一九五四年九月撤销。

[2]国务院第丑办公室即国务院财贸办公室。该办公室协助国务院总理负责掌管财政部、粮食部、商业部、对外贸易部、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并负责指导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工作。

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

(一九六二年二月八日)

在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陕西省参加会议的同志开了大会和小会，都是开得好的。好就好在上下通了气。一方面地委和县委的同志对中央和省委提了意见，另一方面省委负责同志作了两次自我批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上下通气的必要条件；只有通气，才能团结；只有民主，才能集中。

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人说话有时免不了说错，一点错话不说那是不可能的。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有些“聪明人”，见面就是“今天天气哈哈”，看到了缺点、错误也不提。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不能成功，肯定是要失败的。

这次大会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不要估计低了。只要有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条，坚持真理，改正错误，我们共产党就将无敌于天下。

光靠少数领导干部发现我们工作中的问题、缺点和错误，那是很不够的。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发动广大群众和干部对我们的工作提意见。只有根据大家的意见，切实改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才能把人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真正把工作做好。

领导干部听话要特别注意听反面的话。相同的意见谁也不敢讲，容易听得到；不同的意见。常常由于领导人不虚心，人家不敢讲，不容易听到，所以，我们一定要虚心，多听不同的意见。还应该看到，事物是很复杂的，要想得到比较全面的正确的了解，那就必须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经过周密的分析，把它集中起来。调查研究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找有各种不同看法的人交换意见，也是一种方法，而且是一种重要的方法。总之，我们共产党员要加强修养，养成耐心听取不同意见的良好习惯。

采取什么方法，才能使我们的认识比较正确呢？我提出以下几个方法，看行不行，同志们可以试一试。

交换。看问题往往容易产生片面性。比如这个茶杯放在桌子上，对面的人看见茶杯是有花没有把的。可是这面的人看见茶杯是有把没有花的，两人各看到一面，都是片面的，都不全面。如果两人把各人看到的一面“交换”一下，那就全面了。我们常讲实事求是。实事，就是要弄清楚实际情况；求是，就是要求根据研究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政策，譬如打仗，敌情判断错了，作战就要失败。又如医生看病，把病情诊断错了，就治不好病，甚至把人治死。用什么办法来弄清情况呢？办法之一，就是多和别人交换意见。这样做，本来是片面的看法，就可以逐渐全面起来；本来不太清楚的事物，就可以逐渐明白起来；本来意见有分歧的问题，就可以逐渐一致起来。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怎么办？我看可以作点假设，从反面和各个侧面来考虑问题，并且研究各种条件和可能性，这就可以使我们的认识更全面些。我们犯错误，就是因为不根据客观事实办事。但犯错误的人，并不都是没有一点事实根据的，而是把片面当成了全面。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

比较。研究问题，制定政策，决定计划，要把各种方案拿来比较。在比较的时候，不但要和现行的作比较，和过去的作比较，还要和国外的作比较。

这样进行多方面的比较，可以把情况弄得更清楚，判断得更准确。多比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反复。作了比较以后，不要马上决定问题，还要进行反复考虑。对于有些问题的决定，当时看来是正确的，但是过了一个时期就可能发现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因此，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最好过一个时候再看看，然后再作出决定。我和毛主席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发现他对于有些问题也不是一下就决定的。你和他谈问题，他当时嗯一声，但并不一定就是表示同意你的意见。

在你们的会议上，省委作了两次检讨。检讨得够不够呢？我不在陕西工作，情况不大了解，够不够要由你们来判断。但是，我看应该对省委的自我批评采取欢迎的态度，因为作了自我批评总比不作好。大家可以对省委提意见，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但是应该允许省委有从容的时间来考虑，有些问题可以从长计议。因为这次提出的问题，有很多是原来未预料到的，再加上时间短，还来不及深入研究。此外，省委的领导干部在这里只有一半，有很多问题还不能讨论决定。

有人说，现在在北京，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回去以后恐怕就不行了。我看不会吧。为什么？大势所趋嘛！从这次大会开始。今后批评的门是大开着的，并且应该越开越大。少奇同志报告中所讲的要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不是什么新问题。发扬民主，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都是我们党的老传统，只是这几年把这个传统丢了，现在要把它恢复起来。同志们！如果共产党不能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家见面都是哈哈，我看人们就不会参加革命了，也不会愿意当这样的共产党员了。当然，我也不能保证所有的领导人都能虚心接受批评，不过少数人想挡终究是挡不住的。有的同

志说，我还要看一看。应该允许人家看一看。由于这几年我们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有些人对是否能真正发扬民主表示怀疑，这是不奇怪的。

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责任由谁负？中央、省委各有各的帐，但是有许多事情，责任首先在中央。省委也有自己的帐，再往下，地委有地委的帐，县委有县委的帐。大家都要吸取经验教训，把今后的工作做好。

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

(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
本思想路线问题。我们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
持实事求是。如果我们离开了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那末，我们就离开了马
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成为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者，我们的革命工
作就要陷于失败。所以，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
马克思列宁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

我们知道，毛泽东同志在开始从事革命活动的时候，就十分重视应用马
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的。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时期，他在湖南农村作了深入的调查之后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就是一个光辉的典范。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
和中央革命根据地，为了创建红军，创造适合于红军战争的战略战术，解决
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政策和其他各项政策问题，对于深入调查研究、发扬
实事求是的作风，尤其特别注重。毛泽东同志为红四军党代表大会写的决议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专门写了批判主观主义一节，强调要“教
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
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要“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
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
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随后，毛泽东同志所写的《反对本本主
义》一文，一开头就痛切地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真理：

“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
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么？

要不得！

要不得！

注重调查！

反对瞎说！”

在粉碎了“四人帮”以后的今天，再读一遍这段话，更加觉得它声如洪
钟，使每个共产党员为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
精神振奋，勇气百倍。

我是直到一九三三年初才到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所以对于红军初建时期
的许多艰难困苦，并没有直接的了解。但是从许多参加过这段时期工作的同
志们的谈话中知道，当时的每一项正确的政策，哪一条不是毛泽东同志在亲
身实践中反复调查研究、费尽心血的创造啊！拿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
意”来说，在最早的条文中，有上门板、捆铺草、洗澡避女人等内容。这些
看来是小事，不是亲自经验，怎么能知道它们的关系多么重大！一支新型的
工农军队，不从这些每天要遇到的实际问题解决起，怎么能够建立起来？怎
么能够把传了几千年的旧军队的作风改变过来，建立起真正的军民鱼水关
系？不解决官长不打骂士兵、不搜俘虏腰包这样的具体问题，怎么能够建立
新型的官兵关系，怎么能够使被俘的敌军愿意加入红军？如果不是毛泽东同
志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怎么会制订和执行这些原则，又怎么会有这样
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军队建设如此，其他如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党的建

设的原则，土地革命政策，发展工商业政策，发展文化教育政策，也无一不是毛泽东同志辛勤地调查研究、总结群众实际斗争经验的结晶。我们从保存下来的《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可以看到，为了制订正确的土地革命政策，毛泽东同志对当时革命根据地各个阶级在土地斗争前前后后的各种情况的了解，是多么详尽和周密；他对各阶层农民在土地革命后政治、经济利益的变化，又是多么关注。这种密切联系群众、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同那种凭想当然办事的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真是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

党的路线、政策和工作方法、工作作风的正确，使得党和红军在千辛万苦之中很快受到人民群众的坚决拥护，使处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中的一小块红色政权，不但能够坚持下来，而且能够不断地发展、扩大。我们知道，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许多地方保留下来的党员积极分子，都曾响应党中央“八七”会议[1]的号召，英勇地发动武装暴动，但是，不少都失败了；有的建立了游击区，也没有能够长期坚持下来。在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正是毛泽东同志开创的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使党找到了一条最完整的胜利发展的道路，使其他各重要革命根据地从黑暗中看到了光明，从挫折中看到了胜利的榜样。

但是，在王明等教条主义分子排挤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之后，他们从军事、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代了毛泽东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就使原来胜利发展的革命形势遭到了全面的破坏，使革命事业受到严重的损失。最后是根据地的革命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几乎损失百分之百。中国革命又一次几乎陷于失败的境地，这是党的历史上一次极为深刻的教训。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于中国革命所造成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说，最主要的是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基本原则，破坏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毛泽东同志常用三句话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说，他们不知道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用脚走的，子弹是可以打死人的。他们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就是达到了这样荒谬的地步。就是这样一伙毫无实际经验的人，却居然拿着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片言只语去到处装腔作势，指挥一切，“斗争”一切，结果是这些钦差大臣飞到哪里，哪里的革命事业就遭到严重摧残，他们使党和人民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

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撤换了“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领导职务，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党中央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各个抗日根据地纷纷建立，八路军、新四军威震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一九四二年，为了总结党的二十年斗争的经验，为革命的新发展作好思想准备，我们党利用抗日战争的间隙，集中一大批党员干部，在延安开展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其他地区高级领导机关所在地，也在中央统一领导下进行了这样的整风运动。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这是一次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

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2]中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重要报告。在此前后，中央还出版了毛泽东同志的《农村调查》一书，发布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等文件。为了便于党的干部总结历史教训，分清路线是非，毛泽东同志主持编印了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大以来历次路线斗争中正反两方面的文件，作为整风学习的资料。毛泽东同志在整风报告中透彻地分析了主观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对我们党和革命事业的严重危害，反复告诫我们全党要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去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同志多次向我们宣传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中的这段名言：“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决不是说要熟读它的一切公式和结论，抱住这些公式和结论的每一字句不放。要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首先必须学会把它的字句和实质区别开来。”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只有首先做到了这一点，才叫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门，才能建立理论和实际相统一即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否则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条文当教条，而教条是狗屎也不如的。毛泽东同志给中央党校的题词是：实事求是；后来又给《七大纪念册》题词：实事求是，力戒空谈。他说：“‘实事求是’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外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在《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指出：“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

在整风运动中，党特别着重检查和批判了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大危害的王明的教条主义。毛泽东同志在整风报告中批判这些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讲话中尖锐地指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

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讲过两个主观主义的小故事，至今还使我们记忆犹新。一个是，在遵义会议时期，一个同志硬说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战略都是从孙子兵法学来的，现在用不上了。毛泽东同志问他：你读过孙子兵法没有？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问得这个同志哑口无言，因为他本来就连孙子兵法这部书也没有见过。另一个是，一位同志刚到陕北洛川，第二天就下了命令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毛泽东同志问他：一切苛捐杂税你都取消了，究竟有哪几种苛捐，哪几种杂税？这个同志完全答复不上来。毛泽东同志通过这类生动的谈话，使很多干部懂得了究竟什么是唯物主义，什么是唯心主义，调查研究有什么重要的意义，为什么一切工作不能靠装腔作势，不能闭目塞听，而必须从实际出发，首先从了解情况着手。

在整风运动中，全党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遵循毛泽东同志的教导，认真学习了若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著，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回忆对比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大家看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关于革命的理论和方法是怎么说的，我们在过去的实际斗争中又是怎么做的，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方法是怎样领导我们取得胜利的，主观主义特别

是教条主义又是怎样使已经得到很大成功的革命重新归于失败的，而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又是怎样在千难万险之中使革命转危为安，使战争转败为胜的。这样，我们就真正做到了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既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又重视了对于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真正懂得了用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而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来解决实际问题。

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整风运动也对它作了深刻的批判。毛泽东同志要求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做老实人，都应该以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以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顾全大局，团结一致，反对把资产阶级闹名誉地位、搞派别、搞山头的那套思想作风搬到共产党里来。对于犯错误的同志，毛泽东同志提出“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方针，而严厉地批判了“左”倾路线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作法。这些方针原则的提出，对于全党的团结起了巨大的作用，使来自五湖四海经历了多年复杂的党内斗争的广大党员、干部，找到了克服内部矛盾、团结前进的正确方向。

通过这次整风运动，通过在这次整风运动基础上召集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同志从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在我们全党大大地发展了，普及了，我们党在新的基础上的团结加强了。我们为有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领袖，为有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这样好的学风，感到无比高兴。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威望大大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觉悟大大提高了，全党对于中国革命胜利的信心也大大加强了。

正因为这样，尽管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初期，我们党曾遇到过严重的困难，全党同志却始终团结一致，充满信心，在革命的各条战线上领导群众冲锋陷阵，勇往直前，使中国革命的局面很快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过三四年时间，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的新中国就建立起来了。当时革命发展的那种排山倒海、摧枯拉朽、迅猛异常的形势真是大大超过了预料。今天回顾起来，从革命的主观条件来说，全党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掌握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这个优良的作风，的确起了决定的作用。

注 释

[1]八七会议指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时党的最主要的任务。但是，这次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不认识应当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组织恰当的反攻和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并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因而为后来的“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

[2]见第 156 页注[2]。

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一致主张，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我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

华主席[1]说，对于那些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问题，应由有关机关进行细致的工作，妥善解决。我认为这是很对的。但是，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对此，中央应该给以考虑和决定。例如：

一、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2]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二、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3]这个文件，是我在延安任中央组织部长（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以前作出的，与处理薄一波同志等问题的精神是一致的。我当时还不知道有这个文件，后来根据审查干部中遇到的问题，在一九四一年也写过一个关于从反省院出来履行过出狱手续，但继续干革命的那些同志，经过审查可给以恢复党籍的决定[4]。这个决定与“七七决定”精神是一致的，这个决定也是中央批准的。我认为，中央应该承认“七七决定”和一九四一年的决定是党的决定。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给以复查，如果并未发现有新的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此外，据我所知，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敌我边际地带者一个所谓“两面政权”问题。当时党组织决定一些党员在敌伪政权中任职，掩护我党我军的工作。这些党员，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大多被定为叛徒。这是一个涉及到数量更大的党员的政治生命问题，也应该由党组织复查，对并无背叛行为的同志应该恢复党籍。

总之，“七七决定”、一九四一年决定中所涉及的同志和在“两面政权”中做了革命工作的同志，对他们作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这对党内党外都有极大的影响。不解决这些同志的问题，是很不得人心的。这些同志都已是六七十岁的入了，现在应该解决他们的问题。

三、陶铸同志、王鹤寿同志等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直到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要出来的一批党员，他们在出狱前还坚持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然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一个“尾巴”，例如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些同志有许多是省级、部级的干部。陶铸一案的材料都在中央专案组一办。中央专案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成立的，他们做了许多调查工作，但处理中也有缺点错误。我认为，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移交给中央组织部，由中央组织部复查，把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中去考察，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像现在这样，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应该结束。

四、彭德怀同志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我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既然没有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五、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还出了话剧《于

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六、“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康生同志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

我提出以上六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注 释

[1] 即华国锋。一九六六年四月，他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十月，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一九八〇年九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定，接受他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的请求。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鉴于他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所犯的“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一致同意他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

[2] 反省院是国民党政府迫害和诱降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群众和爱国民主人士的一个反动机构。

[3]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的第三条规定：“凡在狱中表示坚定坐满刑期，送到反省院的同志，照例要办自首手续，或填一般反共自愿书，才能出狱。如他们曾经组织允许填写这类文件后出狱的，得恢复其组织。如具有上述情形，但未经组织允许者，经过工作中考察后，亦得恢复其组织”。

[4] 指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过去履行出狱手续者（填写悔过书声明脱党反共）暂行处理办法》。这个暂行处理办法的第二条规定：“共产党员在被捕后，毫无叛党行为，仅仅在刑期满后或交保释放时由自己或家属填写过‘悔过’‘自新’一类文件作为出狱手续，而在出狱后仍然坚决革命，并未改变其革命本质，并未对革命发生动摇者，虽在当时中央并无允许履行这类手续之决定，应视为实质上并未叛变。因此出狱后经地委以上审查和认可之后，已恢复党籍者仍然不变，未恢复或恢复后又被开除者，则在本人要求恢复时可恢复其党籍。但在党表上应登记此种出狱情况，以区别于过去拒绝履行出狱手续坚持无条件出狱者”。

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七九年一月四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现在开会。这一次三中全会和在这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很成功。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认真讨论了党内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增强了团结。会议真正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全会决定，一定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而且永远这样做，这是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对于党的工作着重点从今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对于党内安定团结，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延安整风^[1]时期，毛泽东同志首先集中了几十个高级干部开了几个月的整风会议，大家面对面地指名道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认真总结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以后就在所有干部中进行整风运动；在这个基础上写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党的六届扩大的七中全会上通过了这个决议。以后就开党的七大，全党同志团结一致，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又要求全党实现这种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但是，由于种种干扰、种种原因，我们党很多年没有实现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党的九大、十大也把这个要求写进了党章，但那只是白纸黑字，完全没有实现。这一次党中央带了一个好头，只要大家坚持下去，就有可能在全国实现。这件事是我们全党最大的事情，只有这样做，安定团结、四个现代化才能实现。如果鸦雀无声，一点意见也没有，事情就不妙。

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我们这次会议就是要为实现这个基本任务做必要的准备工作。实现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要求，已经写入十一大通过的党章和我国的宪法，我们做好这件事，对我们这样一个在九亿人口国家中的执政党，是一种重大的工作，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一种重大的责任。

这十一二年来，我常想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马克思主义从形成、发展到现在，已经一百三十六年了。从一八四二年马克思由黑格尔左派转变成成为共产主义者算起，到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前，在这七十五年中，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没有像十月革命在苏联那样取得全国的胜利。但马克思给我们留下很多遗产，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贡献很大。恩格斯把马克思的贡献概括为两条：一是发现唯物史观，一是发现剩余价值。唯物史观揭示了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剩余价值论揭示了资本家是怎样发财的，工人是怎样受剥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前途怎么样，这两条是高度的概括。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一起战斗的，而且许多著作是合写的，如《共产党宣言》等。由恩格斯讲马克思的贡献，讲得最清楚。

苏联十月革命到现在六十二年了。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三年，在这七年中，党内生活是非常正常的。我举两个例子。一是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2]。列宁坚持签订，但起初在中央委员会讨论表决时，列宁是少数，托洛

茨基[3]是坚决反对的。列宁的意见是正确的，但还是少数服从多数。只是当局势起了变化，德国已经打进来了，并且攻占了一些地区和城市，这时列宁说，如果再不签订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委员会中有两票转到列宁方面，列宁才形成多数，决定签订和约。二是讨论工会在苏维埃国家起什么作用的问题，列宁在讲话中讲到“我们的国家实际上不是工人国家，而是工农国家”[4]时，布哈林[5]在后面喊：“什么国家？工农国家？”可以看出，当时在列宁领导下，民主气氛是很浓的。斯大林担任了三十年领导，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第一，他进一步论证了列宁提出的在帝国主义时代，一个国家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第二，在苏联建设了社会主义。第三，他领导苏联人民，打胜了卫国战争，保卫了苏维埃国家，取得了粉碎希特勒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斯大林是有很大功绩的，但是也有缺点，有错误，后来党内生活不正常。毛泽东同志说他是三七开，所以他的像还挂在天安门广场。

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到现在已经快五十八年了。中国共产党是胜利了的执政党，是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党取得了伟大胜利。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概括得很清楚。他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我们党很可能还在黑暗中苦斗。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恢复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造，都很成功。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有缺点和错误。为什么？因为没有自己的经验，光有别人的经验不行。要求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是不可能的，是空想。这不符合辩证唯物论，也不符合毛泽东同志本人的意见。应该说，解放以后，也有帮倒忙的人。他们是什么人呢？绝大多数是好同志，但有盲目性，缺少经验。大家都没有经验，帮倒忙最重要的原因是不谨慎。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办事应该兢兢业业，但是过去有不少同志不谨慎哪！

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是很大的。那时候开会就是翻语录本，“万寿无疆”还要、喊三次，什么早请示晚汇报，打电话先要念语录。这些东西都是周恩来同志制止住的。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他保了很多同志下来，我们这些人都是他保的嘛！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正像叶剑英同志在一九七七年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我们党出现了很不正常的情况。到了一九七五年冬，来了个联络员，一个娃娃[6]，毛主席的意见由他传达，政治局开会由他向毛主席汇报，叶剑英同志对我讲过，那时像他那样的党中央副主席也见不到毛主席。去年十二月十日我曾问过华国锋同志，你那时能不能见到毛主席？他说，见不到，只能在接见外宾时讲几句话。连中央副主席都见不到毛主席，这是党内极不正常的状态。粉碎“四人帮”以后，尤其是最近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恢复了党的优良传统，出现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看来我们党大有希望。我们放开眼界看看全世界，各种观点的共产党都在我们面前。为什么说我们党大有希望？我们的国家是九亿人口的大国，我们的党是这样一个大国的执政党。我们党处于全世界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中流砥柱。只要我们党起到了这样的作用，那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就有了保证。所以，我认为，我们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负有很大的责任。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其他场合的讲话中，反复讲了我们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责任。在党中央领导下，一定能够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很好地负起这个责任。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把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的基本任务认真地担负

起来，也就是在这个伟大事业中尽了自己应尽的一份力量。

注 释

[1]见第 156 页注[2]。

[2]布列斯特和约指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苏维埃俄国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在俄国西部布列斯特签订的和约。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进行，苏俄同德、奥等国还处于交战状态。按照这个和约，苏俄丧失了约一百万平方公里领土，并付出了巨额赔款。这是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为了退出帝国主义战争，集中力量巩固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而采取的一种革命妥协。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三日，随着德国被战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废除这个和约。

[3]托洛茨基（一八七九——一九四〇），十月革命时，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一九二六年十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一九二七年一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撤销他的执行委员的职务。同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一九二九年一月被驱逐出苏联。一九四〇年八月在墨西哥遭暗杀。

[4]见列宁《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407 页）。

[5]布哈林（一八八八——一九三八），一九〇六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真理报》主编、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等职。一九二九年七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撤销他的执行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的职务。同年十一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一九三六年被开除出党，次年三月被处死。

[6]指毛远新。他当时充当毛泽东同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

执政党的竞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一九八四年十月）

第一，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第二，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会有困难，但是经过统一认识，是可以解决的。第三，必须实事求是，查清事实，核实材料，再处理问题，并和本人见面。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在中井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的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期间发表的意见）

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

（一九八二年一月五日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编印的一份反映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的信访简报上的批语）

目前在我们的党风中，以至在整个社会风气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是非不分。有些同志在是非面前不敢坚持原则，和稀泥，做老好人，而坚持原则的人受孤立。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也有，但现在比那时要严重得多。过去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过分强调斗争哲学，不该斗的也斗，动不动就上纲到路线是非。现在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怕矛盾，怕斗争，怕得罪人。对于这个问题，如果只从维护党纪提出来，我认为还不够，应该把它提到全党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高度。要提倡坚持原则，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精神。只有我们党内首先形成是非分明的风气，党的团结才有基础，党才有战斗力，整个社会风气才会跟着好转，才会使正气上升，邪气下降。

关于民主制度、民主生活很不够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个问题实际上应该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对胡乔木同志起草的一份文件的意见的节录）

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内有了民主集中制的气氛，才会有同志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原来是吃过苦的，搞一言堂。我过去说过，不怕人家讲错话，就怕人家不说话，讲错话不要紧，要是开起会来，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有同志提不同意见，党组织应该允许，这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好现象。当然，有了不同意见，要在党内说，在你的那个党支部，或者在你的机关，按照组织程序和组织原则严肃地提出来。提第一次，我们欢迎；提第二次，我们也欢迎；提第三次，我们还是欢迎。这样，我们这个党就会立于不败之地，就会兴旺发达，大有希望。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的节录）

五

纪检工作应该研究新情况，适应新情况，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共产党不论在地下工作时期或执政时期，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的纪律。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六日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会提出的《加强纪律检查工作，保证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报告上的批语）

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几点意见

(一九八一年三月)

关于建国以来三十二年中党的工作的错误，一走要写得很准确，论断要合乎实际，要把它“敲定”下来。“敲定”是上海话，敲是推敲的意思，定是确定的意思，就是说，反复推敲，反复斟酌，使它能够站得住，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小平同志提出《决议》宜粗不宜细，我是同意的。要在这个原则下面，是成绩就写成绩，是错误就写错误；是大错误就写大错误，是小错误就写小错误。要分别不同情况，把它“敲定”下来。

这是陈云同志同邓力群同志四次谈话的要点。

《决议》要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要达到这个目的，使大家通过阅读《决议》很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就需要写上党成立以来六十年中间毛泽东同志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贡献。因此，建议增加回顾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段落。有了党的整个历史，解放前解放后的历史，把毛泽东同志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末，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说毛泽东同志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

从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胜利，”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是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的以及“三八式”[1]的一大批干部。现在这些人在全国各个岗位上都担负着重大的责任。这是二件极大的事情。这是第一点。第二，毛泽东同志正确处理西安事变，并制定了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包括同国民党又联合、又斗争，坚持独立自主立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写了许多重要的著作，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战争和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等等。我们党里头没有第二个人写出这样好的著作。这是了不起的功绩。

第三，延安整风[2]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倡学马列著作，特别是学哲学，对于全党的思想提高、认识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毛泽东同志亲自给我讲过三次要学哲学。在延安的时候，有一段我身体不大好，把毛泽东同志的主要著作和他起草的重要电报认真读了一遍，受益很大。我由此深刻地领会到，工作要做好，一定要实事求是。建国以后，我们一些工作发生失误，原因还是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上、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要把《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选编一下。还要选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也要学点历史。青年人不知道我们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这件事情现在要抓，以后也要抓，要一直抓下去。

第四，毛泽东同志的一整套理论和政策，是总结了陈独秀、李立三、王

明的错误教训得出来的，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五，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威望，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即使毛泽东同志犯错误的时候，许多老干部被整得那么厉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他，忘不了他的功绩，原因就在这里。老一代人拥护毛泽东同志是真心诚意的。

四

要写国际上对我们的帮助。我们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建党初期共产国际也起了好作用。抗日战争期间，苏联还是援助了中国，最后出兵打垮关东军。如果不把关东军打垮，抗日战争的胜利起码要推迟好几年，我们也要晚一些进到东北，东北很难首先全部解放。还有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一百五十六项[3]，那确实是援助，表现了苏联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对我们的情谊。这样一些问题，《决议》应该如实地按照事情本来面貌写上去。要通过对这些历史问题的论断，再一次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是公正的。

注 释

[1]“三八式”是对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干部的一种习惯性称呼。[2]见第 156 页注[2]。

[3]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建设项目。

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

(一九八一年五月八日)

一、现在省委、地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多数是六十岁以上的干部；其中不少还是七十岁以上的干部，政府各部委的领导同志大体也一样。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或抗日战争时期的干部。县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多数是五十岁左右的干部。

这些干部身负重任，都在党政军第一线工作，日夜操劳。这种状况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我国近十亿人口大国的繁重的领导工作。他们已经不能持久地工作，并且常常带病工作，时常因病住进医院。因积劳成疾而死亡的人越来越多，开追悼会的消息几乎每天都有。

二、五中全会[1]成立书记处以后，减轻了中央政治局和常委的工作。但是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们也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他们的日常工作非常繁忙，日夜操劳。这是陈云同志写的一篇文章稿，曾印发一九八一年六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样下去，书记处的现状断然难以为继。

三、自从中央提出提拔中青年干部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工作的问题以后，从三中全会到现在，对这件事虽然做了若干工作，但总的说来，因为认识不一致，收效不大。这是目前的实际情况。

四、目前在我们面前放着两种办法由我们选择：

一种选择，继续不警惕党内干部青黄不接的情况，不采取果断措施，任其继续拖下去。那末，事情发展下去，在没有准备好中青年干部的情况下，必然是让六十岁以上的老干部因工作劳累很快地在短时期内陆续病倒、病死，而被迫地不得不仓促提拔一些不很适当的中青年干部来担任领导工作。这是我们不应选择的办法，这样对党的事业很不利。

另一种选择，从现在起，就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让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在各级领导岗位上锻炼。老干部对他们实行传帮带，使大量的中青年干部成为我们各级党政工作强大的后备力量，随时可以从中挑选领导干部。这是对我们最有利的办法，应该努力去做。

五、应该说，要提拔中青年干部，使我们党的事业后继有人，这是老干部的心愿。但是，同时又应该说，在许多老干部中，对干部的青黄不接的状态，没有清醒的紧迫感，总觉得中青年干部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没有经验，感到不放心。这种不放心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中提拔过一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青年人。当时提拔这样的青年人到高级领导岗位的实践已经证明，这是党的一个痛苦的教训。

必须说清楚，现在我们所要提拔的中青年干部，绝对不是要提拔那种“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青年干部，我们要提拔的是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

六、党内是不是有大量我们可提拔的中青年干部？必须看到，我们党内有大量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问题是我们没有去提拔，去培养。

七、有人认为“中青年干部缺乏经验”。过去常说：“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当然，中青年干部没有老干部那样丰富的工作经验，这正是一般中青年干部的必然现象。但是我们应该问一同，经验是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实际工作中锻炼出来的。把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放到实际工作的负责岗位上

去，让他们挑担子，只要有三年五载，至多十年的锻炼，他们是一定能够锻炼成才的。

我们应该回顾一下，我们这些老干部还不是二三十岁就已经担负了重要工作？老干部都是经过青年时期的锻炼，才逐渐成为成熟的中年干部、老年干部。才干是锻炼出来的，并不是天生的。

八、应该看到中青年干部的另一方面，他们有朝气，他们比我们当年被提升为干部时有更多的长处，他们多数有专业知识，不少人有第一流的专门知识。当然，中青年干部有某些缺点，并且不成熟，这些缺点和不成熟正是中青年人所常有的现象。

九、我们所要提拔培养的干部，不仅是年龄在五十岁左右的人，而且在数量上占多数的应该是四十岁左右的人、四十岁以内的人。让他们在各级领导岗位上经过几年以至十来年的锻炼，就可以成为大量提拔高级领导干部的后备力量。

中央组织部要成立青年干部局。这个局的工作人员应该是优秀青年，并且是熟悉青年干部情况的。

十、这样大量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固然要靠党的组织部门去做，但主要的要靠各级领导干部大家动手去做。从基层单位直到中央，都要一齐动手。

为了避免提错人，为了在工作中考察中青年干部，各级党政军民组织都应该自上而下地设立辅助工作机构和辅助人员，如办公室、秘书处、研究室等等，如书记助理、副秘书长、部长助理、帮办等等（军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参照办理），上下对口，让中青年干部在这些机构中工作，给他们接触全面工作的机会，让他们随时了解工作中的问题。凡属向党委提出的问题或方案，先由上下各级的这些辅助机构中的中青年干部经过研究，提出可供选择的几种方案、办法，提供党委参考。

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些办公室、秘书处、研究室都应该按地区、按部门成立小组一类机构，这些小组由六十岁上下的干部带头，小组成员由五十岁左右、四十岁左右、四十岁以内的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干部组成。

只有这样用大批真正年富力强的干部组成一支庞大的队伍，在工作岗位上调查情况，研究问题，提出方案，才可以减轻各级党委的工作，而且可以培养出大批中青年干部。

这种上下对口，使用和培养大批中青年干部的办法，要成为制度。这不仅是为了弥补十年内乱后的需要，而且应该作为长期训练和选择干部的一种制度。

这种办法在中央和省市两级更为重要。

十一、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必然涉及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十年内乱时期把知识分子说成是“臭老九”[2]，这种观点虽然已经受到批判，但是，党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提拔干部的政策远远没有实现。我们应该看到，没有老干部不能实现四化，没有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到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来，也决不能建成现代化的新中国。现在的情况是，知识分子要求入党，时常被拒之于门外。有些长期要求入党的知识分子，在生前往往不能实现，直到他们做出贡献而死后，才被迫认为党员。这种情况必须坚决加以改变。党应该重新作出大量吸收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入党的决定。中央组织部要成立技术干部局。

十二、老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应该很珍惜地使用他们，使他们尽到传帮带的职责。这是党的需要，也是老干部的心愿。

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的干部，他们经历了千辛万苦。这些老干部退居工作第二、第三线后，在政治待遇上，如看文件、听报告、参加某些重要问题的讨论，必须予以保证；在物质待遇上，如住房、医疗、交通工具等必须予以照顾和优待。这应该是党的一项政策。至于老干部本人，也应该自觉地体谅在执行这项政策中某些方面会遇到的困难。

我们所有退居二线、三线的老干部应该继续胸怀大志，以党和国家的事业为重，热心地主动地让出工作岗位，让大批中青年干部在实际工作岗位上挑起重担，并且随时向这些中青年干部提出建议，给以帮助。

这是老干部对革命事业应尽的责任。

我们的老干部一定能够完成这个任务。这是几十年来终身为革命事业而奋斗的老干部的心愿，也是革命事业的需要。

注 释

[1]指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2]“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把知识分子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这八种人之后，诬蔑为“臭老九”。

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 ”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日)

我们现在的干部，青黄不接的情况很严重。差不多每天都有老干部死亡的报告。北京的，外地的，开追悼会，要送花圈，往往一天几起。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现在各部也好，下面机关也好，开会的时候，部长、副部长，正手、副手，坐了一大桌，但真正能做工作的，只有三几个人。这种状况再不能继续。

要提拔年轻干部，这个问题提出来很久了。我念的这个文件[1]是这样形成的：五月八日，我在杭州休息的时候，想到这个问题实在是大，就写了培养中青年干部的意见，回来送了一份给胡耀邦同志，一份给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说，老干部方面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得好。所以，接下来，六月八日，我和中央组织部、总政治部一共六七位同志，开了一次座谈会，写了那么个纪要[2]。

现在，我讲一讲关于提拔中青年干部和做好老干部离休退休工作的问题。在这个文件里头意思都有了，再这是陈云同志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着重他讲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干部青黄不接的状况是客观存在。老干部带病工作的，或者病倒病死的，一天一天增加。在我们面前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继续不清醒，拖下去，我看许多老干部都要拖死，这对党不利。老干部现在这个年龄，得了重病，说死就死，快得很。有许多同志讲，我身体很好，可以坚持八小时工作。说得好厉害，但是真正坚持八小时工作，坚持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还可以，要再坚持下去就不行了。许多老同志面孔看起来蛮好，胖胖的，但身体里头的机构、零件老化了。我看，现在老干部对于提拔中青年干部还不是很清醒，不是感到很紧迫。如果到倒下来的时候，被迫地提拔一些不理想的人到领导工作岗位上来，这对我们党是很不利的。我们不应该做这种选择，我们要做另外一种选择，就是立即主动地提拔培养大批中青年干部。党必须这样做。有些老干部，他不讲完全不要中青年干部，但是脑于不那么清醒。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提拔中青年干部的问题，会有争论，会有怀疑。为什么说了那么久，提不上来？总有原因嘛。我看，提五十岁左右的人，现在可能争论少一些。我只说“可能争论少一些”，并不是说没有争论。我看了国务院部长的名单，电力工业部的部长叫李鹏，在延安是个小孩子，李硕勋[3]的儿子，后来到苏联学习，是学电的，回来以后在小丰满[4]工作，我参观小丰满的时候还看见过一次。中央组织部第一次提出来的名单里头不是李鹏，到第二次，名单变了，是李鹏。这件事情刘澜波[5]同志是力争的，说一定要提李鹏。为什么呢？他年纪轻，而且搞电是内行。刘澜波同志还跟我打了招呼，要我注意一下。就像这样的人，五十二岁，专门学电的，解放以后在电力部门工作了二十几年，还有争论！所以，我说，提五十岁左右的人可能争论少些，但不是没有争论，会有争论。

提四十岁左右的人，争论、怀疑会很多，说“太嫩”了。所谓“太嫩”，就是资格不老，现在我们提了四十岁左右当部长的，还只有郝建秀[6]一个。她是五十年代的劳动模范，今年四十五岁，专门进学校学了一下。但是，可

惜，这样的干部还只提了一个。所以，你们看，提四十岁左右的人争论是很多的。

要提四十岁以下的人，那怀疑、争论会更多。为什么文件里头特别写提四十岁以下的人这么一句？因为他们年富力强。五中全会[7]产生书记处，美国的一个新闻记者叫罗德里克的说，这个领导班子力强，年还不富。因为离七十岁，离八十岁，时间很少了。我在《参考要闻》上看到，美国卡特政府一个什么办公室的主任，只有三十二岁；里根政府也是一个什么办公室主任，四十岁。外国人一定比我们聪明，我们中国人一定笨一点吗？并不是这样。所以，我这里写还要提四十岁以下的干部。而且从总数上来说，比如提一万人，其中大多数，百分之七十以上，应该是四十岁左右、四十岁以下的人。提四十岁以下中青年干部的理由：第一条，是年富力强。第二条，是有意识地培养。他们现在没有经验，我们可以慢慢地培养，经过三年、五年、十年，有意识地培养，选出好的人。第三条，四十岁以下的人中间有人才，我看到好几个材料，在跟外国人谈判中，驳外国人，说你的东西不行，哪个地方不对，大体上都是四十岁左右的干部。可见，我们有人才。第四条，只有四十岁以下的人，才了解“文化大革命”初期青年人当时的表现。现在问我们这些人，“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讲的绝大多数“红卫兵小将”，张三、李四、王五、赵六，我们都不晓得，只知道聂元梓[8]，只知道蒯大富[9]，但是他们下面的第二把手、第三把手、第四把手；我们不知道。只有什么人知道呢？只有那个时候也是“红卫兵”的人知道。“保守派”、“逍遥派”也知道那些给我们老干部搞“喷气式”的人。现在提干部，摆到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就是“文化大革命”中间的一些年轻人，我们不了解，现在不要说三十岁以下、四十岁以下的人，就是四五十岁、五十多岁的人，我也不很清楚。我还当过组织部长，但是我知道的那些干部都是六十出头了。现在的第一把手，绝大部分的部长和省委第一书记，都是六十出头了。

第三，台阶论还是对的。这是小平同志讲的，台阶，一级一级上来，这是必要的。一定要按级提拔。我写的。一些办法也是按级提拔，但是，也可以越级提拔。越级提拔的，只能是少数。我看按台阶的办法上台的人，他的基础巩固扎实，本领全面。我听说，宋任穷[10]同志开了一个省市书记的电话会议，有的地方采取这样的办法，把大学毕业生放到公社里头去做一个时期工作，慢慢地再抽回来，以后到县委，以后到地委，以后到省委，一级一级来。我看，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第四，闹派性的骨干分子，打砸抢的分子，一个也不能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我说一个也不能。但是，可以给他一般的工作做。同志们，对于这些人，不要只看他们现在一时表现好。现在这些人大概表现是“蛮好”，他要爬上来，现在只能表现好，因为老家伙还在。但是，到了气候适宜的时候，党内有什么风浪的时候，这些人就会变成为能量很大的兴风作浪的分子。有一个，有两个，就可以串连，兴风作浪。他们说，没有把这些老家伙整倒、整死，现在还在台上，当时整死就好了。当时闹派性的、“造反”的人很多，许多是随大流的，但里头的骨干分子不能提到领导岗位上来，一个也不能提拔，手不能软了。因为时局变化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变成能量很大的兴风作浪的分子。什么时候气候适宜呢？我们这些人都见马克思去了。胡耀邦同志他们也见马克思去了，那个时候，在座的人大概追悼会开得差不多了。王洪文讲什么？（邓小平同志插话：一九七五年他到上海、杭州，第一句话就说，

十年后再看。这句话可触动了我们，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所以，对这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但是可以给他们一般的工作，给饭吃嘛。

第五，培养执笔的、写文章的中青年，选择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要特别谨慎。一是必须培养能写文章的人，党内没有能写文章的人不行；二是必须培养既能写，又有德，德才兼备的人。至于说专业写作的人，他专门搞这一行的，那只占培养中青年干部中间很少的一个数量。我们党第一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1]是胡乔木同志协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起草的，第二个决议也是由他执笔的。找胡乔木这样的人不容易。拿笔杆子的人，能写文章的人，选择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第六，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要成千上万，几千，一万、两万，这次在杭州我跟胡耀邦同志讲过，至少一万个。为什么要成千上万？一条理由，二十几个省区市，加上中央各部委，提一两百个人够用吗？不够用。成千上万，这是工作的需要。再一条理由，只有成千上万地提拔经过选择的好的中青年干部，才能使我们的干部交接班稳定地进行。还有一条理由，只有成千上万，才能使兴风作浪的分子搞不起大乱子。成千上万的好干部坐镇在那里，只有几个人在那里捣乱，搞不了大乱子。

第七，组织部要专门设一个管理中青年干部的机构。这个机构十分重要。各级组织部门里，中央也好，省区市也好，地县也好，都要有管理中青年干部的机构。什么人带头呢？还要六十岁上下的人带头，工作人员必须是党性好的中青年干部，他们要熟悉四十岁以下的青年干部的经历和底细。现在把整死彭老总[12]的人查出来了，但是到他工作的那个机关一查，问这个人历史怎么样，那个机关答复不知道。所以，设立管理中青年干部的机构十分重要。

第八，组织部门里头应该有专门管理科技干部的机构。这个机构怎么组织，怎么工作，必须专门研究以后再成立。要有科技干部的档案。

第九，老干部离休、退休的工作必须做好。要使人心安定。准备在这方面花一点钱。有的地方可以搞干部休养所；有的地方，干部离休、退休以后，要有个文化娱乐的地方；有些老干部离休以后医药费困难，国家可以花一点钱。不管怎么样，这些钱我们花得起，一年几个亿就够了。中央组织部讲，老干部工资还是照拿，一个人一年还要多花二三百块钱，主要是医药费、交通费、书报费、娱乐费。再多花一点也可以，就是要把这件事情办好。当然，不只是钱的问题，还要有思想工作。有许多是可以不花钱的，看戏坐头排，开会上主席台，并不要花钱。

我这里主要讲的是提拔中青年干部问题，老干部离休、退休的问题只讲了一条。

注 释

[1]即本书《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一文。

[2]指《关于老干部离休、退休问题座谈会纪要》。

[3]李硕勋（一九〇三—一九三一），四川庆符（今高县人）。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任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党代表。后曾任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长、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广东省委军委书记等职。一九三一年七月在广东海口被捕，同年九月英勇就义。

[4]小丰满即今丰满发电厂，也称丰满水电站，位于吉林省吉林市东南、松花湖出口处。

[5]刘澜波，当时任电力工业部部长。一九八一年三月，他响应中共中央号召，主动要求退居第二线，并推荐年富力强的同志担任电力工业部的主要领导人。

[6]郝建秀，当时任纺织工业部部长。

[7]见 263 页注[1]

[8]聂元梓，原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她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犯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六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聂元梓有期徒刑十六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9]蒯大富，原清华大学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犯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诬告陷害罪。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六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蒯大富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10]宋任穷，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

[11]第一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二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关于“两案”审理工作的意见”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但这是一场政治斗争。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斗争。这场政治斗争被若干个阴谋野心家所利用了。在这场斗争中，有许多干部、党员、非党人士受到了伤害。但“文化大革命”从全局来说，终究是一场政治斗争。因此，除了对于若干阴谋野心家必须另行处理以外，对于其他有牵连的人，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对于这场政治斗争，不能从局部角度、暂时的观点来处理，必须从全局观点、以党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来处理。这种处理办法，既必须看到这场斗争的特定历史条件，更必须看到处理这场政治斗争应该使我们党今后若干代的所有共产党人，在党内斗争中取得教训，从而对于党内斗争采取正确的办法。这是处理这场政治斗争的前提。

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一九八二年九月六日)

我完全同意胡耀邦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向这次大会作的报告，完全同意党章修改草案，完全同意邓小平同志的开幕词，完全同意叶剑英同志的讲话。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拨正了航向，又经过十一届四中、五中、六中全会，使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走上了正确的、健康发展的轨道。

但是，应该清醒地看到，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党的干部队伍相当长时间以来就存在程度不同的老化问题，存在青黄不接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不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好，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就有可能出现曲折。每一个同志，尤其是每一个老同志，都应该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

因此，解决好干部队伍的交接班问题，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是老干部要陆续从领导班子中退出。

在不久以前进行的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机构改革中，一些老同志退出了第一线领导岗位。在最近召开的十一届七中全会上，又有许多老同志表示要退出中央委员会和其他一些领导岗位。这说明，我们的老干部是有高度革命责任感的。

老干部退出了第一线，革命是不是就到头了呢？并没有。无论是退到第二线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还是离休、退休，都要支持中青年干部的工作，担负起对中青年干部传帮带的任务。老干部只有完成了这项任务，才算对党和革命事业尽了最后一把力。

另外，既然是干部队伍青黄不接，老同志就不可能一下子都从领导班子中退出。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有些老同志暂时还要留在第一线。但是，对于这些同志来说，主要的精力也不应该再用来处理日常的繁重工作，而应该用来搞好传帮带，在重大问题上出主意，把把关。

要解决干部队伍交接班的问题，就要提拔中青年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

对于这个问题，我要讲两句话。

一句话是：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而不能只提拔几十个、几百个。

为什么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呢？这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各级领导班子中退出的大批老干部的工作都能有人接替；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有很大的选择余地，以便把班交给确实可靠的人；只有这样，才能使“文化大革命”中提拔起来的那些兴风作浪的分子在今后闹不起大乱子。

为了做到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我们必须用发展的观点看待他们，不要只看到他们现在还缺乏经验。当然，中青年干部没有老干部那样丰富的工作经验，但是，我们应该问一问，经验是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实际工作中锻炼出来的。把中青年干部放到负责岗位上去，让他们挑担子，锻炼三年五载，十年八年，他们就一定可以取得经验，逐步成熟。另外，多设一些类似“助理”那样的职务，这样就可以减少提拔中青年干部到正式领导岗位上可能遇到的阻力，同时也便于党组织在正式任命他们之前，对他们的领导能力和组织才干有一个实际的考察。

关于提拔中青年干部问题，我要说的另一句话是：在“文化大革命”期

间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的，必须坚决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

为什么一个也不能提拔呢？因为这“三种人”如果进到领导班子中，若干年后，到了气候适宜的时候，他们就会跳出来兴风作浪，再次为害国家，为害人民。

当然，我仅看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犯有错误的中青年中，属于“三种人”的只是少数，多数是跟着跑的。对于跟着跑的人，只要他们真正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与“三种人”坚决划清了界限，而且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表现一直好，党就应该信任和使用他们，并在工作中对他们继续加以考察和帮助。

我们还要看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表现好的和基本好的中青年有的是，我们在提拔中青年干部时，应该主要从他们中间挑选。

除了这“三种人”以外，还有两种人也不能提拔，这就是反对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路线的人，以及在经济领域内和其他方面严重违法乱纪的人。

总之，一方面要大胆提拔，加快提拔中青年干部，一方面又要严格把好政治标准这一关。德才相比，我们要更侧重于德，就是说，要确实提拔那些党性强，作风正派，敢于坚持原则的人。

我相信，只要把干部队伍的交接班问题解决好，我们党的事业就一定会后继有人。

纪律检查干部要有坚强的党性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三日）

党的十二大刚刚开过，胡耀邦同志的报告和新党章，对整顿党风，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都做了很好的说明和规定。我没有更多的话要讲，只想讲三点。

第一，过去三年多来，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在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做了若干工作。但是，应当看到，要在十年内乱后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特别是要在我们党执政的情况下长久保持好的党风，任务还非常重。因此，中纪委和各级纪委今后的主要工作，仍然是协助中央和各级党委切实抓紧抓好党风的整顿。

第二，要继续建立和健全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县以上单位的党委，过去凡是没有建立纪律检查机构的，要尽快建立；已经建立的，有些还要加强力量。一般说来，凡是没有纪律检查委员会或纪律检查组的地方，都应当有专职的纪律检查干部。

第三，要把党的纪律检查队伍本身的干部选好，用好。做纪律检查工作的干部，应当是有坚强的党性，有一股正气的人；应当是能够坚持原则，敢于同党内各种不正之风和一切违法乱纪行为作坚决斗争的人；而不应当是在原则问题上“和稀泥”，做和事佬、老好人的人。

同革命烈士子女的谈话

(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三日)

今天是春节。中国有句老话：“每逢佳节倍思亲。”你们的父亲[1]就是我们党的亲人，是我们民族的亲人。所以，今天把你们请来，共度春节。

你们的父亲都是建党初期的党员，参加革命比我早，是我的老前辈，其中有的还直接领导过我。他们有的是被敌人逮捕杀害的，有的是在作战时牺牲的，死的时候都很年轻。我们的新中国，是他们和千千万万个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的每一个胜利，都有他们的一份功劳。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没有忘记他们，也不会忘记他们。我相信，我们的后人，以及后人的后人，也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你们是革命的后代，是党的儿女。你们应该像自己的父辈那样，处处从党的利益出发，为了维护党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你们中间有的是科学技术人员，有的是新闻工作者，有的是教师，有的是干部，都在不同的岗位为党和人民工作着。我看到你们的健康成长，非常高兴。现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形势都很好，你们要和周围的同志一道，爱护这个好的形势，发展这个好的形势，为把我们国家建设得更加富强，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注 释。

[1]指瞿秋白、蔡和森、罗亦农、赵世炎、张太雷、郭亮和刘伯坚等革命烈士。培训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

培训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党政领导干部

（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看了你们在第二次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同意讲话中的基本精神。

很好地培训适应四化建设需要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党政领导骨干，是党校的迫切任务。希望这次会议着重讨论解决这个问题，党校学员既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以此作为主课，又要学习一些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必要的专业知识，以提高领导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

现代化建设和接班人培养问题（节选）

（一九八三年六月三十日）

我们搞革命、搞建设，搞得热热闹闹，切莫忘了要后继有人。现在，我们党的第二梯队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第三梯队也已经有了一定的数量。今后全党要努力把第三梯队建设好。

十一届五中全会成立中央书记处以后，为中央政治局和常委挡了大量工作，成绩是显著的。开国初期，我们进行了土改、农业合作化和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设了我国自己的工业基础。但是，那时在经济体制和企业经营管理方面，没有能够经过试验，摸索出一套更为合理、更为完善的办法。粉碎“四人帮”后，农业生产上逐步实行多种形式的责任制，收到了明显效果。现在，工商业正在进行体制改革和各种责任制的试验。我相信，这些试验也是一定可以逐步取得成功的。

但是，应该看到，现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同志也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他们和我们这些七十岁以上的人相比，年龄间隔不大。就是说，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的年龄距离太近了。因此，要抓紧选拔五十岁上下、特别是四十岁上下的优秀干部，趁我们还在的时候，把第三梯队也建立起来。一些同志和好心的国际人士不是担心我们这些人不在以后，跟随“四人帮”的那些“三种人”^[1]会翻天吗？只要有了第二梯队，并且有了第三梯队，他们就翻不了天。这是党和国家的大计。老同志要自觉地、认真地、正确地选拔接班人，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培养他们，主动地给他们让位，“把他们扶上马，再送上一程”。像我们党这样做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还没有过。我们每个同志都应该在去见马克思之前，从党和国家的事业出发，继续努力办好这件事。这件事办不好，我们就要负历史的责任。

注 释

[1]参见本书《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一文。

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二日)

我同意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同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讲几点意见。

(一) “文化大革命”对党造成的损害是严重的。有一批老干部（包括军队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这些人虽然也有一定数量，但大家都知道，容易认识。最危险的是党内混进了一批“三种人”[1]。

粉碎“四人帮”以后，对浮在面上的“三种人”，在揭批查中清理了一次。但因为各种原因隐藏埋伏下来的“三种人”和他们的“军师”还不少。

“文化大革命”中各地都有两派，发生了派性。现在有的领导干部用派性对待清理“三种人”的工作，只清理对立派中的“三种人”，而对自己支持的那一派中的“三种人”不积极清理，这是错误的。

“三种人”和他们的“军师”现在表现很“听话”，我们有些领导干部对这类人很赏识。

这次整党必须把“三种人”清除出党。为什么必须这样做？因为这些人是在党内最不安定的因素，他们彼此间还有联系，若干年后，气候适宜了，他们还会兴风作浪。

清理“三种人”，这只是我们要做工作的一半。另一半工作，而且是更重要的一半工作，是必须成千上万地培养、提拔三四十岁的真正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青年干部，把他们提到党和国家各个方面的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只要把党的第三梯队建立起来了，经过十年八载的锻炼，他们就可以成为党的事业的接班人，我们党的领导权就可以保证为马克思主义者所掌握，而不会落到“三种人”手里，今后即使有埋伏下来的“三种人”和他们的“军师”，也就兴不起什么大的风浪。

(二) 党在全国执政前和执政后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党在全国执政以前，在敌人统治下的地下党，那时作一个党员就有杀头的危险，根本谈不上什么物质享受；在苏区[2]的党和解放区的党，大家忙于打仗和支援战争，另外，也没有什么物质可以享受。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从中央到基层政权，从企业事业单位到生产队的领导权，都掌握在党员手里了，党员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

许多贪污犯本人就是党员，即使贪污犯不是党员，他们能够贪污，也是靠某些共产党员的保护。

我们绝大多数党员是不谋私利的，但因谋私利而犯法、犯错误的党员也不是一个很小的数量。就从打击经济领域犯罪以来，中纪委统计的经济犯罪案件中看，开除党籍的有九千多入，受党纪处分的有一万八千多人，两者合计二万七千多人，比一九二七年“四一二”[3]以后全国党员总数还要多一倍多。

对于利用职权谋私利的人，如果不给以严厉的打击，对这股歪风如果不加制止，或制止不力，就会败坏党的风气，使党丧失民心。所以，我说过：“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现在有些农村党员集训，除了伙食补贴以外，集训期间要给党员每天一二元误工费，这是确实的，不是误传。身为共产党员，集训时间只有几天，而且是受教育的时间，每天却要拿一二元的误工费，这在党执政以前是不可

想象的。解放前，同样在农村，支援战争，运送弹药、伤兵，非但没有误工补贴，而且常常因此而受伤或死亡。相比之下，现在这些误工补贴能算合理吗？拿误工补贴的共产党员应该想一想，这样做是不是合乎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共产党员的标准是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我看一切集训、开会要钱的人，不能成为共产党员。今后，全国不要再给集训时的误工补贴，凡属要求误工补贴的党员应开除党籍。

（三）必须充分看到对外开放后带来的问题。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外国有用的东西加快国内建设，这是完全正确的。对外开放时，我们也讲了要充分注意对外开放中带来的消极东西。但现在看来，防止消极后果的工作还做得不够。

有些人看见外国的摩天大厦、高速公路等等，以为中国就不如外国，社会主义就不如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对于这些人，我们要进行批评教育；对其中做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经过教育不改的，要调动他们的工作。

中国现在还很穷，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根本制度比资本主义优越得多，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有百万富翁，但他们的财富是剥削劳动人民得来的。资本主义必然要被共产主义所代替，这是无可改变的法则。现在世界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这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的铁证。我们可以充满信心，高呼：社会主义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注 释

[1]参见本书《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一文。

[2]见第7页注[7]。

[3]“四一二”，指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反革命政变。

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的书面发言（节选）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一起抓。

关于改革的决定[1]中说：“竞争中可能出现某些消极现象和违法行为”，这句话在文件里提一下很必要。什么是消极现象？例如，大吃大喝，送很贵重的礼品，以及其他种种为谋取小公和个人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的不正当手段，这些就是消极现象。有的地方总结“经验”，叫做“二菜一汤，生意跑光；四菜一汤，生意平常；六菜一汤，生意兴旺；八菜一汤，独霸一方”。据说，现在八菜一汤也不大灵光了。还有的厂子，选两个二十多岁的漂亮姑娘当外勤人员，跑材料，推销产品，男外勤人员办不到的事，她们能办到。对这些现象，不必大惊小怪。因为，一方面许多企业的产品要自销出去；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的社队企业的原材料没有列入国家计划，没有指标，需要自己去找。这两方面合在一起，必然会出现这些现象，这是不奇怪的。但也要看到，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个问题，不进行必要的管理和教育，这些现象就有可能泛滥成灾，败坏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因此，我们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抓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文明一起抓。只要我们的头脑是清醒的，看到这些现象，并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这些消极方面是可以受到一定限制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既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也要有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我们永远要坚持的奋斗方向。

注 释

[1]指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要加强共产党员的党性教育

(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三日)

全国纪律检查工作会议[1]要研究一下，为什么那么多的党员，甚至多年的老党员，在“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歪风刮来时，自己顶不住，一下子就卷进去了，跟着跑，跟着干，这是什么原因？这些共产党员的党性到哪里去了？从党的建设的角度看，这是个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发展下去，不就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吗！这个情况，反映了我们一部分党员的党性有问题。

由此想到，各级党组织和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只是查处违法乱纪的案子不行，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共产党员的党性教育和自觉遵守党的纪律的教育。提高共产党员的素质，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党的建设上的一个根本问题。对这一点要有清楚的认识，要认真地抓紧抓好。

现在，有些小报上面讲的，无非是男女关系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它会腐蚀干部，腐蚀青年。这不只是党的问题，还关系到我国青年的志向问题。把青年的思想和兴趣引向这些乌七八糟的方面，也会亡党亡国的。解决这个问题，要树立中央宣传部的权威。中宣部要管电台、电视台、报纸和文艺。

注 释

[1]指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六日在河南郑州召开的全国纪律检查工作会议。

两个文明要一起抓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一、中纪委召开端正党风工作经验交流会，总结抓党风工作好的经验，这对促进党风的进一步好转，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是很必要的。

二、要使全党同志明白，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非常重要。在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国家现在进行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每时每刻都必须牢记，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进行的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

在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时候，如果不同时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就可能偏离正确的方向。任何单位，任何领导干部，如果忘记或放松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也不可能搞好。严重的，甚至会脱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这是很危险的。

三、去年第四季度，那些歪风刮来时，不少的共产党员，有些是老党员、老干部也被卷进去了，对这件事我们必须引起警惕。

要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关键是执政党要有好的党风。要加强共产党员的党性教育，提高共产党员的素质。

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全党的任务，党的纪律检查部门负有重大的责任。同志们要坚决地刹歪风、正党风，增强全体党员的党性，从精神文明建设上，保证和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使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沿着正确的轨道，不断前进。

概括他说是两句话：一是希望纪检部门的同志和全党同志，时时刻刻注意，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认真抓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文明一起抓。二是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键是搞好执政党的党风，提高共产党员的党性觉悟，坚定地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要同一切违反共产主义理想的错误言行，进行坚决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节选）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一）干部队伍要保持梯队结构。

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充实各级领导班子，这是近几年来，我们党反复强调的一项重要工作。

经过反复考察，一批优秀的中青年同志，被选进了中央和地方的各级领导班子。

干部队伍保持梯队的结构，可以使党的事业后继有人，代代相传。这件事，我们做得是有成绩的。今后要继续做好。

（四）抓党风的好转，仍是全党的一件大事。

这些年来，中央抓了党风问题，但是，要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任务还非常重。

现在确有少数党员、党员干部，特别是个别老党员、老干部，不能坚持党性原则，遇到歪风，跟着干。

有些严重违反党纪、国法的事，如造假药、假酒等，发生在整党中。

党内的广大干部、群众，对这些事是极端不满意的，应引起全党认真注意。

整顿党风这件事，不可掉以轻心。

一是各级党组织要重视。二是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重视。要真正身体力行，作出榜样。三是老党员、老干部要重视，包括退居二线或者离休、退休的在内。在以身作则、关心党风党纪、发挥监督作用上，没有退居二线和离休、退休的问题。只要是党员，活着就永远处在第一线。

希望所有党的高级领导人员，在教育好子女的问题上，给全党带好头。决不允许他们依仗亲属关系，谋权谋利，成为特殊人物。

（五）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维护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权威。

最近，书记处讨论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問題，我看很必要。我们党是执政党，目前又处在新的发展时期，如何有效地进行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事关重大。

现在有些人，包括一些共产党员，忘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丢掉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们为了私利，“一切向钱看”，不顾国家和群众的利益，甚至违法乱纪。如报上多次公布的，那些投机诈骗，贪污受贿，非法致富，以及在同外国人交往中，不顾国格人格的现象等等。

这些问题的发生，同我们放松思想政治工作、削弱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作用和权威有关，应引为教训。

各级党组织都应把思想政治工作认真抓好，都要积极维护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权威。

应当把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这种宣传教育不能有丝毫减弱，还要大大加强。

民主革命时期，我们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党员和群众中的先进分子，才使党始终有战斗力，使革命取得了胜利。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更加要有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精神。

在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同时，还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

（六）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党章规定的原则。

历史经验证明，实行民主集中制，做起来很不容易。

希望新进各级领导班子的中青年干部，要注意学会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

在各级领导班子中，要充分发扬民主，倾听各种意见，特别要注意倾听不同意见。要照党章办事，不要一个人说了算。

重大问题的决定，必须经过集体的充分讨论，以便减少失误，少走弯路，把事情办得更好。

必须纠正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党的十二大以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纪委，在协助各级党委争取党风根本好转和提高党员政治素质方面，在纠正不正之风、惩治违法乱纪、反对党员中错误思想倾向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起了积极作用。

但是，目前在党风、社会风气方面，还存在许多严重问题，实现党风、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任务还很重。

现在我对争取党风根本好转，讲以下几点意见。

一、必须在思想上纠正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

社会主义建设，包含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者是不能分离的。社会主义事业不可能是单纯的物质文明建设，又不可能是单纯的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也不可能先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然后再来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现在大家致力于物质文明建设，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应当看到，现在确有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而且相当普遍。

在党内，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就不可能有好的党风；在社会上，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忽视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就不可能有好的社会风气。总之，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我们的整个事业就可能偏离马克思主义，偏离社会主义道路。那种“人不为己、大诛地灭”的资本主义哲学，那种不顾国格人格的奴才思想，就是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因素。

当前比较普遍存在的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绝不是一个新问题，全党同志务必高度重视。

二、严重注意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渗人。

对外开放，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用，是完全正确的，要坚持。

但同时要看到，对外开放，不可避免地会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入。这对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是直接的危害。

如果我们各级党委，我们的党员特别是老干部，对此有清醒的认识，高度的警惕，有针对性地进行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教育，那么资本主义思想的侵入并不可怕。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真理，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蚀。

值得严重注意的是，目前许多党委和党员干部，对此没有警惕。例如，一说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有些党政军机关、党政军干部和干部子女，就蜂拥经商。仅据十几个省市的调查，从去年第四季度以来一下子就办起了两万多个这样那样的公司。其中相当一部分，同一些违法分子、不法外商互相勾结，互相利用。钻改革的空子，买空卖空，倒买倒卖，行贿受贿，走私贩私，弄虚作假，敲诈勒索，逃避关税，制造和销售假药、假酒，谋财害命，以至贩卖、放映淫秽下流录相，引诱妇女卖淫等等丑事坏事，都出现了。“一切向钱看”的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正在严重地腐蚀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

我们搞社会主义，一定要抵制和清除这些丑恶的思想和行为，要动员和组织全党和社会的力量，以除恶务尽的精神，同这种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中央纪委和地方各级纪委的工作是：无论是谁违反党纪、政纪，都要坚决按党纪、政纪处理；违反法律的，要建议依法处理。各级纪委必须按此原则办

事，否则就是失职。

不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严格执行党纪、政纪，党风、社会风气无法根本好转。

三、各级党委和纪委负有重大责任。

有些违反党的方针政策的事，违法乱纪的事，如果仅是某一个人的错误行为，那是个人的问题，但是如果哪个单位、哪个地区的歪风邪气大量存在，而又长期未得到纠正，那就显然不只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同那个单位、那个地区的党委领导有关。

对于危害社会主义建设，败坏党风、社会风气的歪风邪气，熟视无睹，听之任之，除了追究那些为非作歹的个人外，还要追究那个单位、那个地区的党委的责任，包括纪委的责任。例如，海南岛汽车案[1]以及汽车案中非法炒买炒卖外汇、诈骗、贪污受贿等等，不仅应追究那些违法乱纪的个人，而且应该追究那里党委的责任。晋江地区制造、销售假药，那个地区的党委熟视无睹，甚至包庇、袒护，如果不追究那里党委的责任，就丧失了党的立场。各级党委只有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抓精神文明建设；在抓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严肃党纪、政纪，党风才能根本好转。各级纪委应在同级党委统一领导之下，始终围绕搞好党风这一中心任务，作艰苦的努力。

注 释

[1]海南岛汽车案指一九八四年一月至一九八五年三月广东省海南行政区党委和政府的一些主要领导干部，目无组织纪律，违背中央的方针政策，批准并支持所属公司大量进口和倒卖汽车等物资的案件。一九八五年七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查清了这起严重违法乱纪事件，并经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海南行政区党委和政府的有关领导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领导干部在端正党风中要做表率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中央要求，在北京的党、政、军机关，要在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根本好转中做表率[1]。我建议，做表率首先从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国务院的各位同志做起。凡是别人（或单位）送的和个人调换的汽车（行政机关配备的不算），不论是谁，一律退回，坐原来配备的车。在这件事上，得罪点人，比不管而让群众在下面骂我们要好。

注 释

[1]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中旬以来，中共中央书记处连续听取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委、中共北京市委关于端正党风、纠正不正之风的情况汇报，并就端正党风问题作出决定，要求中央党政军机关和北京市机关做出表率，多办实事，半年至一年抓出成效，为全党风气的根本好转造成有利的形势。

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要保证和促进改革的健康发展^①

(一九八六年十月四日)

一、这次中纪委会 n 要认真研究如何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有关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大问题，中纪常委会要从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方面考虑，提出一个提纲挈领的规划来。

二、党的纪律检查部门，要在纪律检查工作上保证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健康发展。换句话说，党的纪律检查部门要坚决反对和认真纠正各种妨碍和破坏改革的行为，使纪律检查部门成为保证和促进改革的重要力量。

三、我们党处于全国执政的地位，再加上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客观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和各级党的组织，必须重视在执政党的条件下对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党性教育。

注 释

[1]指一九八六年十月三日至七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① 这是陈云同志在会见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要点。

调查研究和党内民主生活制度问题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

一九八〇年二月成立中央书记处的时候，党内的许多老同志，包括小平同志在内，都是很拥护的。我们做了一件好事。

关于书记处的工作方法，我在一九八〇年和一九八一年都讲过一些意见。后来我还建议书记处讨论决定重大问题时，事先要调查研究，要准备好方案，而且要准备两个方案，不要只准备一个方案。

调查研究很需要。我也做过调查研究。一九六一年我在小蒸——我的家乡做调查研究工作，蹲了半个月。调查中发现，公家养猪的地方脏得一塌糊涂，小猪、大猪、病猪、好猪都吃一样的东西。我看到农民家里养的猪，干干净净，还捉泥鳅喂猪吃。所以，当时我主张把猪分给农民私养，包括大部分母猪。回到北京以后，我向书记处写了一个报告。那次我花了半个月，调查一个小蒸，一个乡就是了。公私合营那个时候，敲锣打鼓到天安门游行，我就叫姚依林[1]、吴波[2]同志研究公私合营中的问题。研究的结果是，商业里头的每一行业都有大的、中的、小的商店，我们把它们分成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商店、合作小组三类就是了。并且提出，小商小贩在合作小组内的各自经营的办法，应该长期保存。我那个时候身体还好，除上午、下午有事外，经常是晚上八点钟到周总理那里，十二点钟到毛主席那里，也忙啊。调查研究的方法，我看不是一百多个部一个一个地都拿本子在书记处会上念一道，大家东插一句、西插一句，最后主持会议的讲一讲就通过了。调查研究的方法，也不是一个星期跑二十二个县，那样无非是坐汽车走一圈就是了。这种工作方法太简单。

我们党内要强调一下，要有民主生活制度。常委多少时间开一次会，政治局多少时间开一次会，要立个规矩。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分开来开。这是党内民主生活。民主集中制要坚持。经常开会讨论，经常交换意见，就不至于出大的问题。

提拔干部要注意五湖四海。我新到一个地方工作，经常是不带什么干部的。解放初，从东北进关以后，我是就地取材。姚依林、吴波同志都是华北的。我们用干部，要五湖四海，平常不熟悉的干部也要用。就地取材是很重要的一条原则。五湖四海，再加一个德才兼备，这是我们提拔干部的大方针。现在有同志常说，要开拓型干部。开拓型也要，但首先要强调有德，有党性。德才兼备，才干固然要有，但德还是第一。我希望政治局、书记处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

注 释

[1]姚依林，一九五六年时任商业部副部长。

[2]吴波，一九五六年时任财政部副部长。

身负重任和学习哲学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七日)

我今天主要谈谈你们现在身负重任和要学习哲学这两个问题。

我们国家，在目前第一位的领导人小平同志。但他今年的岁数，照中国老的算法，已经八十四岁了。过不了多少年，党和国家的全部领导重担都要落在你们一代身上。

为什么我把你们的担子看得这么重？因为，我们国家有现在这样的局面，来之不易。它是千千万万革命先烈、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流血牺牲、艰苦奋斗换来的。这是一条。还有一条，就是我们国家是十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无论是今天还是将来，在世界上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延安，我当中央组织部长的时候，毛主席先后三次当面同我谈过，要学哲学，还派教员帮助我们学习。那时，中央组织部成立了一个学习小组，一共六个人，有我、李富春、陶铸（当时任王稼祥的政治秘书）、王鹤寿、陈正人、王德，还有几位旁听的“后排议员”。学习小组不要很多人，大体上都要处在同一理论水平。学习方法是，规定每周看几十页书，然后讨论一次，研究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各种意见都可以争论。

我们从一九三八年开始学习，坚持了五年。先学哲学，再学《共产党宣言》，然后再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等。那时我们读的书，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有关著作外，还有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也读点别人的著作。毛主席《论持久战》这篇文章，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台儿庄一战，一部分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毛主席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各种情况，就亡国论、速胜论还是持久战这个问题，先在小范围讲了一次。讲后我对他说，是不是可以在大一点范围给干部讲讲，他同意了。后来毛主席自己动手把讲稿整理出来，印发给大家。《论持久战》一文的公开发表，震动了解放区，也震动了国民党统治区。

在延安，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我都看过，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要实事求是。这里的关键是要把“实事”看全面。我过去说过，难者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因此，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对于一件事，我有了一个意见之后，可以先放一放，再考虑考虑，听听有没有不同意见，如果有不同意见，就要认真听取，展开讨论，吸收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驳倒错误意见的过程，也是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的过程。如果没有不同意见，自己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让大家来批驳。有钱难买反对自己意见的人。有了反对意见，可以引起自己思考问题，常常是，有不同意见的人，他不讲出来。能够听到不同声音，决不是坏事。这同中央保持一致并不矛盾。国务院财贸办的时候，有一回财政部副部长王学明主张通过提高工农产品比价，从农民那里多拿点钱，用于扩大基本建设。为这件事，大家辩论了三天，最后王学明放弃了自己的意见。相互辩论，也是一种比较，可以看出哪种意见是对的，哪种意见是不对的，然后取得一致看法。

总之，我个人的体会是：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希望能够组织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的同志都来学习哲学，并把这个

学习看成是工作的一部分，也是自己的一项重要责任。

毛主席在一九三八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说过：“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现在我们在新的形势下，全党仍然面临着学会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这项最迫切的任务。

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上的书面讲话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九日）

一、中央纪委和下级纪检机关成立以来，成绩是主要的，也存在不足，需要改进。端正党风的关键是提高党员素质，尤其是提高高中级党员领导干部素质。

二、去年十月，小平同志、先念同志和我共同商定，十三大时一起退下来。这是党的事业的需要。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

（一九九〇年一月二十四日）

在延安的时候，我曾经仔细研究过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当我全部读了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之后，感到里面贯穿着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那末，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当时我的体会就是十五个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

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都不要读。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交换，就是互相交换意见。比方说看这个茶杯，你看这边有把没有花，他看那边有花没有把，两人各看到一面，都是片面的，如果互相交换一下意见，那末，对茶杯这个事物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全面的符合实际的了解。过去我们犯过不少错误，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问题有片面性，把片面的实际当成了全面的实际。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经常注意同别人交换意见，尤其是多倾听反面的意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比较，就是上下、左右进行比较。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论持久战》就是采用这种方法。他把敌我之间互相矛盾着的强弱、大小、进步退步、多助寡助等几个基本特点，作了比较研究，批驳了“抗战必亡”的亡国论和台儿庄一胜利后滋长起来的速胜论。毛主席说，亡国论和速胜论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由此可见，所有正确的结论，都是经过比较的。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这也是毛主席的办法。他决定问题时，往往先放一放，比如放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再反复考虑一下，听一听不同的意见。如果没有不同的意见，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吸收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并且在实践过程中，还要继续修正。因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这里所说的反复，不是反复无常、朝令夕改的意思。

这十五个字，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

还有，搞调查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亲自率工作组或派工作组下乡下厂，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另一种是每个高中级领导干部都有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和身边工作人员，通过他们可以经常听到基层干部群众的呼声。后一种调查研究，有“真、快、广”的特点。所谓真，就是他们敢于反映真实情况，敢讲心里话。因为他们信得过你，知道你不会整他们。我就有这样一些朋友。所谓快，就是当问题处于萌芽状态时，就能够及时发现。所谓广，就是全国各省市各行各业，都有许多高中级干部（包括离退休的）。在某种意义上讲，后一种调查研究比前一种调查研究更重要一些。两种调查研究都有必要，缺一不可。

一九六一年六七月间，我在青浦县小蒸公社搞调查，住了半个月。这里是我一九二七年搞过农民运动的地方，解放后也常有联系，当地的干部群众能够同我讲真话。当时在养猪问题上已经确定实行“公私并举、私养为主”的方针，但对母猪是公养还是私养，并没有明确规定，而这是关系到养猪事业能否迅速恢复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小蒸公社当时有十五个养猪场，我

去看了十个，还看了农民私养的猪，并召开了几次座谈会之后，感到私养母猪比公养母猪养得好。私养母猪喂食喂得好，有的甚至喂泥鳅，猪圈也干净，产苗猪多，苗猪成活率高。公养母猪喂食不分大小、强弱，像开“大锅饭”，猪圈脏得很，母猪流产多，苗猪成活率低。通过这次调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大部分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

总之，后一种调查研究，你们浙江可以试一试。你们要在各行各业广交知心朋友。军队也可以这样做。

军队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对于党的指示，军队一定要坚决执行。去年解决北京天安门的事，没有军队不行。一定要把军队建设好。

要维护和加强党中央的权威

(一九九四年二月九日)

上海工作是做得好的，不是一般的好，而是很好。

从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当然，目前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要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首先要维护和加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成大事，社会也无法稳定。

中央决定从今年起实行分税制^[1]，使中央逐步集中必要的财力。上海和全国其他各地都表示赞成，说明大家是顾全大局的，我很高兴。

从全国来看，当前经济工作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建设规模一定要与国力相适应，而且要留有余地。同时，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提高经济效益上来。

现在的中央领导班子是坚强的、有能力的，工作是做得不错的。全国上下都要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把中国经济搞上去是大有希望的，社会主义中国是大有前途的！

注 释

[1]分税制是一九九四年我国全面推行的一种财政体制。它是按照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合理确定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根据财权与事权相结合的原则，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固定收入、地方固定收入及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三部分。分税制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分设中央与地方两套税务机构。中央固定收入、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由国家税务局负责征收；地方固定收入由地方税务局负责征收。这种体制，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理顺财政分配关系，增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